

DU TUO SHI ZHI

普陀史志

舟山市普陀区
史志办公室

主办



2005

(总第15期)

- 浙东敌后第一支抗日武装史实考
- 一九四二年东极大营救追忆
- 一对老战士与桃花岛的生死情缘
- 登步岛之战的重要意义及其经验教训
——写在舟山解放55周年
- 团部挨炸之谜

普陀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礼仪普陀，文明普陀”
——第三个全民道德宣传日签名仪式



虾峙渔民文化节



文化下乡到渔港



第3届中国沈家门渔港国际民间民俗大会活动



警民共浇文明花

全区升国旗仪式

把握新机遇 实现新跨越

■本刊评论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给全国人民送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展示了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使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向更明、任务更重、决心更大、信心更足。这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务实求进大会的召开,对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富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我们圆满实现了“十五”规划目标,使我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生产力迈上了新的台阶,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办实事、讲实效、求实绩的“政绩观”、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人才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群众观”,形成了四位一体、有机结合的科学发展观,引领我国建设事业胜利前进,加快发展;二是党中央加快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促进了我国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前进;三是通过免征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等重要举措,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减轻了农民经济负担,加快了农业基础产业的发展步伐;四是加快改革进程,促进经济发展,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五是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保障了社会稳定;六是构建公共卫生框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把确保人民身体健康放在了重要地位;七是加强安全生产,强化人民群众生命至上,从根本上使人民切身利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八是增强法制观念,完善法制建设,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合法权益有法可依并得到保证;九是构建和谐社会,化解

内部矛盾,大大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十是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加快了经济发展和各项建设步伐。以上举措和目标的成功实现,保证了“十五”规划的顺利实现,为“十一五”规划的提出和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展示了中国发展建设的健康走势和美好前景,这是我党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使我们从中受到了如下深刻启迪:

1、这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第一个“五年时期”,并是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 1000 美元的第一个“五年时期”。说明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一五”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一定要紧紧把握,认真对待,奋勇前进,莫失良机。

2、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十六届五中全会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决策和举措的中心,使党的决策和发展建设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热情参与和衷心拥护。

3、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是十六届五中全会的鲜明特点,从而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使其更具实用性和科学性,从而使“十一五”规划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4、把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任务,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和“十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来抓,这不仅意味着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还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前进,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将使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进入加速发展时期,从而将大大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发生新一轮历史性巨变。

5、在协调稳步发展的同时,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上,积极寻求突破性发展,重点解决有些改革发展不快、有些改革无重大突破问题,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从根本上消除制约生产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而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同时还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形势需要。

6、强调求真务实作风,胸中忧患意识不忘,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清醒态度和对全党同志的谆谆教导。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十一五”时期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环境,一个总体上有利于我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不利因素可能增多的环境。我们要牢牢把握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党的五中全会精神,全面理解重大、深远意义,切实把握精神实质,落实思想行动,在新的起点和新的征程中,奋发图强,努力进取,作出新的贡献。

普陀史志

PU TUO SHI ZHI

2005 年第 1 期(总第 15 期)

(史料刊物 注意保存)

●刊首语

把握新机遇 实现新跨越

/本刊评论员 1

●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专辑

浙东敌后第一支抗日武装史实考

/邬永昌 4

抗日烽火在展茅

/俞保根 8

一九四二年东极大营救追忆

/蔡和平 10

难忘的瞬间

——回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片断

/王兰生 14

日军侵略舟山的又一铁证

/车鸿云 15

●本刊特稿

一对老战士与桃花岛的生死情缘

/邢学火 16

白沙风光

——白沙岛(乡)旅游开发的调研与思考

/王兰生 19

●专题研究

邓小平的科技观与秦山核电站建成

/杨成其 22

徐福东渡普陀驻泊地探论

/邬永昌 25

明代勘合朝贡贸易、“争贡事件”及倭寇猖獗的根源

/杨成其 31

登步岛之战的重要意义及其经验教训

——写在舟山解放 55 周年

/王兰生 34



刊名题写:倪竹青

主 审/刘旭军

/李 昇

/郑 挺

策 划/邓伟国

主 编/傅 曦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邓伟国

/邬永昌

/胡永久

/傅 曦

主 办/舟山市普陀区史志办公室

编 辑/《普陀史志》编辑部

地 址/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泗湾路
45 号

邮 编/316100

电 话/(0580)3013423 3012607

传 真/(0580)3014088

E-mail/ptshizhi@mail.zsptt.zj.cn

印 刷/舟山育英印刷厂

电 话/(0580)2047317

出版日期/2005 年 10 月 1 日

●往事追忆

革命熔炉炼真金

——怀念舟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普陀工委原主任杜梅

/王兰生 37

战斗的友谊 胜利的源泉

——回忆亲如兄长的郭班长

/主南源 38

●地方史话

朱家尖几条具有历史意义的海塘

/黄云隆 40

宋元明名人“普陀山(补陀、洛伽)”诗

/杨成其 42

●争鸣考释

宋元时另有一个沈家门

——沈家门历史地理位置及其变迁谈

/沈品权 47

古沈家门啊！您究竟在何方？

——读《宋元时另有一个沈家门》之浅见

/黄云隆 48

沈家门地名与姓无关

/陈鸣雁 53

●历史一页

团部挨炸之谜

/吴新华 54

舟山解放前后党政机构制发之证章考略

——兼谈证章的功效

/陈雨信 张信宝 57

●史迹漫步

登步岛革命烈士纪念碑树立记

/王兰生 60

●四 封

渔港春雪

/丁文宏摄(封一)

普陀精神文明建设结成果

/丁文宏摄(封二)

普陀城镇建设一瞥

/丁文宏摄(封三)

灿烂的渔港夜景

/丁文宏摄(封四)

浙东敌后

第一支

抗日武装史实考

■ 邬永昌

定海东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地处舟山群岛的中心地带,包括舟山本岛的东部地区及附近岛屿。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浙东地区开辟最早的敌后抗战基地。在这块战略基地上,由中共定海县工委在 1939 年 7 月直接领导组建的定海县吴榭乡自卫队以及 1940 年初重建的定海东区警察队(东区抗日武工队),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宁绍地区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①。对党领导的浙东第一支抗日武装的研究,历来是地方党史的一热门课题。本文试就从它创建的历史意义以及蒲岙伏击战的时间等问题作一探索,略述拙见。是否有当,恭请前辈和同仁指正。

一、浙东敌后第一支抗日武装创建的历史意义

1940 年 2 月,中共定海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重建东区警察队(后改称“五大”),这是定海人民革命斗争由经受挫折走向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也是中共浙东地区党组织



图为 1993 年 11 月,钱铭岐等老同志在王家恒等同志陪同下访问定海东区老根据地时在中共定海县工委旧址前留影。

灵活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结果。并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此,我们力图通过“五大”的创建对浙东敌后抗日形势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能够加深和丰富对这支部队创建本身及其历史意义的认识。

第一,争取了宝贵的先机,及时组建抗日武装,开辟了浙东最早的一块敌后抗战基地。1939 年 6 月 23 日日军占领定海,国民党定海县政府未作抵抗就撤到大榭岛和镇海柴桥地区。中共定海县工委当即召开了紧急会

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东区农村,抓住定海地区政治大变动的重要机遇,建立抗日武装,领导定海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7 月,县工委书记王起在吴榭乡党员梅馨的配合下,迅速组织了一支由工农分子参加的抗日游击武装——吴榭乡自卫队,由党的统战对象、吴榭

乡乡长梅燕翼任队长,中共党员、印刷工人褚公良任副队长,梅馨任指导员。但遗憾的是,当年 9 月,因梅馨同志的牺牲,国民党县长苏本善乘机将吴榭乡自卫队扩编为县抗日自卫独立中队,任命褚公良为中队长。此后,褚公良靠向苏本善。

鉴于上述情况,定海县工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接受了吴榭乡自卫队被编并的教训,紧紧抓住定海县国民党政府退出舟山本岛的有利时机,争取宝贵的先机。为此,中共定海县工委书记王起通过东区吕道英区长的统

战关系，在 1940 年 2 月以东区抗日武工队(也称区署武装组)的名义重新建立起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支武装首批 12 名成员中，中共党员占 8 名。同年 7 月，武装人员发展到 30 余人，并更名为东区警察队(也有与东区抗日武工队并称)。此后，部队通过多次实战和反“扫荡”的锻炼，人员迅速扩大，1941 年冬改称为东区警察大队。1942 年 7 月，为适应浙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需要，改用“定象保安总队第一支队第五大队”(简称“五大”)番号。到 1943 年，“五大”发展成为 300 余人枪的大部队，成为中共三东工委在定海、镇海、鄞县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主力。“五大”的创建，开辟了浙东最早的一块敌后抗战基地。

第二，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打开了浙东敌后抗日战争的新局面。浙东敌后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她从创建到发展壮大，都得到上级党委(宁属特委、三东工(地)委、浙东区党委)的重视和支持，先后派陈子方、楼童生、朱洪山、吴志先、徐长海、王群怀、吕芳、李斌、陈大江等中队以上干部来舟山，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五大”还将一批优秀的战士送四明山等地培训，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素质。这支部队从建立之日起，完全是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武装，干部、武器、供给均由党和东区区署解决。同时在部队中建立了党支部和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以王起为首的中共定海县

工委，他们都具有坚定革命信念和丰富斗争经验。如张起达在 1938 年 10 月至 1939 年 6 月曾担任中共定海县工委书记，领导定海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楼童生在 1937 就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任过中共余姚战时政治工作队党团委员，第三、第四区队长。陈子方也曾担任过余姚中心县委委员、动员部长等领导职务。作为领头人的王起，更已是一位成熟的领导。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所以能在舟山沦陷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建了浙东敌后第一支抗日武装。就是有了这样一个领导核心，在定海东区这块抗日游击根据地上，可以公开或者变通地执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打开了浙东敌后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第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主动争取抗日政治领导权，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日的信心。“五大”的创建，凝聚了可贵的革命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实践证明，在党组建的吴榭乡自卫队被国民党定海县长编并后的极其复杂情况下，中共定海党组织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又一次成功地利用了统战关系，重新创建了东区警察队。正是通过创建敌后抗日武装这项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浙东抗日斗争的发展。多次袭击了沈家门、大展等地的日伪军据点，狠狠地打击了下乡“扫荡”的日伪军，并且严惩了与人民为敌的汉奸，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日的信心。同时，“五大”的创建，对推动中共定海

党组织取得国民党定海县政府的合作抗日起了重要的作用。党组织为了把一些没有纪律性、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引上抗日的道路，中共定海党组织先后派遣张启达、俞泽芳、吴敏诚、张叔馨、王家恒、李伋等中共党员打入定海县国民兵团，由于中共党员的参加，自然使整个定海抗日局势得到了蓬勃发展。并使得“在反‘清乡’斗争中能做到互相配合，不发生磨擦。”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互相信任，真诚合作，真正做到了“以艰苦的工作与模范的行动，去取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第四、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进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定海东区“三三制”抗日政权的产生，也为“五大”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因此，我党在定海东区的 16 个乡普遍建立的“三三制”政权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如在芦花、蒲岙、茅西、北蝉、洞岙、白泉等农村发动农民上缴公粮谷，每年征收的公粮谷达数十万斤，在沈家门征收的税收“占部队全部供给的百分之九十”，而且沈家门还是“我们搜集敌人情报的中心”。同时还在定海东区的有关乡镇发展了一批党员，并成立了党支部(小组)。并把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输送到武装部队，促进了浙东抗日形势的快速发展，推进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

通过上述的考察可以使我們认识到，“五大”的成功创建，它对舟山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的展开乃至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正是这些影响和作用从本质上规定了它的历史地位。

二、蒲岙伏击战时间考释

“五大”(东区警察队)在创建初期,坚持在舟山本岛和附近岛屿活动。领导群众开展反“清乡”、反“扫荡”的斗争。多次攻打沈家门、大展等日伪军据点,伏击下乡“扫荡”的日伪军,在三年多时间里,对日伪顽作战数十次。但有的战斗时间,在缺乏真实历史根据的情况下几乎成为定论,因此,笔者在此对蒲岙伏击战的时间进行一些说明。

蒲岙伏击战是在东区警察队(“五大”)创建初期的 1941 年打响。由于这次战斗“是共产党人在浙东敌后对日伪军的一次直接战斗”^②。所以它在浙东地方革命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书刊和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对蒲岙伏击战的确切时间说法不一,归纳起来有下列两种:

第一种是“5 月”说。此说始见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舟山革命斗争史资料》及有关报刊和地方志书等。

第二种是“阴历八月”(公历 10 月)说。此说始见于老游击队员张友土《关于芦花分队的情况》一文以及《舟山市普陀区革命烈士材料》等有关资料。

关于蒲岙伏击战的时间,尚有别的说法,但主要是以上两种。其中第一种“5 月说”,以之对照史实,缺乏真实历史的依据,经不起推敲。笔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查阅了当事人

和知情人员写的回忆文章及有关资料,并且走访了 20 多位健在的当年亲眼目睹过蒲岙战斗的老人,他们都纷纷一致地说:虽然确切的时日无法回忆起来了,但那次战斗发生在下半年的农历八月(公历 10 月)至今还是记忆犹新的。据此,蒲岙伏击战的时间为第二说是应该肯定的。有证如下:

理由之一,与参加战斗的当事人入伍时间相同。据《舟山革命斗争史资料》第二十七期中《关于芦花分队的情况》一文记载:“一九四一年八月(阴历,公历 10 月)某天……由叶涛介绍,我和王小娘、王安福等四人向陈(子方)提出要求参加游击队……陈见我们表现很坚决,便把我们带到蒲岙大沙湾……晚上就留在蒲岙住在一个农民家里……第二天陈子方就把部队拉上山,我们四个新兵也发了枪,让我们参加战斗。”此文由原东区警察队(“五大”)老游击队员张友土口述,舟山市普陀区党史征研室主任祁德雨同志记录整理。据记录者讲,张友土同志回忆当年参加游击队的重要日期时是讲得很清楚的。

理由之二,与烈士档案记载的时间相合。近来我们又查阅了当年与张友土一起去参加东区警察队的,次年在普陀山战斗中不幸被捕遇害的王小娘、王安福烈士的档案,在他们的“情况调查表”中也有“一九四一年八月(阴历)同张友土、王阿来一起去施家岙叶涛处,经叶涛介绍由陈子方带到勾山(蒲岙)大沙湾参加部队。后在大沙湾与日寇打了一

仗”^③的记载。另据舟山市普陀区民政局档案室的《革命烈士材料》中,也有“王小娘、王安福一九四一年十月参加我党领导的定海(东区)抗日武工队(东区警察队)”的记载。可见,上述资料均说明他们参加蒲岙战斗的时间在“一九四一年阴历八月”,即公历 10 月。至于《普陀英烈》讲王小娘、王安福参加东区警察队的时间是 1941 年 8 月,这可能是阴历与公历之误。

理由之三,与当年目击者的时间相同,为了证明张友土同志说的蒲岙战斗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阴历八月,我们又查阅了在 1985 年 7 月 11 日根据勾山桐岭村书记郑秋根同志回忆及其他人补充后整理而成的《蒲岙伏击战》一文。此文的作者不但写作态度认真务实,而且集中了当年蒲岙一些知情的“红心白皮”保长等老人的回忆而写成的。此文中不但讲到月份,而且还有日期的记载:“一九四一年农历八月初十,党领导的短枪队(东区警察队)和褚公良部一起进驻蒲岙乡桐岭。八月十二日……伪军郑留忠部到蒲岙一带“清乡”……我东区警察队和褚公良部队一百多人……先后向敌人开火,并向敌发起攻击。”^④这里明确指出战斗打响的时间是在农历八月十二日,即公历 10 月 2 日。此说也与老游击队员张友土的回忆相吻合。

理由之四,与割早晚青稻季节相合。我们为了拿第一手资料来佐证张友土等当事人回忆的蒲岙伏击战的时间,于 2001 年 6 月 25 日同桐岭村 80 岁的老交

通员金阿明等进行了座谈,他说:“蒲岙打仗那天早晨,陈子方的警察队从大沙湾开到小西岸后面的大平岗山一带埋伏。我受时任定海战时政工队员的哥哥金明善的指派去探听敌人的消息。因当时是割早晚青的季节,我就挑着两只箩筐,以外出收购牛骨头做肥料为名去侦察敌情。当走到山头黄时,见到警察队步哨阿坤从碾子跟方向奔进来,他对我说:‘不要出去了,日伪军来了,要打仗了!’我连忙和阿坤一起回到小西岸,他从张家山嘴奔上去,向埋伏在山岗上的警察队报告去了。”虽然金阿明同志对蒲岙伏击战的确切时日无法回忆起来了,但他对自己亲身参加过的侦察工作细节还是记忆犹新,对当时的季节还是记得比较清楚的。与金阿明持“割早晚青稻季节”相同观点的老同志还有好几个,如叶如决、周善富等老人。其中说得比较详细的有 75 岁的金友棠老人,他在 2001 年 9 月 19 日回忆说:“蒲岙打仗时间在下半年的割早晚青季节。为什么我对这个季节记得比较牢呢?因为打仗那天我家正好开镰收割早晚青,我和哥哥把稻桶抬到敖干时,突然听到现在办康福院后面的山上有枪声,我们兄弟俩

急忙躲进敖干颜富堂家里。这时只见到大西岸山及大平岗一带到处都有游击队员在移动。”桐岭村的杨阿毛老人也证实说:“打仗那年我还在蒲岙庙学校读书。仗打响后,我就钻到自家屋旁边的晚青田里躲起来,当时晚青将要收割了,田里蚂蝗很多,我被蚂蝗咬得很痛,所以这个季节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理由之五,与挖番薯的季节相符。2005 年 6 月 7 日,我通过勾山街道办事处再次与蒲岙社区的知情老人进行座谈。76 岁的姚阿庆老人说:“抗战时期我家住在现在的康福院那里,到解放后迁走的。那次蒲岙打日伪军,有一支游击队在我家后面的姚家后山及大潭坑一带的大西岸山上埋伏了好几天。打仗前一天我正好在山上放牛,当时地里的番薯已经可以吃了,我在自己家地里挖了几根番薯送给他们吃。”一位 79 岁的姓方老人也说到。“蒲岙打仗时番薯已经快好吃了”。按舟山的气候条件来推算,如果在公历 5 月,有的山地番薯苗还没有播下,哪有番薯可挖?山地里的番薯可以挖的季节也正好是农历八月,即公历 10 月。

现在,我们不用再一一列举

老人们对当时季节的回忆。通过上述论证,根据老游击队员张友土等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和王小娘、王安福的烈士档案以及当年亲眼目睹过蒲岙战斗的老人们口碑,我们应该肯定:以往有关史书及县志、镇志等对蒲岙伏击战的时间定为“5 月”有误,唯有“阴历八月”(公历 10 月)的说法才是确切的。

“五大”的创建,在抗战初期的浙东敌后虽然只是新生的幼芽,但它却是浙东抗日斗争中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典范,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抗战初期中共定海党组织创建的浙东敌后第一支抗日武装,这是革命先辈为舟山人民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时代虽然已经改变,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也与以往有所不同,但中共定海党组织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又有正确的战略部署和广大党员、干部的献身精神,保护群众、发动与组织群众,与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些创建“五大”的基本经验所赋予的价值,却仍然值得我们撷采弘扬。

注 释:

①《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第 395 页。

②陈子方:《抗日武装“定象五大”简述》,见《鏖战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抗战纪实》第 174 页。

③舟山市普陀区史志办《专题材料》1985 年第 26 卷,第 5 至 6 页。

④舟山市普陀区史志办《专题材料》1985 年第 20 卷,第 2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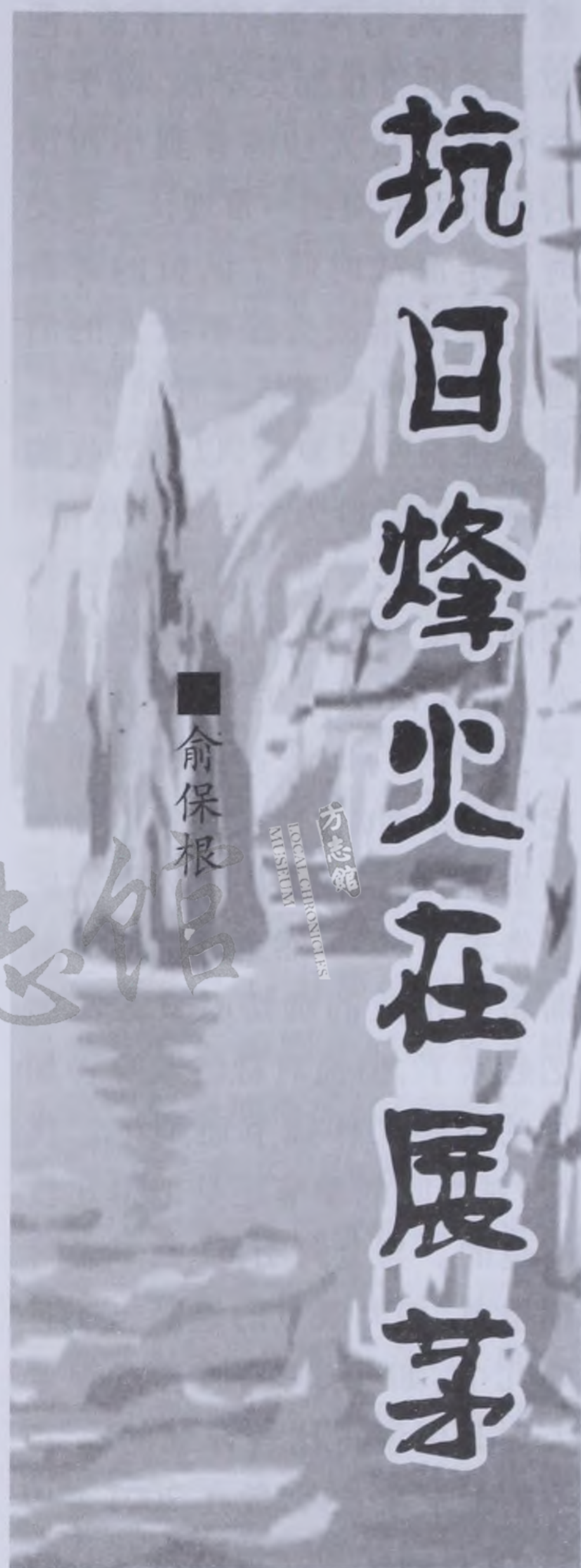
1939 年 6 月,日寇入侵舟山,汉奸活动猖獗。是年 8 月,汉奸缪昌轩(螺门人)带着 10 余名特工队员,耀舞扬威地来到大展。此后,他们横行乡里,不可一世,先后烧掉张家祠堂、张昌林房屋和茅洋都神殿。怒火,在展茅人民胸中燃烧。他们要革命,要斗争,他们急切盼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0 年 2 月,国民党定海县政府把定海本岛重新划分为两个区,任命吕道英为东区(洞岙区)区长,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吕道英表示愿意我党派干部去区署参加领导,共同抗日。以后,共产党员楼童生、陈子方、王群怀先后为代理区长、指导员,以东区区署名义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并建立了东区抗日根据地。

东区以黄杨尖为中心,辖 16 个乡,其中包括展茅乡(当时为茅西、大展乡)均属我党领导和控制下的农村抗日民主政权。这些乡,按照我党部署,实行“三、三制”政权,进行征粮、收税,实行“二五”减息。那时,定海党的领导机关都在展茅住过。王起、厉文倩、徐长海、邵光淮、陈明、陈亚英、陈子方、钱铭岐、楼童生、张翼、丁菲等人都先后在此领导群众坚持抗日斗争。当时的茅西乡乡长徐方葵,为人正直,抗日爱国,楼童生常去他家,关系很好,俩人经常商议抗日救亡事宜;大展乡乡长张相泰,经过徐长海、楼童生的统战工作,也主张抗日,愿意支持东区工作。为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党组织又分别委派徐林、徐

长海两同志为茅西、大展两乡事务员,在三北游击根据地和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建立前,定海东区是我党在浙东可以公开活动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东区成为浙东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坚持到 1943 年 10 月主力武装撤至四明山时结束。

东区抗日政权建立后,以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教师为主组成的定海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就顺利地进入茅西、大展两乡。政工队的活动起初在茅洋一带,以后逐步扩展到路下徐、上潘孙、柴家和大展乡的张家、翁家岙以至整个展茅地区。政工队宣传爱国思想,动员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农会、泥木工会、轿子工会、蔑竹工会。此时的政工队,还自编通俗课本,办夜校,使广大群众接受革命道理和抗日救国思想。为培养和锻炼党的政工干部,大展翁家岙的“翁氏三姐妹”翁瑞英、翁敏、翁世宁还参加中共定海县工委在勾山蒲岙大沙湾举办的妇女训练班。“翁氏三姐妹”的小弟翁世俊,在政工队员徐长海等人的启发、引导下,从小学习革命理论,阅读了《苏联月刊》、《小夏伯伯》、《大众哲学》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革命书籍,抗日救国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这时起,翁世俊便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积极分子,每当政工队在他家召开会议,他总是主动放哨。1941 年 2 月,年仅 14 岁的他就毅然离开家庭,到我党控制的东区区署做文书工作。在险恶的环境下,他经常装扮牧



童,机智勇敢地混过关卡和敌人的搜查去搜集情报、送信联络,活跃在洞岙、蒲岙、勾山、大展等敌后游击区。

革命人民的抗日举动,引起日寇极大恐怖,他们加紧调集兵力,疯狂发动“清乡扫荡”,有不少爱国志士和革命群众惨遭日军杀害。此时,陈子方、朱洪山领导的东区警察大队短枪队也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1941 年 4 月,日寇侵占宁绍一带,调走了一部分扫荡部队。他们为了继续清乡扫荡,争取以华剿华方针,从岱山调来伪治安

大队郑留忠部进驻沈家门。共产党员楼童生指挥下的东区抗日武装力量取得蒲湾战斗胜利以后,加深了敌伪军之间的矛盾。是年9月,郑留忠部100多伪军被赶出了沈家门继而进驻大展,设立据点,妄想消灭我抗日武装。与此同时,伪东区自治会会长王秉楚也进驻大展。接着成立“大展自治区”,王秉楚兼任会长,下设民政科、公安科、财政科、田赋科、庶务科,企图压缩我党活动范围,伺机消灭抗日力量。

为了打击王秉楚的狂妄野心,粉碎日伪清乡阴谋,我党领导的东区警察大队,联合友军,在展茅革命群众的支持、配合和楼童生、陈子方的指挥下,于1941年9月28日组织了大展战斗,主动进攻大展日伪据点。由于事先联系的内应未起作用,我军又缺少攻占碉堡的武器,致使王秉楚和郑留忠龟缩在大展庙据点负隅顽抗,没能消灭其武装力量,但沈家门和白泉的伪军也不敢出援。这次战斗,加激了敌伪矛盾,鼓舞了人民革命斗志,伪治安大队郑留忠部由此被赶出了大展。

战斗结束后,部队胜利转移到北蝉乡小展的汤岙。这是一个山谷平地,西边的小展岭通白泉,东边牛皮岭通大展,南边黄扬尖山通洞岙,北边靠大海。9月30日下午四时,发现东西岭上有敌情,楼童生同志预感部队被包围,便当机立断,决定部队向北下海,沿海边绕过小展岭突围,自己带五个东区区署工作人员和政工队员,奔向黄扬尖,以转

移敌人视线,掩护部队撤退。日寇很快发现向南转移的目标,来个三路合围,把他们包围在黄扬尖岭上,楼童生、陈庆恒、董千里、翁世俊(展茅翁家岙人)等同志在黄扬尖纯阳寺、仙台寺一带与日伪军展开了英勇搏斗,终因敌众我寡,在子弹打光后英勇牺牲。由于日寇被牵制到南边去了,部队顺利突围到皋泄乡。

1942年10月,东区警察大队获悉伪大展自治会会长王秉楚将带10个伪兵到路下徐亲戚家吃喜酒,指导员王群怀等拟定混入内部与外围隐蔽相结合,伺机活捉王秉楚方案。按方案,吴洞,芦蒲等三武工组共十七、八人向路下徐靠拢,因路途较远,到达时间已晚,院内开始演戏,大门无人进出,难以混入。当先头战士用枪抵住伪军哨兵时,伪军丢枪跑向门内,被击毙,枪声惊动伪军关门,打碎汽灯,翻越后墙逃跑。武工组突破大门,怕误伤群众而撤出战斗。此战缴步枪一支,毙伪军一人。

通过几次战斗,敌人发现我主力还完整地存在,便更加疯狂地进行清乡。他们充分利用军用公路和海上舰艇,争取抓住目标,不分昼夜突然奔袭的战术,妄图压制我革命武装,展茅人民为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41年11月,日军派中队长高田、小队长中川率士兵在大展建立据点,张阿福等七人以种种猜疑而被杀害;日军大展派遣队在大展修筑工事,有四名当地群众被以“怠工”之罪枪杀在黄扬尖山上,1940年10月,伪大展自治会会长王秉楚在大展自治会成立一

周年大会上宣称:一年当中,在自治会所辖范围内有114名抗日游击队员和群众被杀。

展茅人民化悲痛为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与日伪势力作誓死的斗争,1942年冬,他们配合“五大”(东区警察大队前身),将伪大展镇镇长、汉奸史致孟抓获,处决在芦花里山;1943年5月22日,大展王秉楚部伪军10余人,全副武装地到芦花要款要粮,敲诈勒索,抗日“五大”根据展茅群众提供的情报,迅速出击,在施家岙袭击敌人。这次战斗,俘敌三名,缴步枪七支,短枪一支。1945年4月,田公岙人徐小玉在当定海县特务队队长之际,曾在沈家门策动一个班伪军起义,还先后活捉了四名日本鬼子和二名翻译。

展茅,这一浙东抗日的前沿阵地,一直被敌人所注视。他们害怕展茅,又不遗余力地控制展茅。1943年,日寇对在展茅的反动势力进行了频繁调整,先撤消大展自治会,进而成立伪定海县第三区署(即大展第三区署),半年后又将该区署撤消,直接由日伪治安大队接管。治安大队30多名武装人员,认贼作父,肆意杀人、放火、抢劫、奸污。在艰难的岁月里,展茅人民没有被凶残的敌人所吓倒,在党的领导下,他们仍配合抗日游击队四处打击敌人,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展茅直接参加抗战或从事抗日活动的革命志士共有52人,其中34名为国捐躯。

一九四二年东极大营救追忆

■蔡和平

一九三八年农历正月初一，我父亲蔡云章由我姑婆领着，从宁波镇海老家来定海谋生，住在定海大道头开“鸿源”南货店的姑婆儿子张鸿华处。同年公历三月，由张鸿华介绍，从定海只身来到普陀东极青浜岛，进入由当地商界头号人物，身兼国民党副乡长的许毓嵩开的“许祥记”店里，拜许毓嵩为先生，学生意。那年我父亲十四虚岁。

“许祥记”经营烟、酒、糖、粮食、南北货以及一些治小病小痛的常用药和当地岛民的一些生活必需品。“许祥记”还兼营渔行，代客商收购鱼货，赚取佣金。起先，许毓嵩弟弟许毓胜也一道在店里做，我父亲称他“阿胜先生”，后来兄弟俩因故分开做了。许毓胜开了一家渔行带杂货店，店名“许胜记”，拥有七艘大冰鲜船，还拥有自己的武装，有一挺轻机枪和十余支步枪。许毓胜拜定海县国民兵团第四大队副缪凯运为先生，以缪为靠山保护其在海上经商活动。解放前夕，许毓胜任国民党副乡长时，曾为我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那挺轻机枪由许毓胜捐献给了“舟支”徐小玉司令。

店里又陆续进来三名学徒，我父亲属老大，老二林鑫塘，后

来投奔定海县国民兵团第四大队王继能部当兵，解放前夕跟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老三汪国品，解放后在定海航务局装卸工区工作。老四沈邦士，解放后在定海粮食系统工作。许毓嵩约于一九四七年夏天，乘带角船从沈家门配货回青浜山途中，在位于普陀山与洛迦山挑担处洋面上，碰上渔民俗称“山窍风”的风暴而船翻人亡，尸体也没捞上来过。

许毓嵩以做糖果，摆小糖摊起家，有一手做糖果好手艺。粽子糖、生姜糖、花生糖、冻米糖等十几种糖果都能做。

青浜岛上的居民主要以温州人、宁波人和台州人三部分人组成。温州人占全岛二百多户人家中的一半。台州人很少，他们在岛上影响比较小。

许毓嵩因经商而发达起来，但是，他那些被生活所迫，背井离乡来青浜山落脚的乡亲们几乎都是些贫苦山民，两手空空，在岛上的空隙处，用乱石、芦苇和毛竹搭起的草屋里安身。他们或租船、或受雇于人。男的大都以落船扞鱼、涨乌贼笼、拱淡菜、撩海蜇为生。女的以剖鱼鲞、剖乌贼鲞、晒鲞和加工鱼货为生，还兼种一些蕃茄以及蔬菜。他们

的生活都非常贫困。他们中间很多人得到过许毓嵩的接济和帮助，因此他在温州籍老乡中享有威望。温州籍岛民与其他地方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发生冲突、斗殴或温州籍人内部发生纠纷时，都由他出头摆平。我父亲在“许祥记”做事的几年中，许毓嵩夫人居住在许毓嵩的老家——温州瑞安营前乡大树脚村，抚育一子二女。我父亲于一九四四年三月，谢绝许毓嵩的一再挽留，离开“许祥记”回沈家门到“复和”做店员。许毓嵩儿子许阿印从老家来到青浜山接替我父亲的工作。

“许祥记”四间砖瓦店铺座落于青浜山的政治经济中心——南岙。离店面约四十米，再下个坡就到了南岙避风港，港里停泊的船舶数量是全岛各港中最多的，也是最热闹的地方。

转眼到了一九四二年十月。那年我父亲已经满师，成为“许祥记”的一名店员。经过在岛上几年的磨练，练就一身好水性，加上原来在镇海老家读过四年半书，中途跳级，高小结了业。在当时当地也算个有文化的人。摇舢板，下海拱淡菜，落船收购鱼货，押运货物等都能胜任，深得许毓嵩信任。

农历壬午年八月廿三(公历四二年十月二日)清早,我父亲在店里忙了一阵子,和岛上的居民一道发现,昨天已有所闻的那艘出事的大火轮,现正在浪岗山与青浜山挑担处,偏向浪岗山一侧的海域里。大火轮的旁边并着小船。因距离远,船上的活动看不清。人们猜测,可能是大火轮漏水了,小船在帮助大火轮卸货,以减轻大火轮的负担。我父亲挤在人群中看了一会儿,就回到了店里。约摸过了二、三钟头。突然之间,从店门口急匆匆过来几个人,边跑边喊:“大火轮要沉落了!快去看!”我父亲闻声奔出店门,跑到庙岗墩“李富记”店墙边(“李富记”老板娘名叫邱多宁)。此处视野比较开阔,极目远跳。只见那艘“插蜡烛”的大火轮,船头像鹅头颈样昂着,船尾巴已在缓缓下沉。大船旁并的小船已经让开。隐隐约约见船上有东西往海里坠。船头快速往下沉。忽然,一股水柱往上冲,水柱很高,我父亲从来没看到过这么高的水柱,像小山一样高,待水柱落下后,大火轮不见了。只看见一根桅杆孤独地耸立在海面上,事后桅杆被人偷偷锯掉拿走,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

从庙岗墩望去,落水者麻麻点点从水中钻出来,随汹涌的潮水(当时是东北水)与货物(当时人与货物分不清楚)一道往青浜山与东福山方向余来扩散着,后来终于看清落水的是人。我父亲惊呆了,醒悟后,撒腿往店里跑。见到许毓嵩后,大声地说:“先生!不好了,出事体了,那艘大火轮我亲眼看其沉落了,海里落水的人浮满了,还有货色。”许先生忙

问:“现在在啥地方?”我父亲答道:“大约在青浜山与东福山挑担处,现在正向白篷门方向余来。”许毓嵩沉吟片刻,吩咐我父亲和一个温州籍青年渔民驾船到出事海域去救人,叫汪国品、沈邦士两位师弟管好店门(此时林鑫塘已在王继能部当兵),自己飞快出去,召集岛上上层人物商量营救对策去了。

我父亲他们跑到南岙港,解开缆绳驾了一艘俗称“划划船”的拖乌贼用的划舢渡。一人摇橹,一人划桨。还有好几艘船也解开缆绳,一同劈波斩浪,快速向白篷门摇去。白篷门位于青浜山与西福山挑担处,此处海域整日里白浪滔天,看上去一片白雾濛濛,像一块大篷布,因此而得名。

现在正逢东北水转东南水潮流,只见波涛中到处都是落水者与货物,随着潮流而余着。面对洋面上诱人的布匹、橡胶原料、啤酒等物(这些都是后来弄清的,当时都把它们当作洋货)。我父亲和那位渔民兄弟遵循海岛人民“人命关天”的善良品质,毫不犹豫地將船摇向落水者,幸存的落水者见有船划来,就向小船游来。将第一位落水者救上船后,才看清了,原来是个红头发,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身上只穿了件背心和内裤。双方语言不通,从手势和脸部表情看,对方很友好。也管不了许多了,救人要紧。这时大批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大大小小各种渔船急驶而来,迅速投入到救援行列中。事后知道,这是许毓嵩和岛上上层人物自发组织的大规模营救行动。

这些民间自发来参加救援

船中,也包括一些原先想擦一些洋货改善生活者。但当他们看到在海潮中苦苦挣扎,生命危在旦夕的落水者时,都能发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朴素的传统美德,以救人为主。

有一艘庙子湖岛的渔船,那天闻讯以后,也往往出事海域急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日本兵,全副武装,可能因为来不及跳到他们自己的救援船上去,也在海上漂浮着。看见有船开来,这个日本鬼子远远地举着枪,枪口对准船上渔民施淫威,用日语叽哩哇拉怪叫着,似在威胁命令渔民来救他。鬼子的凶相,把船上三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渔民的肺都气炸了,平时鬼子上岛来干尽坏事,骑在中国渔民头上作威作福时,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如今成落水狗了,还要这样凶,将枪口对着渔民,他们三人小声地商量起来,一个渔民说:“我们这次来救人,顺便擦了一些洋货,要是让那个萝卜头(因鬼子都剃光头,所戴战斗帽后的一圈布像萝卜叶子,所以当地岛民称鬼子为萝卜头)上船后发现了,他手里有枪,又那么凶神恶煞的,要是将我们押到鬼子司令部去,我们的性命就要断送在这个萝卜头手中了。”另一个渔民想了一下说:“我看可以这样办,这个萝卜头他要爬上船来时,必定伸出双手来攀船帮,这时他就不能拿枪对准我们了,我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用舵牙敲其头,结果他。”其余两位渔民都表示赞同,当那鬼子游到船边时,三人假装堆着笑脸,一边叫着:“东洋先生,东洋先生。”一边悄悄把一支舵牙移

到船帮边。等到日本鬼子把枪转身往背上一背,伸出双方搭住船帮往上爬时,其中一位渔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起舵牙,给了鬼子当头一舵牙,鬼子哼了一声就滑到海里去了,另外两位渔民迅速跳下去,把鬼子摁在水里淹死了。然后缴了鬼子的枪和子弹带。用压舱石绑住鬼子的尸体,沉入大海喂鱼去了。这支缴获的三八式步枪后来上缴给了乡里,又由乡里将枪发给庙子湖岛用作保护岛上安全之用。

我父亲和那位青年渔民,划着小船,又陆续救上来三个落水者,总共救了四个人,期间还撩了一捆布。这时船上共有六个人和一捆布。小船有点承受不了负荷,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小心地往回划。我父亲他们上岸后,才知道救上来的人是盟军,是打东洋鬼子的,是自己人,他们被日本鬼子抓住做了俘虏。后来还知道了那艘沉没的大火轮叫“里斯本丸”,是日本船。这时不停的有船装着英俘往岸上送。获救英俘中的一些人被当地好客的岛民接入家中,还有一些人就坐在依青浜山形而建,酷似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式的石屋墙边地上。这时大约下午二至三点钟。我父亲则把救上的四个英俘领回店里。我父亲找到了忙碌中的许毓嵩,许毓嵩吩咐将店里的粮食和衣物拿出来,好好安顿英俘。约下午五点不到,国民党书记员赵筱如登门后,分派来四个英俘,店里一共收留了八名英俘。赵筱如是安徽合肥人。

这时除了将部分英俘安排在岛上的“天后宫”庙宇内安宿

外,还有一部分英俘分派到当地居民家中。当时岛上的居民受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的压榨、渔霸长期的剥削、海匪的抢夺、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掠夺欺压。普通岛民的生活极其贫穷,家里存粮很少。许毓嵩除了从店里取粮和衣物供应聚集在“天后宫”庙宇内的英俘的需求外,又吩咐我父亲,凡来店里供饭给英俘的困难岛民来借粮,一律赊给他们,不要拒绝。店里总共借出了三百余斤大米给岛民,用于给英俘供饭。虽然借粮人都留了名,记了账,但是有些岛民实在太穷了,无力偿还。以后只归还了不到一百斤。事后,许毓嵩对我父亲说:“这些米借出去给英俘供饭,是做好事,做善事,有些人还不起,不要去讨,不来还也就算了。”以后,还有二百多斤借给岛民的大米帐就一笔勾销了。

晚上,因许毓嵩忙着与岛上上层人物商量帮助英俘归宿的大事,没回店里过。招待安顿八名英俘的事就由我父亲主持。那天晚上,烧了一大锅大米粥,蒸了一些鱼鲞、乌贼混子、乌贼肚肠,切了一大碗海蜇头,还盛了一大盆腌海菜菇、一大盆腌冬瓜糊。大家围了一大桌,一起吃得很开心。八位英俘暂时忘却了危险处境,都很乐观。他们个个都不会用我们中国的筷子,只能用调羹和手抓着吃。他们一边吃还一边伸出拇指连声叫:“OK!OK!”饭后,我父亲烧了一大锅热水,拿出毛巾,让英俘洗了把脸,擦了擦身。因岛上淡水资源非常珍贵,英俘也很理解。英俘们身上的衣服穿得很少,夜里有点儿

凉,我父亲很同情他们,就拿出了几件旧衣裤送给英俘穿。英俘接受衣服后很感激,他们从自己裤腰里摸出了几枚银币塞给我父亲作纪念。因为过去了六十多年,这些银币都散失了。前些天只翻出了一只一面是英文,一面为中文,表明是广东造的银币。经请教本市钱币界行家签定,这只银币是当时国内使用的钱币,但也不排除这种广东造的银币在香港地区民间流通的可能性。

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人,晚上我父亲只能在店堂一角的地板上,铺了几领草席,拿出几条毯子,让英俘将就着安顿在那里睡觉。平常时候,我父亲他们几个店员也睡在地板上,有地像杂技演员一样睡在柜台上。

许毓嵩那天出门后,就召集岛上的上层人物商量营救英俘的事项去了。当把幸存的英俘救上岛后,怎样把英俘安全送到象山(抗战时定海县政府流亡在此)的苏本善处犯了难。后来由许毓嵩提议,在英俘中找到了一个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英国人的混血儿,能讲汉语。让他充当翻译,中英双方经过沟通,找到了一个原英美烟草公司的大班和一个原英租界上海工部局董事,后来撤退到香港后,在港英政界做事的两名英俘中级别最高的人物。并将这三名英俘列入重点保护对象。那位英俘翻译跟我父亲在店门口有一次长谈,告诉我父亲他出生在上海,在上海长大,还有他们被俘经过等。那天夜里,许毓嵩和岛上的上层人物商量了一通宵,也没有拿出一套可行的办法。全岛都处在担惊受怕

中,许毓嵩等人派人不断地在海面上打探日本鬼子的动向,并派人与苏本善手下的人联系。许毓嵩深感事情重大,所以一直没有回过店里。天亮时打探消息的人回来报告日本鬼子出动兵舰向岛里开来。许毓嵩当机立断地说:“看起来,凭我们的力量,保护不了这么多英俘,这些英俘又要重新落入日本鬼子的魔爪了。但是,我们不将他们中保护几个下来,我们就对不起打鬼子的同盟国,也不好向苏县长交待。”于是许毓嵩等人最后议定,将选出来的上述三名英俘,交给可靠人领着藏到本岛的沙浦村南田湾小团洞里(团:舟山方言读 wan,指男孩。)小团洞是由于长期受海水侵蚀而形成洞口小,洞腹大,传说从前洞口只能爬进一个小团的身体,所以得此洞名,后来这三名英俘得到了岛民的精心照料。许毓嵩等人还关照全体岛民做好保密工作,如果让日本鬼子知道,全岛人民就要遭到日寇的血腥镇压。

日本鬼子很快用兵舰包围封锁了青浜山,岛上已是插翅难飞。一大群鬼子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枪,蜂涌登上了青浜山。那个戴眼睛的汉奸翻译官扯着嗓子怪叫着:“大家听好了,东洋先生要把救上来的英国人都带回去,你们一个都不许留,都把门开开,让东洋先生搜,如不听,敢把人藏起来,东洋先生就要对你们不客气,格杀勿论。”这时全岛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岛上到处都是乒乒乓乓鬼子用枪托砸门的声音和受害群众的惨叫声。日本鬼子把青浜山所有人家翻

了个底朝天。鬼子又是鸣枪又是吹哨。英俘除了三名被岛上居民冒死藏起来外,其余又都落入鬼子的魔爪。

这时,许毓嵩利用自己的身份跟鬼子,特别是那个汉奸翻译官周旋,极尽全力保护三名藏进小团洞里的英俘和全岛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由于他这个副乡长的尽职和努力,才避免了残暴的日寇准备对全岛救助过英俘的人员下毒手和烧房子。

这群丧失人性的鬼子兵上岛后,除搜捕英俘外,还大肆抢夺岛上居民的财物。那些由岛民从波涛中撩上来的布匹等物资,也几乎全部让日寇搜走了。

日本鬼子把英俘往海外集中时,我父亲和岛民亲眼目睹了鬼子野蛮地将当地岛民送给英俘遮体的衣裤强行剥去扔掉。有一名被鬼子强行剥去衣裤的英俘,一丝不挂地蹲在地上羞愤难当不肯起来,捂着脸失声痛哭,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身裸体,这是对人格多么大的侮辱啊! 那名英俘是在为得不到做人最起码的尊严而哭泣呀!这时,走过来一个没有人性的鬼子兵,用枪托狠命地揉那位英俘,用刺刀硬逼着寻名英俘起来,那位无助的英俘,只好用双手紧紧捂住自己的生殖器,怀着满腔悲愤,流着眼泪,低着头往海边走去。我父亲和旁边的岛民,目睹了这一幕,都恨透了这群禽兽不如的鬼子兵。

这群几乎赤身裸体的英俘被鬼子用枪口押解到海边后,鬼子用刺刀逼迫岛上渔民用二艘带角船装载英俘(每船可装十几个人),将英俘往停泊在老庙嘴头

旁边的运输船上驳。当英俘被押上带角船离岛时,他们都频频回首,向青浜岛上救助过他们的中国岛民挥手致意,有些人还流着泪,喊叫着道别。

几艘日本鬼子的兵舰停在青浜洋面上,虎视眈眈地在一旁监视着。运输船上站着两个刽子手似的日寇,当带角船载着英俘靠上去时,他们让英俘自己往船上爬,然后一人抓住英俘一只手,像扔麻包一样往身后的船舱里扔,船舱较深,直接往下扔,不时传来被扔进舱底而受伤的英俘的惨叫声。鬼子根本不把英俘当人看待。日本鬼子的暴行,都被远远观望着的岛民和二艘运送英俘的渔民看在眼里,牢记在心里,似烙印一样,难以忘却。

又过了几天,待连日来巡查青浜洋面挂着膏药旗的鬼子兵舰驶离后。许毓嵩等人再次碰头,联系到定海县国民兵团第四大队副大队长缪凯运。经过周密安排,将三位英俘化装成当地渔民模样,用帽子遮脸。乘一艘青浜岛渔民驾驶的渔船,由缪凯运带人武装护送安全出岛,再经定海县国民兵团第四大队大队长王继能派兵护送至象山,交给国民党定海县长苏本善。最后三位英俘辗转抵达重庆后,由英国驻华使馆接送回英国。

这次救援“里斯本丸”英俘的行动中,东极岛民济危拯难的义举,热情豪爽的性格和英俘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和知恩图报的优良品德。都给两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双方都将友谊铭记在心,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难忘的瞬间

回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片断

王兰生

2005 年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标志着我国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当时我只有 12 岁,在山东省博兴县郑家抗日联合小学读书。从我家乡到此上学要走 15 里路,并经过一个日本鬼子王家集炮楼。由于当地是我山东省抗日游击根据地,我们一周回一次家,背粮取物,一点也不害怕。期间 1945 年 5 月 17 日还经历了一次日本鬼子大扫荡,我们跟着博兴县独立营冲出了包围圈,我的一位同学高吉祥

不幸中弹牺牲。经过这次出生入死的考验,我们的意志更坚强了,实际上大家的小小心灵,已经把学校当成了一个抗日战争的战斗集体。

“1943 年,形势大转变”,时局已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这时解放区军民已经渡过了最艰苦的年代,处于反攻胜利的前夜,冲过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前面。

1944 年后苏联红军取得了卫国战争的重大胜利,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发动“太平洋战争”达到侵略亚洲、久占中

国、称霸世界的美梦迅速破灭,接着苏联红军很快出兵我国东北并对日宣战,日本 100 万关东军全部被歼,我解放区军民四面出击歼灭敌人,收复失地,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宣告无条件投降。

此时此刻,在胜利已经到来的一刹那,我们当时尚不知道这一喜讯,正在课堂听老师上课,突然听到轰隆轰隆的飞机声,由远而近,大家情不自禁地跑到外边举目四望,但见一架银白色飞

机正在低空盘旋,少顷,从飞机上犹如天女散花般纷纷落下白花花一片,随着距离的靠近,大家纷纷跑上前去拾取,方知是“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的传单,由于我当时年纪小跑得慢而未“抢”到,虽感到遗憾,但心中仍无比喜悦。

全村沸腾了,学校沸腾了,欢呼雀跃,放声高歌,大家一起欢庆这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特大喜讯。校领导宣布:“今天放假一天,写标语、开大会,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所在的抗日联合小学,在山东省渤海军区,司令员是杨国夫,政治委员景晓村,而当时不仅省会济南市仍在敌手,就连我们博兴县也尚未解放。大家七手八脚,一连剪贴了以下四条标语:“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欢迎杨司令、景政委收复济南”、“欢迎杨司令、景政委收复博兴”。这一天,大家沉浸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无比兴奋和喜悦之中。

回想起来,此事不觉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心中感觉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珍惜胜利来之不易,兴我中华,勿忘国耻。正是怀着这一心情,在 1951 年抗美援朝时期,我毅然从山东省高青中学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年仅 18 岁。1952 年又分配到国防前线舟山群岛中国人民解放军 22 军司令部机要处,一晃就是 50 多年。在庆祝舟山解放 55 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特将这段美好回忆追忆于此,以示纪念。

日军侵略舟山的又一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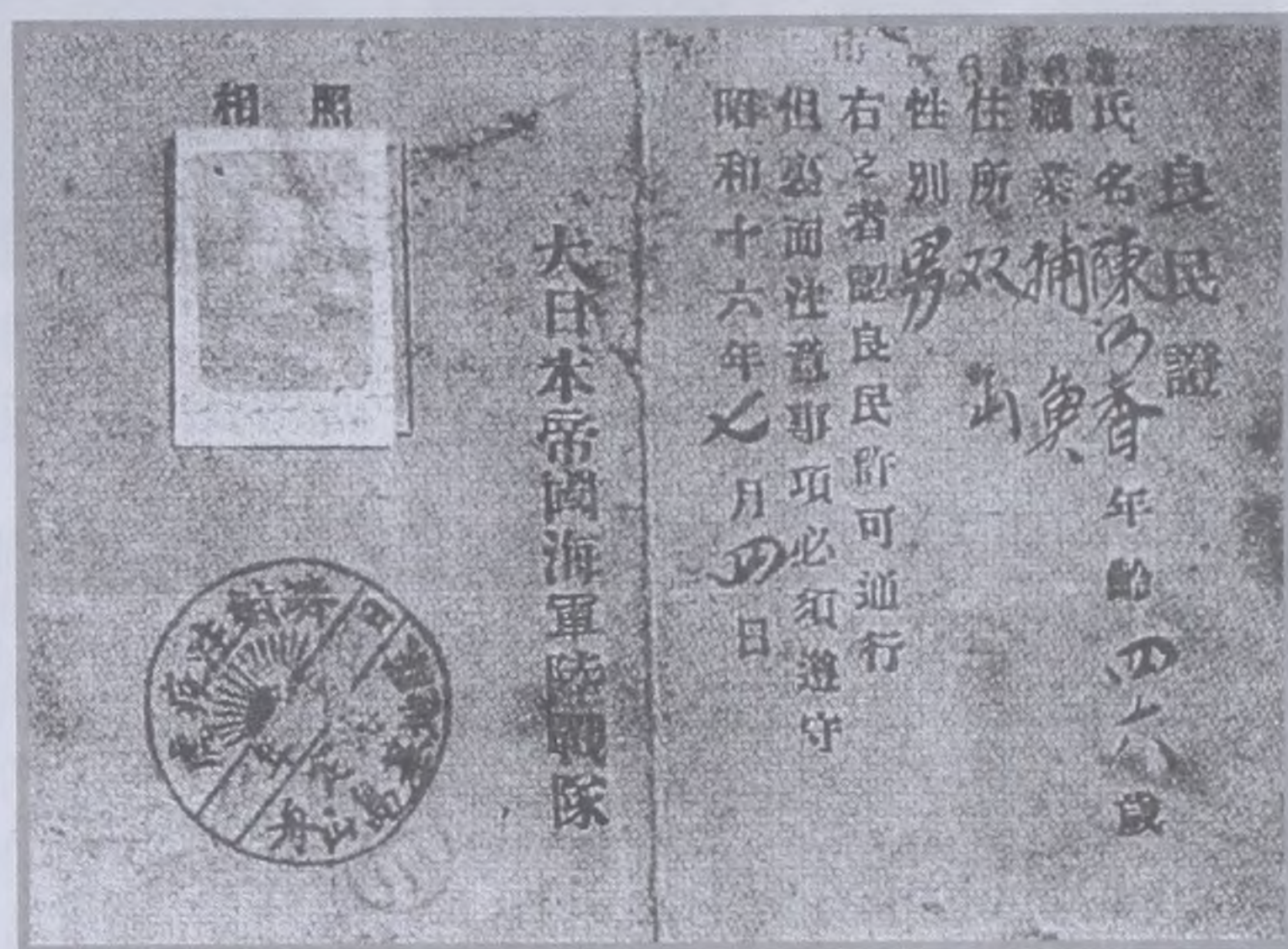
■ 车鸿云

1939年6月23日,侵华日军强占舟山。日军占领舟山后,把舟山作为发动对太平洋战争的海上基地,也是日军海军陆战队的补养供给地,又是日军入侵镇海、宁波浙东方向的集结地。1940年10月27日,日军飞机把装有麦子、粟米之类鼠疫细菌散到了宁波的东大路、开明街一带商店、民居的屋瓦上,前后113人悲惨死去。日军还在浙东的义乌县城、东阳、金华等地投下细菌。

1941年4月,日军占领镇海、宁波后,向浙东侵犯。日军为防止细菌战遗留菌疫在其军队中蔓延,特设立了“防疫部”,同时对控制下的舟山渔民、商贩注射防疫剂。日军强抢渔民捕来的鱼货作部队给养,又怕渔民与大陆的镇海、宁波来往染上细菌,

为避免卖鱼的渔民、商贩染上细菌导致驻舟山岛的日军内爆发瘟疫,日军在舟山强迫百姓做“良民证”,并对持“良民证”的渔、盐、商贩进行注射防疫剂。在“良民证”的右侧下部加盖蓝色圆

章“虎疫注射剂”、“定海舟山岛基地队”(见图)。“虎疫注射剂”是一种什么样的药剂呢?据民国《医药常识》记载:“虎疫”也叫“虎列拉”,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民国时期常把霍乱及鼠疫等瘟



日军驻舟山岛基地队(昭和十六年七月四日)
1941年7月4日发的“良民证”

疫称为“虎疫”。“虎疫注射剂”是一种针对瘟疫的免疫剂,日军对舟山岛民注射“虎疫注射剂”是为了保全其自己进一步侵略中国,也是日军侵略浙江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残留下的铁的罪证。

(上接第21页)游,可接着游洛迦山则更为方便。洛迦山曾先后归属朱家尖和白沙乡,后为普陀山佛协统一管理方便起见,又划归普陀山。

(12)无人岛礁。众所周知,世界上有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而中国有千岛新城舟山市。全市由1390个岛屿组成,海域面积达2.08万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

2448公里。另有无人岛若干,仅普陀辖区就有无人岛(礁)400余个,其中100余个尚待命名,内白沙岛有25个。舟山市已首批推出76个无人小岛,鼓励和引导外商围绕休闲景观房产、生态主题、海岛休闲娱乐城进行开发,目前已建成海岛特色休闲渔业基地15个,通过资金引进,进一步增加数量和扩大规模。全市

环群岛海上文化游项目已成功开发,发展形势喜人。全市旅游项目签约资金已达10亿元,一批新型项目正在筹建中。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白沙岛面临着广阔的开发良机,在生态游、休闲游、垂钓游、海鲜(美食)游、风光游、探险游等方面,均有优良的基础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必将有所作为和建树。



一对老战士与桃花岛的生死情缘

■ 邢学火

他到舟山群岛雇了一条小渡轮,在桃花岛、登步岛、悬鹑岛三岛之间的桃花港,为她主持一场没有花圈的葬礼。

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在桃花岛上相识、相恋,一生中把桃花岛看成是心目中的圣地;他们在风风雨雨的峥嵘岁月中相互搀扶,走过了48个春秋。2005年3月24日13时,她因病长逝;2005年7月27日,他们祖孙三代送她魂归桃花岛。

他是解放舟山群岛时的21军61师181团的宣传干事吴新华,浙江省体育局离休干部;她是61师文工团的文艺兵陈黎,原浙江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离休干部。他俩是老战友、老夫妻、老体育工作者。

在桃花岛相逢、相识、相比、相恋

1949年,吴新华随61师参加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桃花岛解放后又血战登步岛,在敌众我寡的危急关头,部队英明果断地撤回桃花岛,防止了全军覆没,

后来部队驻扎在桃花岛千步沙一带。

那年,61师文工团排了一出戏到吴新华所在的连队演出,师长胡炜的妻子吴旻饰演刘胡兰,而陈黎在那出戏里饰演刘胡兰的妹妹,作为部队派出的接待员,吴新华就这样认识了陈黎。他们相识后,互相挑战,比比看谁先入党。

那年冬天,登步岛战斗结束不久,有一天,吴新华和陈黎两人在平展如镜的千步金沙滩上散步,寒冷的海风把她的脸庞吹得绯红,羞羞答答的一曲《映山红》含蓄地传递了朦胧的情意。

由于当时部队制度严格,两人慢慢失去了联系。但两人在桃花岛上约定,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奋发进取,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1950年,战斗在第一线的吴新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无法将自己入党的喜讯及时告知心中的恋人陈黎。

舟山解放后,吴新华和陈黎又分别被派往朝鲜,参加抗美援朝

战争,可惜当时两人均不知对方在哪里。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陈黎首先脱下军装,分配到浙江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工作。

1956年,陈黎也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她入党后,马上写信告诉自己的恋人吴新华。

几经辗转,吴新华收到陈黎的书信,他俩的恋情在中断8年后又浮出水面。

1957年,尚在部队服役的吴新华和已转业的陈黎这对战地恋人,终于喜结连理,后生育一个女儿吴晓卫。如今,他们17岁的外甥女苏琬婷,正在西安军事管理学院学习,她将接过外祖父母手中的钢枪,踏上她母亲当年未能如愿的从军路,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贡献青春。

到桃花岛祭奠先烈,探访老乡

1976年,吴新华转业到杭州,在省体委工作,夫妻俩为浙江省的体育运动事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86年,吴新华、陈黎等几位在杭州的老战友,忽然发兴到桃花岛去故地重游。时隔36年,在战地相聚,回忆当年在枪林弹雨中流血牺牲的老战友,以及自己负伤的情景,他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来到桃花岛上,老战友们探访了当年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并专程到桃花岛革命烈士陵园祭奠了为解放桃花岛壮烈牺牲的老战友,同时到血战登步岛遗址祭奠先烈。

在桃花岛上,吴新华、陈黎等老战友,拜访了桃花岛解放时的农会会长王国富、农会治保委员邹庆球等老乡亲,并揭开了当年团部遭敌机轰炸之谜,邹庆球等乡亲们把后来揪出特务并镇压的消息告知了吴新华等。

“雪浪拍成千步沙,书生热血映桃花;翠竹从中红一角,杜鹃声里忆年华。”这是吴新华和陈黎1986年赴桃花岛战地重游时作的一首诗,他们一直把桃花岛看成是心目中的圣地。

“桃花岛不仅是我认识陈黎的地方,更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地方。这千步沙北侧的邹家塘是我们的团部驻地,当年由于有一名特务潜伏在桃花岛上,向

盘踞在悬鹑岛上的国民党军队提供情报,使我们团部搬到哪里敌机就轰炸到哪里。一次我被炸毁的房子压伤,血流如柱,被送进了卫生队救治,期间得到了

当地老百姓的精心照料,使我很快恢复了伤势。因此,我们把这里看成是一块心目中的圣地。”吴新华的这番肺腑之言,表达了对桃花岛这片土地的热爱之情、难忘之心。

风景秀丽的桃花岛,是吴新华和陈黎战斗过的地方,那里的山山水水见证了两人纯洁、坚贞的爱情。后来,吴新华和陈黎等老战友多次踏上桃花岛,祭拜先烈,探访乡亲。当他们看到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桃花岛,如今渔农村面貌日新月异,渔农民生活蒸蒸日上,特别是近年来桃花岛风景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使吴新华和陈黎萌发了把桃花岛作为百年之后的归宿的念头。

2004年清明节,吴新华、陈黎等11名老战友,组成了一个老战士扫墓团,到桃花岛和登步岛为烈士扫墓,并专程到塔湾村邹家塘去探访邹庆球等老乡亲。在邹家塘村口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她指着不远处走来的一位大娘说:“她就是邹庆球的老伴王仁梅。”听说村里来了当年的老解放军,村民们纷纷出来迎接,并把还挂在树上黄橙橙的“雪里红”泡橘摘下来送给老战士。年轻的村民虽然不认识老解放军,

但他们听长辈们说起解放时的历史,因此对老解放军有爱戴之情。除几名70多岁的老乡亲外,老战士们与乡亲们互不相识,但此时已是变陌生为熟识了。

原来,吴新华、陈黎等老战友1986年与邹庆球相会后,邹庆球不久就过世了。现在,王大娘一人独居在村中的一幢旧平房内,她说这房子是那次大轰炸时唯一留下的一幢房子了。当得知王大娘患有高血压等疾病,子女又不在身边时,吴新华、陈黎夫妻当即表示,回杭州后寄一些药品给王大娘治疗和备用。后来,由于药品投递不太方便,吴新华和陈黎干脆给大娘寄了500元钱。

王大娘收到500元钱后,非常激动,连声说:“这两老头(吴新华、陈黎)好足了,这两老头好足了!”

去桃花岛回归大自然

自从那次探访桃花岛回杭州后,吴新华和陈黎夫妻俩曾不止一次坦然地讨论过百年之后的归宿,他们曾经多次达成这样的共识:“丧事一切从简,实行‘三不’,即一不举行追悼会或遗体告别仪式;二不接受花圈、挽幛;三不搞墓葬,择时将骨灰抛撒到曾经战斗过的桃花岛周边海域。”充分表达了两位老战士对桃花岛这片纯洁的土地的无限热爱,无限怀念,无限向往,他们对桃花岛的感情真是比海洋深厚。

吴新华和陈黎从小参加革命,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对生

与死看得很淡,也有着更高的认识。步入老年后,他们看到有些人大大张旗鼓地操办丧事,铺张浪费,觉得不能理解。两人商量之后,决定将来一切从简。女儿吴晓卫、女婿苏炜也非常支持二老把桃花岛当作未来永久的归宿的决定。

当时,他俩还以为这是相当遥远的后事。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04年清明节的桃花岛之行,竟成了陈黎同志的最后一次探访。2004年冬天,陈黎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

当初,陈黎刚住院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普通的感冒,老俩口还准备一起回家过春节。后来,她的病情忽然恶化,转化肺炎并引发心肌内膜炎和脑梗塞。由于病发突然,陈黎在最后一个月中无法活动,不能说话,也没有留下遗言。“这是一个遗憾,按照我们早就想好的,定下了‘三不’。”吴新华说。陈黎去世后,遗体第二天就火化了,不少人都因此埋怨吴新华,吴新华说:“如果大家能记,就请记住她生前开心、活泼的样子。”

在陈黎病重期间,她生前的亲朋好友纷纷来信、来电、来人看望和慰问。每当吴新华他们接到一个来自远方的电话、一封充满关切的信函,他们都俯贴在她的耳边,反复地告诉她:这是你的战友,在强行军130里抢占溪口那天晚上,你们这些小个子女兵,脚上打满血泡,坚持和男兵一样完成任务,你要拿出当年那样的顽强精神战胜病魔;告诉她:这是你的同学,你曾和他同窗共读,和他一样回首看着站在

桥头的母亲,义无反顾地投奔革命队伍;告诉她:这是你的同事,你们曾一起为冠军摇篮的建设操心。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在身边告诉她,当她在半昏迷中微微肯首或眨动眼睛时,他们会高兴地说:“她听到了!她听到了!”然而命运却是那样的残酷,2005年3月24日13时,死神无情地将陈黎这位坚强的革命战士带走了,享年76岁,不过,她肯定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关心她!这一点,她肯定是很满足的,无憾的。

按照她与丈夫生前约定的“三不”愿望,吴新华决定在火红的七月,携家人将陈黎的骨灰撒到他们生前相逢、相识、相恋并且并肩战斗过的桃花岛上。

2005年7月27日下午,现年76岁的吴新华,携女儿吴晓卫、女婿苏炜和外甥女苏琬婷,专程将陈黎的骨灰送到舟山市桃花岛。他们在桃花岛茅草屋码头雇了一艘小渡轮,驶到桃花岛、登步岛、悬鹑岛三岛之间的桃花港内,为陈黎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送别仪式。吴新华在船头念了一首自己撰写的悼念陈黎的诗,外甥女苏琬婷捧着外婆的遗像肃立在船头,女儿吴晓卫打开骨灰盒,女婿苏炜将手中的鲜花与妻子吴晓卫手中的骨灰一道撒入桃花港。

骨灰渐渐沉入了海底,鲜花随着水的涌动,漂浮在海面上,久久不肯离去,仿佛是陈黎在与

丈夫吴新华作最后的告别。

桃花港当作永久的归宿

撒完爱妻的骨灰,面对沉入海底的骨灰和漂浮在海面上的鲜花,吴新华等人鞠了三躬,接着指着桃花港,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女儿吴晓卫等家人说:“百年之后,这里也是我的长眠之地,这里也是我和陈黎永久的归宿,到时我会到这里来陪伴她的。因为只有在桃花港内,我们才能每天看到生前和战友们一起战斗过的桃花岛、登步岛和悬鹑岛这三个海岛,这就是我俩的最大心愿。”

送亡妻魂归大海后,吴新华带着家人参观了桃花寨休闲村、塔湾金沙、安期峰、射雕英雄传旅游城等景点,并告诫自己和家人,在有生之年,每年到桃花岛来看望一次爱妻陈黎。在桃花寨休闲村小木屋休息时,吴新华向当年的61师师长胡炜汇报了他送亡妻骨灰撒到舟山桃花港之事和自己今后也要魂归东海的设想,胡炜在电话里表示他百年之后也要走这条路。



【白沙乡情】 白沙是舟山市普陀区的一个乡,位于舟山群岛东部,乡政府在白沙山岛后沙头。全乡由白沙山、柴山二个住人岛及里洋鞍、外洋鞍等 25 个无人岛礁组成,已有 230 余年的住人历史。该乡西南与朱家尖岛、西北与普陀山岛隔海相望,与洛迦山岛一衣带水。陆地面积 2.88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2.30 平方公里,辖白沙、小沙头、港里 3 个行政村。现全乡共有 750 户、2745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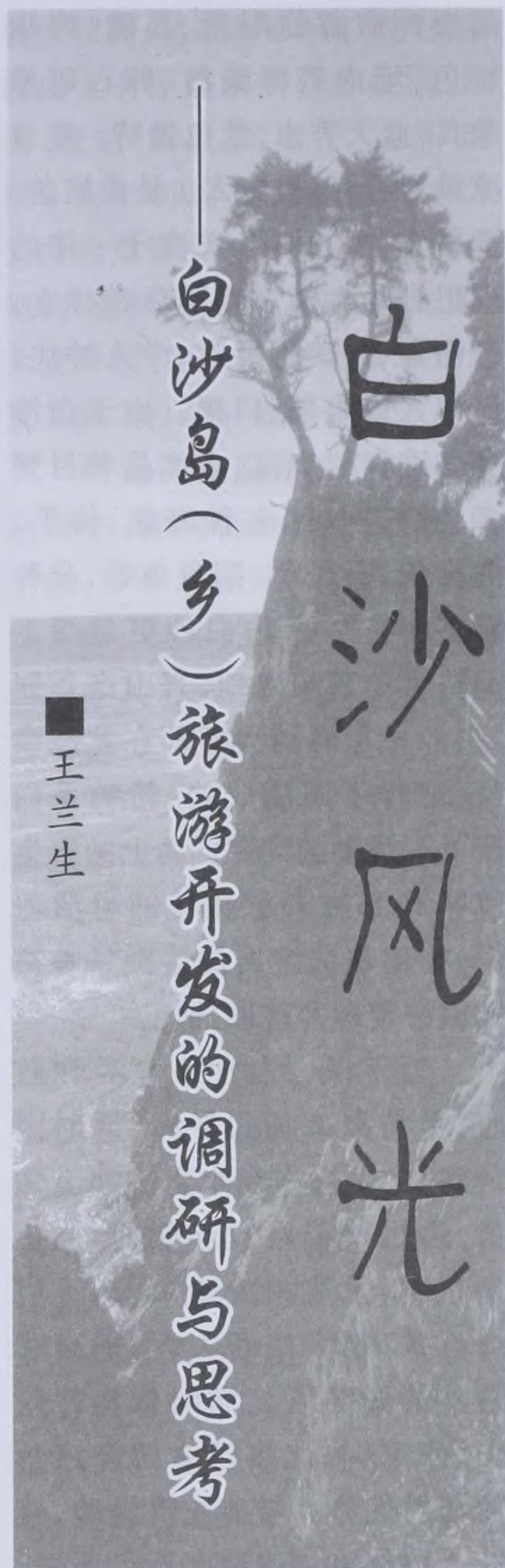
白沙山(岛)位于沈家门东 14.2 千米,朱家尖东 2.3 千米,北距柴山岛 400 米。长 2.46 千米,宽约 0.9 千米,中部最窄,仅 100 米,面积 1.52 平方千米,岸线长 10.35 千米。北部山势较陡,最高峰大山岗海拔 98.8 米。山上土层较厚,宜林宜粮,宜林面积 1273 亩,现已大部绿化。潮岸生有贝藻,周围水深 0.5—37 米。岛上有耕地 30 亩,种植甘薯、马铃薯、豆和蔬菜等。不少渔户兼养畜禽。岛上建有乡办企业、海塘,海塘长 100 米,可供渔船避风。岛上滩岸多鹅卵石和沙砾,在阳光照射下一片白色,故名白沙山。

柴山(岛)位于沈家门东 13.9 千米处,西隔白沙水道距朱家尖岛 2.2 千米,北距洛迦山 750 米。岛状略成圆形,长 1.3 千米,宽 1.2 千米,南部最窄处 0.45 千米,面积约 0.9 平方千米,最高点海拔 162.5 米,岸线长 4.1 千米。山体表土较薄。周围水深 2.3—23.4 米。有大岙、小岙两个岙口,大岙筑有一条长 250 米海塘,可供渔船避风,岛东部和北部潮岸地势陡峭。

岛上居民以渔为主,兼种农作物和放养鸡羊为生活来源,岛上建有坑道水井 5 口,蓄水量 3100 立方米,村有小学、供销社、医疗站等。该岛未开发前多柴,附近岛上居民常来此岛砍柴,故称柴山。居民的祖先多从温州、宁波、舟山等地迁徙而来,至今已有 200 余年历史,与白沙山一起同属白沙乡。柴山岛渔港称港里,白沙乡港里村因此而定名。

【经济、交通】 海洋渔业是白沙乡的支柱产业,岛上渔民以岛为家,以渔为业,长期战风斗浪,靠海吃海。现全乡已积累渔业固定资产 4500 万元,拥有各类大小渔船 120 艘,主要从事帆涨网、灯围、拖网、溜网、海钓等近、远洋作业。从 2002 年以来,全乡经济发展较快,社会各项事业长足进步,实现工农渔业总产值 8221 万元,比 1995 年增长 74%,其中渔业产量 15870 吨,渔业产值 7752 万元,分别比 1995 年增长 53% 和 86%。全乡 3 个村均达到小康标准,其中 1 个村步入社会主义新渔村行列。1996 年,白沙乡被舟山市委、市政府命名为第一批“小康乡镇”。

白沙乡海岛基础设施几年来发展较快,各种设施日趋完善,相继完成了一批电力、通讯、交通、饮用水等基础设施。铺设了海底电缆,接通了舟山电网,开通了 500 门程控电话,安装了有线电视卫星接收器,建造了 200 吨级白沙和柴山两座水井和全乡 60 户屋顶水净化示范;建造了总蓄水量 3500 立方米的白沙水库,新增了备用发电机组;岛内外交通便捷,每日有数班客轮往返朱家



尖,航时仅需 20 分钟,转道即可通过朱家尖海峡大桥和普陀山机场(亦在朱家尖岛)通往全国各地,全乡的环境卫生、海岛绿化、生活居住条件等均有较大改善,为白沙乡经济社会发展、旅游和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利条件。

【旅游资源】 白沙的丰富旅游资源,蕴藏着广阔的旅游商机和开发潜力,是一块不可多得的旅游开发“风水宝地”,包揽海

岛海洋旅游的阳光、岛礁、海味特色,境内碧海绿岛、卵石砾堆兼具,蓝天秀水,景色独特。夏日凉风习习,气候宜人。是集旅游、避暑、渡假、休闲、美食于一体的理想去处。加之周围岛礁林立,奇山异石,美不胜收,令人神往,保你大饱眼福、口福。由于白沙乡岛礁资源丰富,水产品名目繁多,独树一帜,各种海螺、佛手、虎头鱼、石斑鱼、铜盘鱼等,品种繁多,鲜美可口;白沙更是海上垂钓者的理想之地,舟山市首届“白沙杯”海钓大赛即在此地举行,取得了圆满成功,给钓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岛上的野生海味和海边人家独特的生活习俗,构建和沉淀出白沙别具一格的旅游资源和靓丽佳境。

近年来,白沙乡党委和政府,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时因地制宜,发挥本乡本土的海上优势,通过改善投资环境,营造招商氛围,采取相关政策,改进引资方式,加大招商力度,提高了白沙的知名度,同时依托普陀山、朱家尖、沈家门旅游金三角的辐射优势,借鉴先进经验,打造旅游佳境,使游客慕名而来,满意而去。勤劳、朴实、善良、好客的白沙人民,正以大海般的宽广胸怀和赤诚、豪爽的品格,期待着海内外亲朋好友来白沙岛加盟开发,旅游观光,品尝海鲜,休闲垂钓,体味别具一格的海上佳境和东海之滨的渔家生活。

【独特景点】 根据舟山市“发挥海洋海岛优势、建设海洋经济强市”的总体布局,我市旅游主管部门提出了“建设‘海上花园’旅游城市,发展海洋佛教

文化、休闲度假、绿色生态旅游三大主题发展方向”,结合白沙的实际情况,白沙乡党委、政府认为,这一全市性海洋旅游产业定位,基于舟山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是完全正确的,白沙人民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发挥优势,大有可为。一是充分发挥不可多得的海洋生态优势。白沙岛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日照时间居全省之首,形成了海岛优良的植被丰富优势,沙滩资源独树一帜,十分适宜于海洋休闲度假等旅游项目开发;海洋生物丰富,鱼类、贝类和经济藻类资源蕴藏量大。空气清新,符合国家一级空气质量等级指标;游览海域宁静宜人,从而为创造海洋旅游理想目的地提供了优越的天然条件;二是白沙蕴藏的海洋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不可多得,拥有秀丽的海岛风光,洛迦山海洋佛教文化近在咫尺。海洋民俗文化、海洋生物和海岛气象、海洋饮食文化等海洋旅游资源,内容丰富,类型齐全,分布面广。山海风光、渔俗风情等各类游览景观和活动项目,为游客提供和拓展了体验生活和情感交流的海洋旅游项目;三是普陀山、朱家尖、桃花岛、沈家门丰富多彩的旅游品牌,为白沙开展海洋旅游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和充足客源以及海岛海洋旅游发展的空间和领域。

白沙乡可供开发的海洋旅游景点众多,这里略举几例:

(1)白沙巨龙。据传整个白沙山恰似一条巨龙。站在白沙山极乐庵南 50 米左右山岗向前看,巨龙全貌一览无余。中国自

古相传龙为吉祥之兆,故白沙虽从无人岛至今仅 200 余年历史;但日益兴旺,发展迅速,得益于继承和发展了龙的传人的传统美德与龙文化,人寿年半,兴旺发达。

(2)龙舌饮水。在白沙水库与极乐庵旁山头,状似龙在饮水而在民间流传已久。事实上白沙虽为海岛,但水资源丰富,建有多处坑道水井,水质清纯,冬暖夏凉,实为夏季理想的优良饮品,后又建水库,使渔民和游客饮用水更为充足,并成为发展海洋旅游的一个重要有利条件。在地理位置上,游客到白沙旅游上岸,首先看到的就是龙舌石。

(3)白沙渔港。白沙港位于沈家门东 14.4 千米,在柴山与白沙之间。东北—西南走向,长 1.1 千米,宽 400 米,水深 0.2—4 米。西南港口有铜钱山岛和碎礁、两钱礁形成一列,航道较窄。规则半日潮,涨潮流向西南,落潮流向东北。夏季多东南风,冬季多西北、东北风。3—6 月为雾季,年雾日为 20—50 天。7—8 月为台风季节。港内水深 4 米,可供中小型船只锚泊,避较小风浪。港湾由南侧的白沙山得名。清康熙《定海县志》有白沙港名称记载。加上柴山岛南部港口,为白沙乡的两个渔港,柴山港名为港里,港里村亦因此而得名,并筑有埠头。港内水深 4 米,可停泊小型船只。两个港口虽不算大,但在前沿小岛有此两个不可多得的天然港湾,实属可贵,加之该岛东边不远处即洋鞍渔场,则更显得重要,对发展白沙海洋旅游也有着重要意义。向大家介绍了白

沙港,不能不说说白沙水道。白沙水道位于沈家门东 12.7 千米,介于朱家尖岛与洛迦山、白沙山之间。南北流向,长 7 千米,宽 1.1—1.8 千米。水深一般在 25 米以上,以通航渔船为主。1984 年据水道东侧白沙山而定名。海图上原名伊佛兰水道,恐系外来语。该水道别名鸡港,因水道南口东侧北鸡笼岛而得名。

(4)海上石笋。位在白沙村东南方向,下接潮水,落潮时石笋下可行走。高 30 米左右,笋上有草生长,颇为新奇。因山峭高耸酷似竹笋状而得名。相传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侵略舟山时,曾以舰炮对着白沙石笋连轰三炮,石笋巍然屹立,安然无恙,英军无可奈何,悻悻而去。

(5)带状石桥(俗称桥带)。在白沙南岙后背,极乐庵东部海边,乘小船靠近,“桥”下可划小船,别有情趣,但“桥”面不平,不便上“桥”行走。

(6)仙人桥。在白沙桥带北 100 米处,桥下有一叫仙人洞的洞穴,可藏匿 30 人左右。因桥高路陡,只能从海上划小船进入洞内。解放前海匪经常到海岛抢劫抓人,岛上青壮年即在此洞隐蔽。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白沙岛,白沙岛,癞头秃顶无柴草。年年土匪要上岛,三次四次少不了。山坑石洞到处躲,百姓生活受不了!”

(7)张信岳墓。在白沙岛大沙头村西北山坡。1965 年 9 月 17 日,白沙村民兵连长张信岳,为抢救国家和集体人民生命财产而光荣牺牲。当时有一批渔需物资从沈家门向白沙运送,船上

还有 24 个村民群众,中途在月岙洋面因机器故障致失排气管高温引发火灾,在千钧一发之际,张信岳不顾个人安危,从机舱抢救出小姑娘余满英,自己身负重伤住院 49 天,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被国家内务部评为革命烈士。

(8)白沙无然游泳场。白沙、柴山临近舟山洋鞍渔场,除台风时节外,风平浪静,海水湛蓝,沙滩平坦,视野开阔,且无鲨鱼,最适合消夏避暑,休闲旅游。当地群众,不分男女老少,每到下午 3、4 点钟,多到海边游泳,练成一身好水性,适应了海洋捕捞之需。

(9)白沙夜景。白沙港东面系洋鞍渔场,每适阴历 15、16,月明如昼,可看东亭山灯塔和渔船灯火,分外壮观;北看普陀山佛教胜地,情景独特,令人神往,为其他海岛所不及。

(10)后狗耳朵。白沙岛有一涵洞名叫后狗耳朵,洞内有拐弯,弯后有沙滩,均在洞内,妙不可言。

(11)洛迦山。位在白沙、柴山岛西侧,离白沙乡近在咫尺,据说当年观音大士在洛迦山修炼得道后漂洋过海,到普陀山开辟了道场。普陀山、洛迦山两岛分别为观音大士修行、说法之地。过去,凡朝拜普陀山的信徒香客,必到洛迦山,有“不到洛迦,就不算朝完普陀”之说。

普陀山、洛迦山两岛虽近在眼前,但途中波涛汹涌,古时有朝拜者须经过 24 个莲花浪方能得渡彼岸的传说。洛迦山全岛面积仅 0.34 平方公里,但古今中外知

名度较高,且颇有影响。过去,洛迦山上有茅蓬四所,称妙湛、圆通、观觉、自在,后毁于“文革”时期。自 1989 年始,普陀山妙善方丈发起重修洛迦山,先后建成土地祠、迦蓝殿、圆通禅院、大悲殿、大觉禅院、闻思亭、妙湛塔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故事碑廊等。

圆通禅院座落在洛迦山腰丛林中,原为圆通篷,系洛迦山主刹,1990 年重建。主殿供奉圣观音像。院中的大铜鼎系仿天台国清寺大铜鼎铸造。殿后有龙泉古井,方广丈余,井口塑龙首,泉水由龙口喷滴。近处有天然石梁悬挂于两壑间,称“仙桥”。

洛迦山岛的形状很像一尊观音菩萨安详地躺在莲花洋面,头、颈、胸、腹、足都很清楚。这叫“睡观音”,亦称“海上卧佛”。往山顶看,有一座塔巍然屹立,似巨人一般,这就是新建的五百罗汉塔。塔高 27.6 米,宽 12 米,呈正方形,上饰四面观音像,有 500 罗汉朝拜观音,它采用不同色彩的石块雕刻而成,一层一色,层变景异,是普陀山建筑中的一绝,1993 年建成。

洛迦山东北小山巅上,临洛迦门有天灯台。根据记载,洛迦山附近海面是唐代至元、明、清时,日本、朝鲜等国船舶通航的重要航道。明代屠隆有诗曰:“莺莺一点照迷津,光寺须弥日月轮。万都灵明应不灭,五灯传后于何人。”天灯台已于 1889 年改建成雄伟的国际灯塔,被载入国际航海图。

洛迦山虽小,但知名景点众多,又为佛教胜地,值得一游,如果先到白沙旅(下转第 15 页)

邓小平的科技观与秦山核电站建成

■杨成其

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科技观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当代科技事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邓小平科技观，对于增强全党和全社会的科技意识，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邓小平科技观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

邓小平的科技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具有深湛的哲理性与鲜明的实用性，其核心和精髓是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和平与发展逐步取代冲突与战争，成为世界形势变化的主流。围绕科技知识和人才的国际竞争迅速展开，其胜负将决定各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的地位和前景，邓小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科技在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经济竞争中突出的地位与作用。早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就

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紧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他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把科学技术放在先导的位置，着重加大发展力度。自1988年起，他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使科技观递升到更高层次，确认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首要地位、作用。1992年，他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不仅重提这一论断，还谆谆告诫地方党政领导，切记“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断，是邓小平用当代概念论述“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体现，比150年前马克思关于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的论述更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影响与作用。在当代世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简单地增加一般生产力的某个要素，而是从资源型、工具型、体力型的生

产力，发展为智力型的生产力。也就是说，构成生产力的要素的劳动对象、工具、设备和劳动者，其科技含量都大大增加，这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深刻含义。邓小平这一论断以世界科技领域已发生惊人巨变及对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为依据。高新科技方面的重大突破，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从20世纪初的5-10%上升到70-90%，这今非昔比的飞跃，成为邓小平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和科技理论的动因和实践基础。邓小平断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中“第一”最为关键，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马克思主义者对科技发展的最新概括与最高评价，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和科技理论主要突破与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邓小平科技观指引下秦山核电站建成投产

秦山核电站位于东经120°56′，北纬30°26′的秦山，属嘉兴市海盐县境内，背山面海，水源充沛。距杭州92公里，距苏州116公里，距上海126公里，靠近

华东电网枢纽。我国能源分布不均匀,煤炭资源 60%在华北,水力资源 70%在西南,工业和人口集中华东、华南和东北地区,但该地区缺少能源,发展核电很有必要。

表一、核电站较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核电统计

(截至 1980 年 1 月 1 日)

核电站国家和地区	已投运的机组			正在建设的机组	
	机组数量	功率总和	占全部发电量的百分比(%)	机组数量	功率总和
美国	98	83.0	17	30	34.4
法国	44	38.9	65	17	21
苏联	51	28.6	11	31	30.8
日本	33	23.6	27	11	9.7
联邦德国	20	16.4	30	7	7.8
英国	38	11.8	19	4	2.5
加拿大	17	10.1	12	6	5.1
瑞典	12	9.5	42		
西班牙	8	5.6	24	7	5.6
比利时	8	5.5	60		
中国台湾	6	4.9	59		
瑞士	5	2.9	42	2	2.1
韩国	4	2.7	18	5	4.5
芬兰	4	2.3	38		
捷克	5	1.9	15	6	3.1
南非	4	1.8	18		
民主德国	5	1.7	12	6	3.5
保加利亚	4	1.6	32	3	2.9
意大利	3	1.3	4	3	2.0
印度	6	1.2	2	4	0.9

表二、世界各国核电站容量图

(截至 1980 年底净电功率)

国家地区	正在运行		正在建造		已订定		总计	
	堆数	万千瓦	堆数	万千瓦	堆数	万千瓦	堆数	万千瓦
美国	74	5451.5	91	10013.1	33	3785.0	198	19249.6
日本	24	1500.7	6	508.7	4	379.4	34	2388.8
法国	22	1466.1	27	2725.5	11	1265.0	60	5456.6
苏联	29	1424.5	12	1126.0	14	1500.0	55	4050.5
西德	14	862.0	11	1193.1	4	451.1	29	2506.2
英国	33	808.0	10	619.4	1	120.0	44	1548.2
加拿大	11	551.6	10	625.6	5	380.0	26	1557.2
瑞典	8	550.0	5	482.0	—	—	13	1032.0
芬兰	4	216.0	1	42.0	—	—	5	258.0
瑞士	4	192.6	1	94.2	2	206.5	7	493.3
东德	5	176.0	4	168.0	4	168.0	13	512.0
比利时	4	166.0	4	380.0	—	—	8	546.0

续表二：

国家地区	正在运行		正在建造		已 订 定		总 计	
	堆数	万千瓦	堆数	万千瓦	堆数	万千瓦	堆数	万千瓦
意大利	4	144.7	3	199.9	2	196.0	9	540.6
中国台湾	2	122.0	4	371.4	—	—	6	493.4
西班牙	3	107.3	12	1117.8	2	192.7	17	1417.8
捷克	3	95.0	2	84.0	4	168.0	9	347.0
保加利亚	2	84.0	3	184.0	—	—	5	268.0
印度	4	78.2	5	180.0	—	—	9	186.2
韩国	1	56.4	4	313.4	2	180.0	7	549.8
荷兰	2	50.0	—	—	—	—	2	50.0
阿根廷	1	31.9	1	60.0	1	96.2	3	161.1
巴基斯坦	1	12.5	—	—	—	—	1	12.5
其余 14 国	—	—	18	1330.4	7	394.9	25	1725.3
合 计	255	14147.8	234	21746.5	96	9455.8	585	45350.1

从表一、表二世界各国、各地区至 1980 年核能作为一种新的能源发展前景看好,发展速度之快为世人震惊。而我国大陆榜上无名,但并不是无所作为。我国正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实施“728”工程。周恩来总理在我国自行研制的原子弹、氢弹试验爆炸成功后,就着手规划建设核电站。1970 年 2 月 28 日指出:“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要和平利用原子能,要搞核电站。”为纪念周总理指示,秦山核电站工程又名“728 工程”。

秦山核电站(30 万千瓦核电机组)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调试和运营的第一座压水堆核电机组。秦山核电站的科技人员、建设者对这项高科技工程,始终贯彻党中央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以我为主、洋为中用的精神,在确保高质量前提下争速度,“建设者开挖土石方 167 万立方米,浇灌混凝土 27.78 万立方米,铺设 160 千米管道和 1100 千米电缆线,消耗 68000 多吨钢材,

3.4 万立方米木材和 16 万吨水泥,把 2.4 万台套设备和 1.76 万台套仪表连续起来,构成 200 多个系统,使它们有序、有效地运转并向电网送电。”从 1985 年 3 月 20 日开始向核岛厂房底板浇灌第一罐混凝土,到 1991 年 12 月 15 日首次并网发电,仅用 81 个月的时间实现了我国大陆核电零的突破。1996 年 6 月 2 日秦山二期两台 60 万千瓦核电机组开工建设,1998 年 6 月 8 日秦山三期两台 70 万千瓦重水堆核电机组开工建设。泰山核电站成为我国重要的核电基地,有 5 台核电机组,装机容量达 290 万千瓦。

秦山核电站建成,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科技观的正确性。

第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科技观的政策基点

科技人才是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主要载体,是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最活跃力量。邓小平对人才问题一贯萦系于怀,处处溢于言表。早在 1978

年他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果断为其“正名”。1984 年他指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从人才’八个字”。秦山核电站的科技人才被看作国宝,处处受到尊重,为他们提供了优异的工作、生活环境,因此,科技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大有英雄用武之地”。建设核电站人才是关键、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创造一个科技进步氛围,落实好知识、人才对于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发展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改善科研条件,提高科技人员待遇,尊重、保护知识产权和智力劳动成果。

第二,“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实现邓小平科技观的根本途径

如何在世界高新技术的崛起竞逐中,保证中国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十分关切。1986 年他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进一步明确发展高科技的根本途径。秦山核电站科技队伍,结合我国实际,充分发挥潜

徐福东渡普陀驻泊地 探 论

■ 邬永昌

徐福是秦代探险的先驱。这位伟大探险家的名字享誉中外。他在当时简陋的航海条件下,毅然扬帆东征,去寻找理想中的蓬莱三山,这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徐福受秦始皇派遣,出海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这件事,最早见于《史记》,后代之记,匀取于此,或据此推衍。这个故事关系到中日两国,历来为中日学者所重视。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时代的局限及民间传说等因素,徐福东渡这一事件蒙上了浓重的神幻色彩。许多学者对我国历史上是否确有徐福其人其事,多持否定态度。所以,徐福问题始终未能进入严肃的史实考证和史学论辩



的范围。虽然徐福东渡活动与舟山关系密切,但近年来出版的志书中也作为不宜收录对待。为此,笔者试就对徐福东渡船队在浙东的启航地以及在舟山群岛

的驻泊地和开洋地作一探讨。

徐福东渡从句章港启航,在蓬莱仙岛岱山驻舟,这与秦始皇东巡至浙江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在的科技能力与优势,以迅速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目标,一期建成实现“大陆核电零的突破”,二期、三期建成实现了产业化。大力发展当代高新技术产业,包括本身成果开发、引进技术、设备及消化、吸收、创新,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一定要瞄准高新科技成果。随着第二代核电站,即快中子增殖堆电站问世,铀资源使用价值,可远远超过现

有开发的煤炭资源。对秦山核电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秦山二期国内联营、三期中加合资,为发展核电产业化开拓了渠道,对发展第二代核电站,在资金、技术、科研方面准备了必要条件。

在邓小平科技观指引下,秦山核电站创造了奇迹,从突破核电零的纪录,发展到我国最大的核电基地,从核能装机容量 36 位之后,跃居前 10 位,我国只花

10 多年时间而发达国家二、三十年走过的路程,其安全性已达世界一流水平,未发生核泄漏事故。为祖国争光、为人民造福的秦山核电站,是嘉兴人民的骄傲、全国人民的骄傲,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秦山核电站在发展我国核电赶超世界先进的国际竞争中,一定会再创光辉。

其实,关于海外有神仙并有长生不死之药的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史记·封禅书》上记有:“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这说明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使人入海求过三神山。而秦始皇崇拜神仙,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在他四次巡游东方和南方沿海的活动过程中,“每至八神祭祠,均要顶礼膜拜。”并派遣徐福、卢生、韩终等方士多次入海求仙,规模最大的一次竟达五千余人。

从《史记》和地方志等记载看,徐福求仙活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开始至三十七年(前210年),经历了十年时间,出航地不可能只是一处,出航更不可能只有一次。

对徐福东渡日本的启航地究竟在什么地方?正史不载,但沿海一带有许多传说。总括起来主要有五种说法,即河北秦皇岛,山东龙口,山东胶南,江苏沿海说及浙江慈溪说。近几年,有不少学者从地域条件、航海条件、崇祖祭故及稻作东传等方面加以论证,认为慈溪达蓬山即古句章港所在地是徐福最后一次东渡到达日本的启航地。

徐福东渡,实际上与秦始皇的东巡活动紧密相关。从客观因素上讲,徐福东渡也是“采药未成畏诛”的结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非常憧憬神或神仙”,时刻想着求得延祚益寿,并密切注视着有强大势力的齐国等贵族残余的可能叛乱。所以便进行了大张旗鼓、马不停蹄的巡游活动。秦始皇为了显示自己的强

威,在他当政的十二年中,曾经先后五次出巡,其中有四次来到沿海各地进行“求仙活动”。

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即统一中国后的第三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他巡幸东部时登秦山封禅,目的是通神。或许秦始皇封禅此山时已经祈求神仙保佑不死。照《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这次出巡秦始皇还到过芝罘岛等地观看海市蜃楼,并立石颂德。接着秦始皇又来到琅琊。在那里,有一个名叫徐福的齐人方士给秦始皇上书,说他曾亲眼看见过海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中有用黄金和白银修成的宫阙,里边住着仙人,仙人手里有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闻之大喜,马上派徐福带数千童男女入海求长生仙药。秦始皇在琅琊、赣榆等地留连忘返游览了三个月,想等徐福求得不死仙药回来。但是,徐福这次出海采仙药不成,躲隐在浙江象山蓬莱山下的栖霞观。此事见载于宝庆《四明志》、延祐《四明志》、嘉靖《宁波府志》、康熙《宁波府志》等宋元明清的相关府、县志中。据以上史志互参,此年徐福由北部沿海出发东渡日本的计划没有实现。始皇帝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作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巡游。也就是秦始皇这次巡游的浙江之行,正式促成了徐福东渡日本的成功。

近有学者认为,秦始皇第五次巡游途中,徐福主动求见,一番诈言骗信秦始皇后,表示:“愿请善射与俱”替始皇再次至蓬莱求仙药。因达蓬山有诸多利于出航的因素,徐福便陪始皇到那里

“指海谈神仙”。始皇遥见若隐若现的舟山群岛,恍疑为仙境蓬莱。于是便派徐福自达蓬山所在的句章港启碇,率众东渡求仙,徐福趁机脱祸而去。“万里西秦路,客魂遂不归”。这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可以得到印证:“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同时,还记到巡行途中,有徐福求见秦始皇,请求秦始皇派拨武装,遣其第二次出海求神药。记云:“方士徐市(福)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这段记述说明了徐福要求秦始皇派拨武装于这年东渡的迫切心理。

如果我们参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的记载,那么就会明白,徐福不仅在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年)再次受命“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泛海求仙药,并且就在这年东渡“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据王僧儒《百家谱》云,徐福是徐偃王二十九世孙,属“议”字辈。《徐偃王志》卷三中记载:“(徐福)字彦福,秦时往三山采药不返,所居国曰徐福国……”明天启《慈溪县志》引《剡源集》:“文溪北引达蓬,土人相传,秦始皇登此山,谓可以达蓬莱而东眺沧海,方士徐福之徒所谓跨溟蒙,泛烟涛,求仙采药而不返者也。”从上述这些资料可以看出,不但讲到了徐福的船队在句章港扬帆东渡,同时还说到了秦始皇登

临过达蓬山,而且还把秦始皇第五次巡游至句章盼望得到仙药的目的也联系起来了。

达蓬山是古句章港所在地,有着良好的港口条件。这里有着悠久的航海历史和发达的造船业,位于达蓬山南麓距今已有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木桨和陶舟,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且达蓬山至今还有徐福庙、埋马山、御望石等与徐福求仙有关的遗迹。著名徐福研究专家罗其湘教授来浙江考察后指出,浙江省慈溪市的达蓬山是徐福东渡启航地之一。

岱山岛地处杭州湾外的长江、钱塘江、甬江三江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论是古代或近现代,都是我国沿海船舶的必经之处,更是与徐福船队访求到达之地有密切相关。徐福船队自浙东沿海的句章港启航后,由于时在始皇帝三十七年冬末,浙江北部海域多北至西北风,按照风向、潮流推测,舟山海域是徐福东渡的必经之地。宋乾道《四明图经·昌国县》载:“蓬莱山,在县东北四百五十里,四面大洋,耆旧相传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入海求神仙灵药,尝至此。”清光绪《定海厅志》对蓬莱山也有相似记载。《方輿胜览》也载:“蓬莱山在昌国州,徐福求仙之所在。”可见,徐福曾在蓬莱仙境岱山“驻舟”的说法也是可信的。

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港域,既是徐福东渡求仙船队的驻泊地,又是驶离祖国的开洋地。

徐福东渡的船队从达蓬(句章港)起航,在岱山驻舟,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可见这是

“有史可查”的定论。但是,徐福东渡的船队又是从舟山的哪个港口开洋驶离祖国的呢?这在正史中是很难有圆满解答的问题,笔者试就从地方志和野史中找到答案,并且以民间传说和古代笔记作补充,更有古代的地图作为佐证。

东福山原称东霍山。据《浙江省普陀县地名志》卷三《自然地理实体》“东福山岛”条目记载:

东福山,属中街山列岛。……据宋《四明志·昌国(县志全)》记载:“东霍山在海之东北,环以大洋,世传徐福至此。……而旧志所说虎豹龙蛇,人所不至者,妄也。”元、明、清志书亦有类似记载。民国13年(1924年)《定海县志》列有东福山名称,并载东福山在西福山东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31年5月初版)东福山条目释文一作“福山”。“霍”“福”当地同音。今岛上人仍叫“东霍山”,但书写则为“东福山”。据传东福山名称与“徐福至此”有关。

我们关注的是,宋宝庆《四明志》中对“东霍山”方位的记载以及当地读音保留不变的分析。其实,《地名志》中的释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宋元明古志上讲的“东霍山”就是指今“海之东北”方向的“东福山”。

无独有偶,近年来还有不少地名研究者提到古代的“东霍山”即指今“东福山”。如《蓬莱仙岛与徐福》中的“东海蓬莱与徐福求仙”一文中也讲到“古老相传,东福山原名东霍山,山有大树,徐福曾驻舟于此。”更为说得

明白的是清初出版的《浙海指掌图》,此图中“东霍山”标在庙子湖岛东南,浪岗山之南,朱家尖东北。但是,又为什么民国13年出版的《定海县志·总图》将“东霍山”标在“县之西北”呢?其实,“东霍山”终究是个地名问题,并不复杂,历史脉络清楚。史料涉及到“东霍山”记载并不是很多,问题只是在于历代“东霍山”各有所指。对于这个问题,舟山市地名办主任王建富先生在《舟山史志》“倭患对舟山地名演变的影响”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他说,由于舟山曾遭受“倭寇”的侵扰和“海禁”等原因,“长期的废弃历史已使得许多岛屿名称一再流传,新定居的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认识程度,又赋于他们的家园新的名称。这些岛名的变异,因为重新开发时间的差异及对原有地名保存途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变迁方式:有的保留了读音,但书写方式发生了变化,岙客山变为摘箬山,东霍山变为东福山。”

东福山地处舟山群岛的最东端,东临东海大洋上的国境线,西距蓬莱仙岛岱山100余里。这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代曾是海防要地,清代时是清军水师兵船必到汛地,也是我国沿海商船和国外船舶必经之处;又是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停靠站之一。即有“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之势。

唐至清代,随着北洋航路的不断拓展,浙江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往和贸易活动也更加频繁。无论是东渡日本弘法的鉴真、一

山一宁高僧还是著名的海上贸易家、航海家张保皋、张支信、李邻德、毛海峰、徐碧溪、卓舜哲、朱克熙等去日本贸易时也多次经过舟山,他们都在东极港留下了传奇的足迹。特别是1942年的日本“里斯本丸”从香港往日本运送战俘途中,就在东极洋面被鱼雷击中,384名英俘被东极渔民从海上救起。这桩中英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结成的友谊,半年多世纪以来一直被世界人民传为美谈。

上述资料表明,浙东地区凡去高丽、日本等国家的商船均在舟山海域站潮(驻泊)、避风,或进行采购补给,舟山的东极港等港域更是中日航路上名符其实的停靠站、开洋地。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说“东霍(福)山,在海之东北,环以大洋,世传徐福至此。山有石宛如一桮,修竹森立,风枝拂扫常无纤尘。”此前后的宋宝庆《四明志·昌国县志全》,元延祐《四明志》,明天启《舟山志》,清光绪《定海厅志》等均有“世传徐福至此”的记载。元朝学者吴莱到舟山群岛考察后,在《甬东山水古迹记》中也对东福山的地理位置和“开洋地”作了描述:“……东南望东霍(福)山,山多大树,徐市(福)盖尝驻舟于此。土人云自东霍(福)转而北行,尽昌国北界,有蓬莱山,众山四周峙立,旋绕小屿,屹如千尺楼台……舟经其上西转,则为洋山。”吴莱描述的“东霍山”、“蓬莱山”,与今东福山、岱山岛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完全吻合。

上述文献为寻找徐福东渡“开洋地”提供了线索。这些记载

说明,徐福率领的东征船队从句章港出发,途经岱山“驻舟”,后来又到东福山港湾驻泊。他们在那里集合候潮、一旦气候条件许可,便开洋北上日本。

从史书记载来看,徐福的船队曾经是沿舟山群岛外围北上。对这个问题,近有研究者引用《史记·封禅书》做了解答,他说“原来秦始皇亲自参加过求仙药的活动。不过是在陆地上活动。”徐福为了让“秦始皇的陆地队伍与海上求仙船队‘并’行北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这样说不是咬文嚼字,而是有浙江的有关传说遗迹作为佐证。”^①

关于徐福的船队又为什么要选择在东福山开洋?我想,这与东福山所在的东极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潮流条件是分不开的。东极港地处舟山群岛中部东端,西与蓬莱仙岛岱山隔海相望。东出东极港湾即可进入东渡日本的南路“漂流航路”。如果碰上好的季风,不出几天便可到达日本。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这条“漂流航路”在造船业和航海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秦代,借助海流和季风力量,从中国浙江舟山群岛到达日本是最理想的航路。就是因为有了这条便捷的中日航路,再加上善于造船、驾舟的越人,使这条航线成为徐福最后东渡成功的航路。这条航线,一直成为中日两国人民互相沟通的重要海上丝绸之路。古代的稻作农业,日本后期遣唐使来华、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以及唐宋元明清两国贸易和文化交流,大都是走这条航路。更可喜的是,这条“漂流航路”也被前几年以

韩国东国大学尹明喆教授为首的中日韩竹筏漂流活动所证实。明郑若曾的《舟山论》中也说到,东极洋面乃是日本“倭寇贡道之所必由”。“洪武间,倭犯中界,犯玉环、犯小寨,皆浙东海滨。”很显然,“界”、“街”同音,此文中的“中界”就是指今东福山所在地的“中街山列岛”。因此,从东极港的地理位置、潮流等分析,从历代地方志和野史等记载来研判,徐福东渡船队在岱山驻舟后从东极港(东福山)开洋的答案也是符合情理之中的。

徐福东渡东福山开洋地的推论,不但有史志记载相对应,还有不少关于徐福东渡的民间传说可以佐证。先人都视东极为“极东”,东极附近的滨海一带也常出现海市蜃楼之幻境。出于气候的变化,部分岛屿时隐时现,变幻莫测,与传说中的仙山(岛)所在地也很相似。由舟山市文联主办的《海中洲·东极专号》中,《东福山与徐福东渡》的作者对徐福在东福山岛上活动情况作了非常细致的描述,现摘录部分段落如下:

这日,徐福的船队路过舟山洋面,突然刮起风暴,海上的浪头,像小山一样,一个接一个向船队扑来,把船打得东倒西歪团团转迷失了方向,随浪飘到一个无名小岛前。徐福站在舱板上一看,只见这个小岛树木茂盛,风景如画,好像一块仙岛。徐福心忖,现在船只损坏,淡水用尽,正好在这里修船充水,歇上几天,再作道理。他主意一定,便叫船队沙沙落了风蓬,抛了锚,靠了岸。他们踏上小岛,发现山坳里

还搭着座茅蓬,里面住着一个长胡须老头。老头见有客人来,蛮高兴,连忙搬凳倒茶,又拿出烤熟晒干的乌贼鲞,黄鱼鲞,淡菜干招待客人。喝了老头的茶,吃了老头的海味,童男童女个个有了精神,大家就在岛上搭起帐篷,伐木的伐木,修船的修船,长胡须老头还带着他们到山上去挖井找水……

后来,打鱼人看到这个小岛上辟了路,挖了水井,好住人了,就三三两两在岛上搭起茅蓬住下来了。因当年徐福东去路过此岛,所以取名东福山。

这是一则民间传说,东福山的地名是因徐福到过此岛而得名。此后也就为大家所共识。这则故事的当地传说与宝庆《四明志》、大德《昌国州图志》的记载如此相吻合。这不恰好就是对古志上记载的“世传徐福至此”的注释和补充吗?

从以上的记载看出,徐福到过的东福山岛,必定是一座地处岱山岛以东的一个较大的海岛,否则怎能容纳拥有“70多艘战(楼)船^②”、“总人数达5200余人”^③的庞大的东渡船队。且该岛上还要具有古志中所记的棋盘石、修竹园、大树等地貌特征。据说,普陀的福兴山也是因徐福东渡至此而得名的,福兴山又称马秦山,而马秦山(朱家尖)沙垞上至今还留有一个较大的沙墩,自古相传沙墩里埋藏着秦始皇的龙袍。所以福兴山寓有“徐福求仙福兴游,始皇入海龙袍留”之意。

徐福东渡的成功,徐福永存于日本人民的记忆中。日本有不

少风俗似同吴越,这为徐福从浙江启航说又添了明证。

徐福东渡到达何处?《史记》仅载:“徐福得平原广泽。”但“平原广泽”究竟为何地?司马迁没有指明。《三国志·孙

权传》、《后汉书·东夷传》都把“平原广泽”称作“夷洲”、“澶洲”。而《括地志》云:“澶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此洲,共数万家,至今洲上有至会稽市易者。”吴人《外国志》云:“澶洲去琅琊万里。”日人松下见林之《异称日本传》认为:“夷洲、澶洲皆指日本海岛。”现在也有学者认为,平原广泽、夷洲、澶洲实际上都是指日本海岛。徐福东渡开洋后,先到达朝鲜半岛南部的辰韩(又称秦韩),后又顺着日本海左旋的自然海流,到达日本山阴,并渐次向本州腹地发展,形成一个秦人居住区。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夷洲是日本,而澶洲是美洲。徐福10年间的前几次出海,未寻到仙药,“恐谴”,于是最后一次再未回归。目前东渡美洲说恐还需要进一步考证,而东渡日本一说也是可信的,已成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佳话,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广为传诵。

徐福东渡的成功,他带去的种植、灌溉、渔猎等生产技术和生



产工具,被后人尊为专司农耕、蚕桑和医药的大神。佐贺平原是日本稻作的发祥地,而佐贺的水稻生产技术相传是徐福传授的,所以每年金秋季节,佐贺一带的农民都要举行仪式,把当年收获的第一穗稻谷奉献给徐福神社。当地渔民每次捕获巨鲸,也要在徐福的塑像前供上几块鲸肉,以感谢徐福教给他们捕鲸的技术。徐福一行登陆后,曾先在海滩上驻扎过,因长期生活在海上,厌恶了海风和晒干鱼虾的腥味,才移居金立山。因此,当地人至今还保留着一种风俗,不吃海产的干虾,主要是尽量避免作出徐福不喜欢的事情。

浙江的先民,一向有断发纹身的习俗。在《三国志·魏书·倭》中也有“男子无大小,皆鲸而文身。”在现在的日本人中,还有在身上画图案的习惯存在。这种习俗是直接接受吴越风俗的影响而形成的。再如稻作文化密切相关的杵臼打年糕、穿木屐等习俗,在日本也是兴盛不衰。我们舟山人也有穿木屐的习惯。木

屐,舟山人通俗称为“木拖鞋”。所谓“木拖鞋”,就是以1—3厘米厚的硬木板为鞋底,系上绳带或橡胶皮带,脚趾拖着行走的木鞋。在炎热的夏天,是人们消闲行路的方便鞋。

再则,日本佐贺平原上发现的弥生时代文化遗址,时值公元前2~3世纪,也正与徐福东渡求仙的时间相当。中日两国有些学者认为,这一遗址出土的环壕聚落、干栏式建筑及瓮棺墓葬和稻作农耕工具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移民和浙江河姆渡文化的影响。“正是河姆渡文化这一母体,它孕育出了灿烂的吴越文化,吴越文化又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的弥生文化。而代表着两种文化共点的稻作、干栏式建筑、瓮棺墓葬、

金属工具等,又可能与徐福东渡在浙江沿海启航相关。”^④

徐福东渡之史迹,在日本史书中也多有记载。日本首肯徐福其事的要算《神皇正统记》一书。书载:“(孝灵天皇)四十五年乙卯,秦始皇即位,始皇好神圣,求长生不死之药于日本,日本欲得彼国之五帝三王遗书,始皇乃悉送之。其后三十五年,彼国因焚书坑儒,孔子之全经遂存于日本。”《神皇正统记》出版后,对日本学者影响很大,掀起了对徐福事迹的考证和研究热,一时著述颇多。

1929年日本出版的《徐福》一书,书中还刊有许多徐福遗迹的照片。另外,在徐福墓祠所在地的和歌山县曾形成了一个保

护徐福史迹的组织“史迹保胜会”。据说今日日本人还把徐福赴日本时从吴越等地携带去的佩剑、勾玉及铜镜等各一件,称之为“三种神器”,由皇室秘密保存。1930年日本还举行了“徐福来朝二千年祭”纪念会,以怀念徐福东渡之事。可见,二千多年前的历史,在扶桑大地上生活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先祖,他们以各种方式缅怀徐福一行的足迹。

徐福东渡,把秦代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播到日本,对日本民族和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徐福东渡的奇人奇事,似一座永恒的天桥,把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注 释:

①《蓬莱仙岛与徐福》董楚平、董有华的《宁波周围地区关于徐福入海求仙的传说与遗迹》。

②、③《蓬莱仙岛与徐福》王心喜的《徐福东渡飘航之路与稻作东传》。

④《蓬莱仙岛与徐福》陶和平的《岱山古名“蓬莱”与徐福求仙的关系》。

(上接第37页)这种精神,打败了日本鬼子、国民党;今天继续发扬这些光荣传统,就能战胜新的困难,取得新的胜利,完成新的历史时期更伟大、更艰巨的任务。

三是积极组织调研访问活动,关心老区人民和新四军老战士的生活实际困难。并带领同志们走遍普陀的登步、桃花、展茅、六横、东极诸岛等地,访老寻踪,座谈调研,写出调研考察报告,先后发表于有关报刊或提供上级参考。

四是积极开展活动,参与社区工作。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宣传教育,并亲自参加了双屿港、勾山、登步、六横、青龙山等革命烈士纪念碑(室)的筹建工作,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五是组织会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重要文献和领导讲话,知情出力,发挥余热,关心和参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受到领导和群众好评。

六是带领会员积极撰写革命回忆文章,宣传革命史迹,发表

于《铁军》、《东海》、《舟山史志》、《舟山日报》、《舟山晚报》、《联谊报》、《普陀史志》等报刊,提高了研究工作的知名度,反映了党史、军史研究成果。同志们感慨地说:“所有这些,与杜梅同志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发扬传统,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



事件「及倭寇猖獗的根源」 明代勘合朝贡贸易、一争贡

杨成其

古代明州(庆元、宁波)是一国际性贸易港口,从暹罗(泰国)、占城(越南南部)、阁婆(印尼爪哇)、真腊(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输入象牙、珍珠、玳瑁、檀香、犀骨、胡椒、苏木及香料;自高丽(朝鲜半岛)输入银子、麝香、茯苓、漆、铜、人参等药材;自日本输入金子、金砂、赤铜、水银、鹿茸、硫磺、倭刀、扇、松板等。中国输出物,主要为书籍、名画、茶叶、瓷器、纺织品、铜钱、金银器等各种工艺品。

明州港与海外各国贸易,有官方的朝贡贸易和私人民间贸易两种。朝贡贸易是中国政府以宗主国地位与海外属国之间的贸易。海外属国向中国王朝朝贡贡品,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以赏赐的形式以礼物回赠。海外各国来中国的使者,也往往带货物来中国贸易。私人贸易按税率征实物税,官方收购或博买后其余部分,在民间交易。

一、中国封建王朝对海外诸国交往采取厚道柔远之制。

《宋史·外国传》:“唐德既衰,荒服不至,五季迭兴,纲纪自紊,远人慕义,无所适从。宋祖受命,诸国削平,海内清谧。于是东若高丽、渤海,虽阻隔辽壤,而渤海远来,不惮跋涉。西若天竺……大食……等国,虽介辽夏之间,筐篚亦至,屡勤馆人。……占城真腊,诸番接踵修贡。宋之待遇亦得其道,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来者不拒,去则不追,边圉相接,时

有侵轶,命将致讨,服则舍之,不黷以武。先王柔远之制岂复有加于是哉!”明朝开国后,仍继承怀柔政策。“帝(朱元璋)顾中书省臣曰:‘西洋诸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明史·外国传》)米昔儿一名密思儿(今埃及),永乐中,遣使朝贡。既宴赉,命五日一给酒饌果餌,所经地皆置宴。正统六年()王锁鲁檀阿失刺福复来贡。礼官言:“其地极远,未有赐例。昔撒马儿罕初贡时,赐予过优,今宜稍损。赐王彩币十,表里纱罗各三匹,白毯丝布、白将乐布各五匹,洗白布二十匹。王妻及使臣递减。”外国来朝贡以礼相待,赐品多于贡品,实际上是一种互通有无的交易。对附载的特产与民互市,也不收税。“永乐初,西洋刺泥国回回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明史·食货志》〈五〉)

二、明代实行勘合朝贡贸易制度。

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规定10年一贡,船二艘,人200,不得超过。明宣宗宣德年间(1426~1435年),允许增加至三艘,人数增至300。日本贡船按10年一贡的贡期进宁波港,必须具备该国的表文和勘合,两者缺一不可。勘合经过核对无误,才允许贡船进入

港口。第一期《戡合朝贡贸易条约》(称《永乐条约》)赠给日本国永乐年号的本字戡合 100 道、日字戡合底盘 1 扇;日字号戡合 100 道、日字号戡合底盘 1 扇、本字号戡合底盘一扇存于北京礼部;本字号底盘 1 扇存放于福建布政司。凡日本来华贡船,须带戡合一道,绕道琉球,先至福建,由福建布政司核对底簿后,才到宁波港,经宁波港市舶司核验后,经内河入杭州,运河北上抵北京,与北京礼部所存的戡合、底簿核对,对定真伪。如属实,日本贡船及货物才能进宁波港。

第一期戡合贸易实行 6 次,凡 15 年。第二期始于宣宗宣德七年(1432 年),与日本订立《宣德条约》,贡期仍 10 年 1 次不变,船增加 1 艘,人增加 100,共实行 11 次,凡 115 年,至嘉靖二年(1523 年)发生“争贡事件”,明廷撤销宁波市舶司,实行海禁。

日本的戡合中按规定写明贡使及其下属人员的姓名,并开列出朝贡的物品及数量。日本的朝贡物品有三类:朝贡的方物;国主的附搭物(大部分为从商所带的货物);使臣自进物。

如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 年)的一道戡合

日本国今填本字柒号一道为朝贡事

今将本船装载方物并人员姓名开坐于后,须至咨者,今开

壹、表文一道

壹、贡献方物

马贰拾匹

撒金鞘柄大刀贰把

硫黄壹万斤

玛瑙贰拾块

贴金屏风叁幅

黑漆鞘柄木刀壹佰把

枪壹佰柄

长刀壹佰柄

铠壹领

砚台壹面并匣

扇壹佰把

壹、专使壹员

纲司 居坐 从僧 士

官 通事

土人 船头壹名 水夫

右咨礼部

景泰贰年捌月 日

三、“争贡事件”发生与双屿港贸易的发展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 年)五月日本诸道争贡,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由于日本国主源义植幼暗,不能制命,郡臣争贡,各强执符验。左京兆大夫内菰兴遣僧宗设谦道人贡“夷船三只”抵宁波;越数日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夷船一只,使人百余”至宁波。番货至市舶司阅货及宴坐并以先后为序时,瑞佐后而素卿狡,贿市舶太监赖恩,先阅佐货,宴又坐设上。设不平遂杀佐,纵火大掠,毁所寓境清寺,劫东库。宗设之党追逐素卿,直抵绍兴城下。月余不能入,素卿匿于城西青田湖,宗设求之不获。还至余姚,遂紮宁波卫指挥袁璘,越关而过。攻定海城不克,遂出海。时备倭都指挥刘锦追贼,战没于海。定海卫掌印指挥李震与知县郑余庆同心济变,一日数警,而城以无患。贼有漂入朝鲜者,国王李恹擒获中林望、古多罗于八月将倭夷二人及斩三十三人来献,并送还中国被掠八人。素卿来朝,勘合乃孝庙时

所降,其武庙时勘合,称为宗设夺去。礼部因言素卿入夷,时在幼年,已蒙武宗赦免,毋庸再问,惟谕其回国。因移咨国王,令其查明勘合,自行究治,待当贡之年,奏请定夺。给事中熊兰等言各夷怀奸犯顺,乞明正典刑,乃系素卿及宗设党于狱,特遣给事中刘穆、御史王道鞠之,素卿伏诛,诸夷俱论死。

给事中夏言上奏:倭寇之乱,起因于市舶,下令罢宁波市舶司。

四、双屿港崛起、毁灭与倭患猖獗

“争贡事件”暴露了海外日本朝贡贸易诸多矛盾,“争”是日本地方势力对华贸易中,谁能占据主导地位,当待遇受损的一方,以武力报复。从“争贡事件”中明王朝理应改变贸易体制,让民间贸易发展起来,加强市舶司的作用,以抽取货物税,代替朝贡贸易。但是,明王朝把倭寇之乱,“起因于市舶,下令罢宁波市舶司”,实行海禁,宁波港成为死港,随之双屿港成为国际商贸港。

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89 卷浙江条之双屿港注云:“去城(舟山城)东南百里,南洋之表,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嘉靖中,总制军务朱公纨,命备倭都指挥卢镗,率兵堵塞之。”

郑开阳《杂著》卷 4 载:“双屿港口水流急,孝顺洋水深十三托泥地”,在近海中双屿是一深水港,与浙、闽、苏海上交通便利。出海航道中,双屿港是必经之地。嘉靖二年(1523 年)“争贡事件”后,朝贡贸易停止,市舶司

撤销、实行海禁。民间的贸易转移到双屿，王世贞《弇州史料》“沈密传”中云：“舶客许栋、王直等，於双屿诸港，拥万众，地方绅士，利其互市，阻与之通。”《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0，浙江条云：“嘉靖十九年(1540年)福建系囚李七、许一等百余人，越狱下海，同徽歙奸民王直(即王武峰)、徐维学(即碧徐海)、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勾引番倭，结巢於霏衢之双澳，出没为患。”据宾托《东洋纪行》载，“宁波(双屿)在当时较印度及全亚洲之任何地方为壮丽，为殷富，而其繁荣，自二年前发见与日本贸易后，可谓登峰造极，贸易额超过三百万金。而对日贸易，占有总额之大半，获利巨，可达投下资金之三、四倍，总人口共三千人，其中葡人一千二百人，几占其半数，家屋千余所，家屋每所之建筑费，有耗至三、四千金以上者，教学六七宇，医院二所，每年经费达三万金以上。”

朱纨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任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素抱严禁通番政策，主张“革渡船”、“严保甲”、“拒绝与番人通市”，使副使柯乔都指挥黎秀分驻漳泉福宁遏贼奔逸。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使都司卢镗将福清兵由海门进，“夏四月镗遇贼于九山洋，俘日本国人稽天，许栋亦就禽(擒)，栋党王直等收余众遁，镗筑塞双屿而还，番舶后至者不得入。”嘉靖二十八年，纨前讨温盘南鹿诸贼，连战三月大破之。三月佛郎机国人行劫至诏安，纨击禽(擒)其渠李光头等九十六人。复以便宜戮之。”

朱纨采取严厉海禁政策，捣毁双屿港，追杀贼党。“诸岛势家既失利，则宣言被禽(擒)者皆良民非贼党”，纨上疏曰：“今海禁分明不知何由被掳，何由胁从？若以入番导寇为强盗，海洋敌对为拒捕，臣之愚暗实所未解，遂以便宜行戮。”在朱纨斩尽杀绝海寇“杜乱源”的情势下，激起了闽浙沿海人民的反抗，以贸易为生、贸易获利的人纷纷反对。吏部御史闽人周亮及给事中叶鏜言奏，改纨巡视以杀其权。御史陈九德劾纨擅杀，纨落职，命兵科都给事杜汝楨按问，至此，纨曰：“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制圻志作绝命词仰药死。”嘉靖二十九年，诏纨擅杀逮纨，纨已前死，柯乔、卢鏜等并论重辟。一方面，明王朝的海禁政策没变动，对沿海渔民、船民、出海贸易为生的人的生计未作妥善安置，造成海患。另一方面，海防实力削弱。纨死不设巡视大臣，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福清捕盗船四十余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门卫者十有四为黄岩外障副使丁湛尽散遣之。撤备弛禁，“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倭寇猖獗，生灵涂炭。

倭寇猖獗的原因多方面，但它主要是明王朝海禁政策造成的。明世宗嘉靖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嘉靖实录》38)双屿港捣毁后，靠商贸为生的人得另谋生计。《经世文编》卷205载：“愚民之下，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罇，

率得厚利，驯致三尺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正当贸易不能进行，海商走私贸易发展，从武装走私发展为倭寇抢劫。日本商人来沿海番货賒与奸商遣人坐索不得，出没海上为盗；王直等海商集团也操起海盗行径，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失职书生逼迫无生计的船民、渔民入海为寇，与日本盗贼勾结为一伙。王直亡命海上为舶主渠魁，其党徐海、毛勲、叶麻、陈东拥众数吉，“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莫敢谁何！有一种说法，可资参考，吴宗宪《筹海图编》卷12载：“……谓倭寇之患起於市舶不开，市舶不开由于入贡不许，许其入贡通商市舶中外得利，寇志泯矣。”这种见解颇有见地，当然通商畅通时，也会有倭寇与海盗出现，日本的浪人、无赖缺少资金、无物互市，在中国沿海剽掠犯边，也是常有的事。但嘉靖朝大规模倭寇侵扰是空前的，把海商推向海寇，是由明王朝海禁国策所造成的。一代名帅吴宗宪，名将俞大猷、戚继光、汤克宽在“平倭战争”中立下功勋，是在这特殊时期采用的军事措施。如果明王朝贸易政策正确，本可避免这场震惊中外的战争。



登步岛之战的重要意义

及其经验教训

写在舟山解放55周年

王兰生

(一)

解放战争进入1949年后,特别是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在大陆从总体上讲已经既无招架之功,亦无还手之力,在我大军的围追堵截下,溃不成军,节节败退。至1949年夏,整个浙江大陆全部解放,残敌10万余人逃窜舟山群岛,妄图凭借其海空优势,负隅顽抗,并以舟山为基地,进行海上封锁,空中袭扰我上海、杭州、宁波等解放不久的重要城市,企图阻挠我军解放舟山群岛的进程。

1949年8月18日~11月6日,我22军和21军61师,根据三野部署,为歼灭舟山群岛残敌,打破敌人海上封锁,于8月19日开始分三路向舟山群岛外围进击,至11月6日,各路大军先后攻占金塘岛、大榭岛、梅山岛、六横岛、虾峙岛、桃花岛,夺取了攻击定海本岛之前进基地。此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22军为主,配以21军61师。登步之战为此役之最后一仗。共歼灭国民党正规部队一个师大部、二个团(102师大部、六师一个团、十六师一个团)。歼灭非正规军部队一个团(交警九总队),共8850人(其中俘虏5210人,毙伤3640人)。

在解放战争后期,我军进行了四次较大的渡海作战,一是1949年8月11日~8月20日首战山东长山列岛,由三野一部及山东军区部队参战,守敌小部乘舰逃逸,余全部被歼,共歼敌正规部队一个团(海军陆战二团)1490人;二为前边提到的舟山外围诸岛作战;三是1949年10月27日,华野一部攻击金门之战,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因潮水、风向等原因无法后援,致使作战意图未能实现,我军损失八千余人;四是1950年3月5日~4月30日的海南岛战役,我军四野一部为歼灭海南岛之10万余敌军,以小部队分批潜渡及强渡该岛,在岛上人民武装配合下胜利登陆。此役共歼敌33150人(其中俘虏24890人,毙伤6680人,投诚1580人)。四次渡海作战,既反映了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精神与强大的军事实力,亦说明渡海作战之难度大大超过在陆地作战,尤其是在既无海空军配合,又缺少渡海作战实战经验的情况下。

(二)

1949年11月3日,我21军61师在桃花岛驻军炮火支援下,对登步岛守敌发起攻击,由182团部全部、183团1营担任主攻为第一梯队,183团3营、2营6连为预备队,担负攻击歼敌任务。182团3营、2营4连、5连一部、183团1营粉碎敌人的抵抗,仅用半小时即登上了登步岛。后因潮水、风向突变,后续部队未能跟进,我已登陆的9个半连队,至次日拂

晓,183团1营即攻占流水岩山,一个排攻上了大山,182团4连、7连攻占了炮台山,3营主力攻占了涨网湾山,此时形势对我十分有利,可惜宝贵战机稍纵即逝,至3日夜,我登陆部队虽已将守岛之敌击溃,俘敌近千,但因未攻下该岛要冲鸡冠礁,致未能阻止敌大量援兵登陆,造成了后来的被动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敌我尚在继续激战,但双方伤亡都很大,敌人无法把我军赶走,我也不能全歼守敌,处于拉锯胶着状态。4日6时半,敌75师22团和67师202团,在飞机掩护下,由沈家门乘舰增援登步岛之敌,并在鸡冠礁登陆成功,在空中、海上火力支援下,向流水岩等我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酿成了一场空前激烈和残酷的海岛争夺战。我攻岛部队处于无水喝、无饭吃、无工事依托、无增援部队的四无状态,仍以英勇果敢的精神,一再打退增援之敌的轮番攻击,仅在我183团1营阵地前,敌人就丢下800余具尸体,而我3营同志亦大部伤亡,能坚持战斗的仅剩3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继续向登步岛增派了224团、200团及67师之201团、199团和87军警卫营,对我军阵地连续猛攻,造成两军兵力悬殊。我攻岛部队虽连续打退敌人发起的多次进攻,但终因伤亡过大,已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尽管我军4日晚9时,由师长胡炜亲率183团3营和2营一部,及182团1营和5、6连、师侦察连、警卫连、92步兵炮连增援攻岛部队,但终因敌人兵力

过多,又有海空优势,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给我首批攻岛部队以大力支援和鼓舞,但从总体上已难以扭转被动局面。5日晨,敌67师之199团、201团、87军警卫营全部到达登步岛,且后援敌军还在继续到达,敌67军军长刘廉一、87军军长朱致一,亲自指挥督战,并以飞机、兵舰、地面炮火对我阵地集中轰击,妄图将我攻岛部队全歼。我军处于腹背受敌、千钧一发之际。此时此刻,61师师长作为前线最高指挥首长,以对党、对部队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胆识,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毅然作出立即撤出战斗的重大决策,并统一部队认识,请示上级同意,以后撤之举换来死而后生,转危为安,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佯攻敌人,且战且走,由桃花岛派船,利用5日晚至6日夜半1时30分这段时间,将我军伤亡人员、机关部队及400名俘虏全部安全撤至桃花岛,在撤退过程中,我军无一伤亡,创造了海上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惊人奇绩。

(三)

登步之战,我军虽未能全部实现原来战略意图,一未全歼守岛之敌,二未解放该岛,且伤亡较大。多少年来,对此战处于要么缄口不提,要么视为败仗。其实登步之战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不少。如果正确面对,客观分析,不但能得出正确结论,而且有不少教益留给后人,这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总起来讲,登步之战有得有

失,得大于失。就“得”的方面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震慑了敌人死守舟山的企图,加速了舟山群岛的解放。在当时我军一无军舰飞机,二无攻岛经验情况下,要采取逐岛进攻的办法,消灭困守舟山之敌10万余人,尚须时日,虽已有解放金塘、大榭、桃花、六横、虾峙诸岛渡海作战之经验,但以上战斗总体上消灭敌人数量不多,尚未给舟山守敌以重大杀伤,在这种情况下,登步之战打破了蒋军鼓吹的“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军舰,进行舟山决战岂非神话”的嚣张气焰。在登步之战中,虽然敌人集中了舟山本岛4个团以上兵力,孤注一掷增援登步,其实不过是困兽犹斗,看似强大,实则虚弱的表现。登步之战如果没有敌人集中数倍于我的兵力支援,并凭借海空优势掩护,我61师一举解放该岛是完全可能的。虽然暂时失去了这一机会,但敌人的虚弱本质由此可见一斑,否则,小小孤岛还用两个败军之将亲自指挥督战吗?其实质目的,旨在企图集中大量兵力死守舟山群岛,作为进攻大陆的跳板和保卫台彭的屏障,但未过多久又弃“舟”逃台,可见登步之战着实让蒋介石伤透了脑筋,最后不得不作出逃跑避歼之策。

二是消灭了舟山守敌的有生力量,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彻底灭亡。登步之战我军以伤亡1500人的代价,消灭了3200余敌人,如系在大陆作战,这或许不算出色,但在一无飞机、二无军舰配合掩护的情况下,能消灭敌人如此之多,已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整个舟山外围岛屿之战,我军共消灭敌人 8800 余人,如果将登步岛和桃花岛之战歼灭敌人数量相加,即占二分之一左右,可见 21 军 61 师配属 22 军作战,功劳不小,歼敌不少,仅从这一点来讲,登步之战也不能算是败仗。

三是引起了中央注意,加速了沿海岛屿解放。继金门之战 28 军失利后,登步之战又不够顺利,引起了华野乃至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采取了加快海空军建设、集中优势兵力、提高渡海作战审批权限等重大战略决策,对以后的渡海作战起到了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从那以后虽然渡海作战稍停数月,但我军在毛主席战略方针指导下,一刻也没有放弃决心,而是加速准备,并取得了海南岛战役的胜利,迫使蒋军在我登步之战的威慑和 1950 年 3 月 5 日~4 月 30 日解放海南岛之后,很快放弃舟山逃往台湾,舟山群岛遂于 1950 年 5 月 17 日宣告解放。

四是实践了渡海作战的艰难历程和考验,增强了解放舟山的决心。在当时一无大型船只、二无海空掩护、三无充足战备物资补给、四无后援兵力补充的情况下,我进攻登步岛部队,不顾个人安危,怀着一颗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之心投入战斗,决心消灭守岛之敌,救岛上人民于水火,完成解放舟山的光荣任务,付出了血的代价,涌现出若干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事迹,将永载史册,传于后代,至今激励全国人民在不放弃其他适当方式的情况下,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

业,粉碎台独分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野心,同时激励我军将士,随时作好准备,实现祖国统一。大家深深知道,没有兵临城下的军事实力,就没有和平统一的早日实现;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虽不一定要打,但却不能少,这一非常浅近而又明显的道理,是众所皆知的。

五是英勇果断撤出战斗,创造了渡海作战受挫后保存实力的奇迹。登步之战在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之后,遭到了数倍于我敌军在海空优势掩护下的疯狂反扑,使我军处于十分不利地位,而此时我攻岛部队已既无粮草又无救兵,每一个干部战士都有为国捐躯的思想准备。此时此刻我军前线总指挥 61 师师长胡炜,当机立断,请示上级批准,在敌人重兵防守,不时对我发起更大攻击情况下,调集船只,且战且走,将部队安全撤出战斗,创造了渡海作战的特殊战例。此举既震慑了敌人,又保存了实力,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指战员的拥护。自古“胜败乃兵家常事”,但突出战例将世代相传。胡炜同志是我军一位优秀高级指挥员,年轻挑大梁,战场建奇功,后来先后担任了 21 军军长、副总参谋长和军委办公厅主任等要职,也是上级知人善任之举。

讲到登步之战的经验教训,也是非常深刻和值得记取的。

一是准备不足,实力欠够。在当时船只、兵力、装备、补给欠缺的情况下,仓促投入战斗,一旦受挫,孤军奋斗,既加剧了解放该岛的难度,又增加了战斗伤

亡。毛主席向来主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虽然渡海作战与陆地作战不尽相同,这些基本原则是不能忘记的。登步之战结束后,毛主席对舟山渡海作战迭次电报指示,除强调加速海空军建设步伐外,也反复强调了以上原则。

二是求战心切,准备不足。战前 61 师曾向上级首长提出解放登步岛之战的实际困难,要求推迟时日,在未获明确复示的情况下,作为下级部队,以“军令重于泰山”的原则立即发起登步岛之战,并发挥我军优势,取得重大胜利,后因敌重兵增援,顺利撤出,避免了重大损失,但作战最终意图未能实现,且伤亡较大。

三是缺乏瞻前顾后,造成较大被动。登步之战,似很少考虑到守岛之敌增援问题,结果此事不但发生了,而且其数量和实力大大超过了守岛之敌,以致造成我军骑虎难下的被动局面,虽然由于 61 师师长胡炜指挥果断,及时撤出战斗,但毕竟不无侥幸,这并非“杞人忧天”。过去我军在部署攻城夺地战役时,总是把“打增援”放在重要地位,有些战例甚至演变成“围城是手段,打援是目的”;甚至还有意放弃一些地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主席在战争年代强调“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英明战略思想与决策,在我军作战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在渡海作战中对此点更不能不想,不能不防。

革命熔炉炼真金

——怀念舟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普陀工委原主任杜梅同志

■王兰生

在《渔港夕晖》(普陀区老干部学刊)创刊之际,普陀区委老干部局及舟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普陀工委的同志们,特别怀念杜梅同志。大家说,在他身上闪烁着我党我军坚定不移、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保持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光荣传统。在和他相

处的日子里,大家从他身上学到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传统美德,和他65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朴实本色。

杜梅同志17岁参加新四军,经历了大小战役战斗若干次,英勇杀敌,屡建战功,成为我军出色的基层干部和战斗骨干。1956年转业地方后,在市县企业、工会、人武等岗位上留下了他兢兢业业、忘我工作的先进事迹。离休后被推选为舟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普陀工委主任,又带领同志们爬上黄杨尖,缅怀革命先烈;跋涉岱山岛,瞻仰我党



杜梅同志(右)

早期革命领导干部金维映同志的生平事迹。2002年11月,在纪念舟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成立十周年之际,他以《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为题撰写文章,谈体会、讲传统、跟形势、表决心,立志在有生之年为党的事业多出一把力,多操一份心,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尽上自己的力量和责任,并以他十年从事新四军历史研究的亲身体会,畅谈了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的深远意义与肩负重任,并深有体会地说:“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具体形势,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和更重的任务,我们要联系工作实际,掌握科学方法,求真务实、扎扎实实地致力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我们的力量。”他还联系工作实际和亲身体会,总结了舟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普陀工委十年工作的六条经验体会,起到了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一是通过介绍新四军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丰功伟绩,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大家进一步认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特点,深知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新四军的历史功勋不能忘记。保卫革命的历史成果,建设大好河山,就要热爱和支持人民军队,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共同保卫和建设祖国。

二是宣传人民军队热爱人民、紧跟党走,为人民利益赴汤蹈火、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过去靠(下转第30页)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回忆往事,感慨万千。为什么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从以少胜多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在那艰苦、危险的年代,我军坚如磐石、越战越强?其中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国际共产主义的援助,有亲如鱼水的军民关系,有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有人民军队内部官兵的亲密团结,从而终于取得了正义战争战胜侵略战争的必然结果。

1939 年我 15 岁时从山东省莒南县参加八路军,艰苦的战争岁月将我锻炼成一个人民军队的革命战士。这一切离不开亲如兄长的老同志的帮助和班排长的带领与关怀爱护。下边我讲的就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

1943 年冬,我在山东军区八路军二支队交通连当文化干事,部队住在沂河边上的一个村庄里,这里的主要交通线被日伪军控制着,部队要通过必须在夜间经地下交通网引路。交通连的任务是每天将沂蒙山老区印刷的《大众日报》运到滨海根据地,每人背 40 斤左右的报纸,通过急行军拂晓之前返回,保证滨海区军民每天都能看到《大众日报》。实际上地下交通线大部分被我根据地地方组织控制着,我部队同志由地下交通员引路通过封锁线,部队过去后他们再喊“平安无事”,就这样经过几声“平安无事”,鬼子汉奸“高枕无忧”,我们也顺利完成运报任务。此事看似容易,其实风险随时存在,但经军民巧妙应对,多数情况下都能化险为夷,说到底是个人心向

背问题,除了少数汉奸,谁能心向日本鬼子呢?最关键的是喊“平安无事”的时机要与日本鬼子“规定”的时间相吻合,早了迟了都会引起鬼子汉奸的怀疑,那样不但任务完不成,还随时都会发生意外情况。如此坚持了一年左右,敌我态势发生重大变化,鬼子、伪军一到天黑就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或干脆被我军端掉了,很快沂蒙和滨海根据地联成一片,《大众日报》也由部队人背改由马车运送,我们交通连也跟随部队开赴前线,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就在我离开交通连之前的一天,我忽然高烧不退,卧床不起(后来得知是得了伤寒病)。当时我所在的部队班长姓郭,是一位红军老兵,对战士关爱程度在部队是出了名的。他见我病情严重,便当夜向上级请假,并向群众借了一辆独轮车,亲自推着我上路寻找部队医院,当时部队医院驻地是对外保密的,而且经常转移,但他救我心切,一路上边走边打听,决心不找到医院把我送下不回头。

可能是在路上受了凉,走着走着病情更重了,由于高烧使我精神错乱,一路上我不肯躺在独轮车上,经常擅自下车胡乱走动,使郭班长顾了推车顾不了我,顾了我又无法推车,后来看这样下去实在不行,他就把独轮车寄存在一群众家里,干脆背着我赶路找医院。走着走着,由于我高烧不断,直喊喝水,于是郭班长又决定找一户群众家住下,自己顾不上吃饭,向群众借了一个茶壶先给我烧水,他烧一壶未等冷凉我

主南源

回忆亲如兄长的郭班长

战斗的友谊

胜利的源泉

即喝完,于是他接着再烧,我又一口气喝完,就这样一夜连烧了七壶开水,使我的病情有所好转,烧也有些退了,于是他顾不上个人冻饿,又背起我赶路找医院。功夫不负有心人,直到临近中午终于找到了部队医院,医生检查后疑是伤寒,于是就收下治疗,郭班长千叮咛万嘱咐,请医院“一定要把这个小同志的病治好”,还故意

“板”起面孔叫我“病未治好不能要求出院!”,这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医院归队,同时还要找到推我的独轮车还给群众家。

虽然医院的条件不算好,但比较安定,每餐都能吃到白面馒头,医生见我每餐吃得多,怕肠胃吃不消,就叫我一日吃四餐,这样每次可吃得少一点。医院虽无什么上好的药,但医生对我很关心,所以不到一个月我的病就基本好了,我心中非常想念郭班长和同志们,就要求出院回到部队。班长和同志们见我康复出院,非常高兴。班长还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送我住院路上的情形,同志们听了哈哈大笑,而此时的我却感到脸红。心想,班长一路上背我管我非常辛苦,我还不听话,叫班长担心、为难,实在对不起他,想着想着我便像小孩子一样抽泣起来。班长见我这样,一方面“批评”同志们和我开玩笑,一方面安慰我不要伤心,并说:“现在你出院归队,我们全班同志又可以一起打鬼子、拔据点了,这比什么都令人高兴。你一路上也辛苦了,赶快洗脚睡觉,明天一起执行任务。”我

心里想想也是,于是又眼噙泪花笑了。同志们见我一会哭一会笑的,只好抿嘴扭头,不敢笑出声来,怕班长刚把我“哄”好,又惹我不高兴,再吃班长批评。其实我当时的哭的确不是心里难过,一是感到回到班长和同志们身边,有一种久别回到家中见到亲人的感觉;二是认为自己这次生病因为发烧出了“洋相”,心中感到很不好意思,于是不知怎么的就掉泪了。

这天晚上,我挨着班长睡下,又想起班长饿着肚子背着我找医院,一晚上不合眼,一连为我烧了七壶开水的事。我记得医生对我说:“如果当天晚上没有那七壶水给你补液降温,你的病不会好得这么快,说不定还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你们的郭班长真好!”我听了自豪地说:“那当然了,老红军嘛!他是山东八路军二支队的爱兵模范,那还用说。在他的感召下,我们班行军打仗,不管年龄大小,没有一个掉队的。战斗再激烈,生活再艰苦,大家都愿意跟着老班长打鬼子!”

现在时间过去60多年了,

也不知老班长情况怎么样,光记得他比我大10岁,姓郭,是个老红军,别的都记不得了。想想心中既感激又挂念。正因为我军有无数像郭班长这样的好领导,我们部队才坚不可摧,越战越强,直到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时代不同了,形势发展了,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定要继续发扬光大。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教导,为人民再立新功,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贡献力量。(王兰生整理)

附 记:

主南源,舟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1924年7月生于山东省莒南县,1939年10月参加八路军,1947年6月入党,历任宣传队员、文工团戏剧股副股长、文工队长、文化科长等职,参加过鲁南、泰安、许昌、洛阳、开封、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和解放舟山战役,并荣立二等功。1964年8月转业地方工作,1982年离休。



朱家尖几条具有历史意义的海塘

■黄云隆

今朱家尖岛广阔平原,是几百年来陆续建塘围涂所形成的。普陀山的历代僧人,为保障寺院经费来源和僧众生活供给,都积极地开发一江之隔的朱家尖土地。特别是在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朝廷“恩免普陀钱粮”之后,千方百计筹款和组织劳力建筑海塘,围垦了大片涂地,为后人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将清代中晚期普陀山僧人在朱家尖(不含顺母和农场)北部所建筑的几条具有历史意义的海塘情况分述于下。

一、香莲涂,建设两条海塘,立了3篇碑文

朱家尖北部香莲涂,山丘连绵。东面有乌石塘挡住樟州港海水,中间淤积千亩海涂。僧人曾在西边岙口建造海塘,海涂经过蓄淡后进行播种。“迨后风渐汹涌,冲决石堤,良田尽为荒垒。”造成普陀山发生经济危机,而“僧徒星散,渐见凋零。”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浙江提督陈杰、定海总兵伊某,巡视海防登普陀山。见到僧人“林林总总,或坐蒲团,或翻贝叶,或依岩而栖,或据洞而守。”陈、伊会见普济寺住持了尘。“其夜叙谈于永寿桥畔,(了尘)备陈艰兑。蒙(将军)发慈之善意……。劝募当道巨公,各施兼全。”于是了尘“鸠工庀材,重筑塘堤,不期年而工竣。”这就是南起太古堂,北迄盘陀庵,长约500米的香莲塘(今公路)。翌年冬,陈杰“阅定海营水阵过朱,但见香莲浦塘硗河道,厘然井井……茂草萋萋,生气勃勃,行见数年蓄淡之后,播嘉种,庆登场……可预卜也已。”他兴奋之余,欣然挥毫撰成一篇纪念碑文。

香莲塘建成了,可是岙东端的乌石塘,是天然鹅卵石所组成,遇大潮或风暴天,海水会从石子缝里或越塘而侵入,新围涂地有一半不能蓄淡。嘉庆十七年(1812)秋,新任定海知县沈泰,接见普陀山方丈融通。“得以备悉梗

概”。于是积极开展活动,蒙厦门提督王、浙江提督邱、广东提督李和他本人,各捐俸银600元,共2400元,用这笔资金建成距乌石塘10米左右,与之平行而略长的泥塘1条(今仍存在并发挥效益)。此后,香莲岙千亩海涂,全部可以蓄淡,改造和种植。

为纪念建塘和歌颂有功人士,先后由了尘撰《普济寺香莲岙筑塘记》、陈杰撰《捐筑朱家尖香莲岙海塘序》、沈泰撰《香莲岙添筑泥塘记》,并都携刻石碑植于普济寺。这些碑文民国《普陀洛迦新志》有记载,碑均失。

二、白山头塘,是李长庚所建?还是蔡牵所建?

白山头塘,俗称“千亩塘”,位于白山景区外厂至西山,早已改为路。据现存法雨寺大雄宝殿《朱家尖白山头筑塘碑记》载:“朱家尖白山头,前任僧朗和开垦荡田,及续恩(字超尘)住持,曾于此筑塘,历十七年,得田八百余亩,以渐讯冲缴不已,且筑且圯,迄未成功。今浙江提督李公讳长庚,慷慨好施……遽助以朱提四百,为筑塘资,续恩始得告竣。”李长庚(1751—1808),清乾隆武进士,嘉庆前期官定海镇总兵、福建水师提督、浙江提督。他率浙闽水师转战东南海上,镇压蔡牵、朱濆起义军。

朱家尖白山头世居老人异口同声说:“是蔡牵强盗筑千亩塘”。也有人说:“蔡牵强盗筑千亩塘,提督大人筑香莲塘。”蔡牵,嘉庆前期东南海上起义军首领,初以浙闽沿海为根据地,嘉庆十年(1805)率部攻占台湾,被推为“镇海王”。蔡牵军曾驻扎朱家尖,为老百姓做过好事,那里今还流传一些蔡牵的小故事。筑塘事可能是工程将完成,或完成后被风浪冲决口时蔡牵军撤出。而后李长庚到达,见情捐款相助。因为蔡牵反抗封建朝廷,而被视作强盗,当然不会给他记功立碑。

李长庚和蔡，都是福建同安人，又是死对头，都在嘉庆十二年十二月，广东黑水洋战斗中阵亡。

三、外国列强干预的“众香塘”究竟是哪一条？

民国《定海县志·故实志》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僧人集资筑康众香塘，内有涂田四千余亩。二十一年春，有其地天主教民，擅在僧产内立标占为己有，僧人不服起与抗议；会教堂不戒于火，即嫁祸僧人，耸动天主教向官府交涉。时浙江巡抚廖寿丰飭厅同知赵惟喆，劝令僧人让地一半与之，其事始寢。”其后地方志还有“赔银2万余元”一语。

这起历时两年，矛盾不断激化，牵动许多达官贵人，轰动沪杭甬定等地，震惊朝廷的朱家尖僧教争地案。是在法国驻上海领事杜巴叶，向省抚廖寿丰频频施压，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命法舰富尔凡号、因康斯丹号进入定海港待命，两舰舰长戴乐、郭雷尼参加谈判，至普陀山僧人接受各级官员劝告让地一半(2千余亩)后，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0月14日，在定海天主教堂达成“和解协议”。(详见毛德传《法国主教赵保禄朱家尖争地始末》)2002.12.12《舟山晚报·文史天地》。

当时还有个背景，那就是不久前的中法战争和《中法新约》，刚刚发生的中日战争和《中日马关条约》。官员们对这些墨未干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事件，历历在目，心有余悸，唯恐事态发展，后果不堪设想，只得让地妥协。

而僧人心情则愤愤不平，耿耿于怀，屡在一些碑文中提及。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立《各法眷出

资筑塘助寺碑》中：“……普济寺在众香塘内应得538.8亩，因教堂□去所筑之田一半，实得269亩。”又《别庵通祖新公堂序》碑文也有：“光绪十八年，……阖山共筑朱家尖众香塘……共凑洋若干元，买田百亩，以为新起公堂之备，后因外界侵占一半，只得31亩而已。”欲使后人同感失地受屈之痛。

这条过程曲折，鼓噪一时，名扬遐迩，影响深远的庞然大物——众香塘，却不知何时开始在朱家尖消声匿迹了。今世居老人，你问他众香塘在哪里？他会感到愕然，加以思索后答：“旣没”“勿晓得”或“可能会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汇编的《普陀区清末海塘表》名单中也找不到“众香塘”。调查发现有几处“众香塘”迹象。

1、新南塘：353丈，光绪十九年(1893)普陀山僧人建，二十一年(1895)天主教徒修，分为二线塘。这些记载除塘名外，其余情节都与众香塘吻合。

2、北塘：318丈。五眼至西山。它在五眼一端有一座碑门，存有清晰石刻，横匾：众香溪；右联：光绪癸巳(1893—笔者注)穀旦；落款：普陀同人建造。这些石刻所述与众香塘完全一致。

3、老南塘：据《普陀县志·朱家尖》记载：清光绪十九年，普陀山僧集资筑众香塘(俗称老南塘)，沟通朱家尖与糯米团。这里说得最清楚，众香塘就是遗迹犹存的老南塘(原称南塘)。

然而以上每条海塘所围土地面积与昔日众香塘所围面积比较，却是大相径庭，仍令人于扑朔迷离之中。进一步考证分析，笔者

恍然大悟，茅塞顿开。认定众香塘必在这3条海塘中，最大可能是北塘加南塘(有了新南塘之后也称老南塘)，其前合称“众香塘”。现由为：

1、南塘有直称“众香塘(俗称老南塘)”的记载。北塘有“众香溪”石刻的存在。可以佐证以前两塘是一个“众香塘”的名称。

2、南塘与北塘总长2千米，其距糯米团一端相距仅2百米，看起来似一条塘，又是僧人独家投资，所以就定“众香塘”一个名称。

3、僧人收租佃房(田庵)多在北塘附近。多数天主教徒居住在南塘一带，可以说，他们房子都建在众香塘一半的土地上。

4、据《普陀洛迦山志·土地》记载：“1950年8月，普济寺、法雨寺在朱家尖众香塘田地1956亩(习惯亩，相当市亩9折——原注)。加上天主教土地、几十年双方水利、道路、房子等用地，证实众香塘围垦土地确有4千余亩。”

※※※ ※※※ ※※※

笔者学识浅薄，资料匮乏，写此拙文，泛起沉睡一二个世纪的往事，意在抛砖引玉。管见认为，这些海塘位于风景区或其周边，若把建塘过程和遗迹、石碑、碑文等资料搜集整理，进行仿制、复制、重制，加以装饰美化，陈列于风景区亭台楼阁之中，则既能增加游客欣赏内容和兴趣，又使后辈得到爱国家爱海岛爱历史文化的教育，可谓锦上添花和两全其美的大好事。

纰漏错误不当之处，切望批评指正。

宋元明名人

“普陀山(补陀、洛伽)”诗

■杨成其

普陀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是观音大士的道场。《中国名胜词典》载:“据传,五代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日本慧锷自五代山请观音像归国,途经普陀山为大风所阻,于紫竹林结茅留居,建‘不肯去观音院’。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将普陀山佛教各宗统一归于禅宗。”普陀山专供观音而闻名起源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已成为公认的年份。其实,早在隋朝之前的南朝,普陀山佛教已是南朝主要的佛教胜地。《黄廷广记》载:“肖衍出康城二次进香普陀,因康城地近普陀山,将康城又归会稽郡辖。”时间为“梁天监二年”即公元503年。肖衍是梁武帝,灭齐朝后称帝,他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信佛教的皇帝,接帝位后第二年进香普陀,并把康城从吴郡划归会稽。可见,普陀山佛教史可提前400多年(这里不作展开)。

普陀山是佛教名山、旅游胜地,古代的名人留下了浩瀚的诗文,增添了普陀名山的文化底蕴,为普陀山佛教文化、风景名胜带来珍贵的人文资源。现介绍

宋元明十六位名人十八首诗。对诗中费解的作考释的简注,对诗人作简介。

一、游洛迦山 宋·王安石

山势欲压海, 禅宫⁽¹⁾向此开。
鱼龙腥不到, 日月影先来。
树色秋擎出, 钟声浪答回。
何期乘吏役, 暂此拂尘埃。⁽²⁾

(1)禅,静也,佛教以清静为宗,故称禅。禅宗佛教之一派。宫,室也。禅宫指佛教的殿堂房舍居室。

(2)尘,佛教以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佛教称宦途为尘,尘埃即尘垢,喻微末,即人世。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进士。1069年任参知政事。1070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主要有农田水利、均输、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保马、方田均税等新法。由于大地主的反对,新法被废除。1076年罢相,退居江宁,封荆国公。王安石反对因循保守,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的散

文雄健,富有爱国感情,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遒劲峭峻,词虽不多而风格高迈。

二、游普陀 元·赵孟頫

缥缈⁽³⁾云飞海上山,
挂帆三日上潺湲⁽⁴⁾
两宫福德⁽⁵⁾齐千佛,
一道恩光照百蛮。⁽⁶⁾
涧草岩花多瑞气,
石林水府隔尘寰。⁽⁷⁾
鲛生小技真荣遇,
何幸凡身到此间。

(3)缥缈,高远貌。白居易诗:“山在虚无缥缈间。”

(4)潺湲,水流貌。《楚辞》:“观流水兮潺湲。”

(5)元大德二年(1298)春皇后特命中御府臣李英赴舟山宝陀寺驿降御香。出中金百两。

(6)百蛮,南夷之总名,《后汉书》:“百蛮贡职”。列朝对边远地区民族称夷、蛮,有一种中原王朝优越感,恩德施于夷、蛮人。

(7)尘寰,犹尘世也。苏轼诗:“一泓目尘寰。”

(8)鲛,婢鲛鱼即鲛鱼,《汉书》:“鲛鮓千钧”。即今不著盐而

干者。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归安(今属湖州)人。宋太祖第十一世孙。幼聪敏。年十四用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调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益自力于学。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搜访遗逸,荐于朝廷,得世祖信任,由兵部郎中,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卒谥文敏,追封魏国公。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著有《尚书注》、《琴原》、《乐原》。诗文清邃奇逸,书法冠绝古今,中外宝之。经济之学,卓然可立。

三、夕泛海东寻梅岑山观音洞遂登磐陀石望日出处

吴 莱

山月出天末, 水面生晚寒。
舟划然往万, 顷相渺漫星。
河白摇撼岛, 屿青屈盘远。
应壶峤⁽⁹⁾接深, 已云梦吞蟠。
木繁系予缆, 扶桑⁽¹⁰⁾纓我冠。
寸心役两目, 少试鲸鱼竿。

(9)壶峤,方壶员峤,即传说中的仙岛。《列子》载:渤海之东有壑焉,其中有山,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仙圣之所往来,其根无所连著,常随波上下往还。暂峙仙圣诉之于帝,帝使巨鳌十五举首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

(10)扶桑,神木,古谓为日出处。《淮南子》:“朝发扶桑,日入落棠。”又古国名,《南史》:“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其上多

扶桑木,故以为名。”今亦称日本曰扶桑。

四、又

起寻千步沙, 穹石塞行路。
怒涛所纵击, 徒以顽险故。
卓哉梅子真, 与世良不遇。
上书空雪衣, 烧药还湮树。
元螭⁽¹²⁾时侧行, 缟鹤⁽¹³⁾一回顾。
从之招善门, 沧海昼多雾。

(11)穹,巨大,《汉书·司马相如传》“触穹石”,穹石,巨石。

(12)螭,若龙而黄的怪物,无角,古人雕刻,多仿其形以为饰。

(13)缟,白色生绢曰缟,缟鹤即白鹤。

五、又

茫茫瀛海间, 海岸此孤绝。
飞泉乱垂纓, 险洞森削铁。
天香固遥闻, 梵相⁽¹⁴⁾俄一瞥。
鱼龙互围绕, 山鬼惊变灭。
舟航来旅游, 钟磬聚禅悦。
笑撚小白华, 秋潮落如雪。

(14)梵,佛教用语,清净、寂静,《妙法莲华经》卷三:“净修梵行。”佛皆称梵,梵相即佛相。

吴莱(1297—1340)原名来凤,字立夫。浦江人。直方子。天资绝人,七岁能属文。延祐七年(1320)以《春秋》举,上礼部不利。退居深袅山中,益穷诸书奥旨。学问渊博,从学者众。尤以文学名世。著《尚书标说》六卷,《春秋世变图》二卷、《春秋传授谱》一卷、《古职方录》八卷、《孟子弟子列传》二卷、文集六十卷。后荐调长芎书院山长,未上任卒,年

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谥渊颖先生,并为选编《渊颖集》。

六、游普陀 明·张信

浮生同一梦, 感慨怜我情。
文章祇覆缶,⁽¹⁵⁾ 铅槩⁽¹⁶⁾总顽形。
拂兹衡竇下, 凌彼天之层。
和风灏云龙, 清樾⁽¹⁷⁾培佳程。
睠言⁽¹⁸⁾游仙侣, 趣趾成蓬瀛。

(15)祇,大也。缶,瓦器,大腹而敛口。覆,倾出也。

(16)铅槩,古人记录文字之具,铅所以书,槩,木板也。《西京杂记》:杨雄怀铅提槩。

(17)樾,得仁德之庇荫也。

(18)睠,勤厚之意,《诗》:“睠睠怀愿。”睠言,即勤言。

张信(?—1397)字诚甫。定海人。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升侍讲。三十年(1397)会试,录取者均为江、浙、闽考生,中原、西北考生怨声四起。朱元璋令信等复阅试卷。信认为原取无错,触怒朱元璋,惨遭弃市。博览群书,尤精《尚书》、《毛诗》。《定海厅志》录有其诗作数篇。

七、普陀山 陆光祖

天抱琉璃宫, 鼇柱⁽¹⁹⁾不见底,
谁骑香象来, 明月弄空水。

(19)鼇,传说大海里的大鳖。鼇柱,支撑仙岛之用,见注(9)。

陆光祖(1521—1597)字与绳,号五台。平湖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万历中累迁工部右侍郎。以议漕粮改折,忤张居正,引疾归。居正歿复起,官至

吏部尚书。以推用饶伸、万国钦忤旨,求去。练达朝章,每议大政,一言辄定。再居吏部,推毂人才,不念旧恶,人服其量。卒谥庄简。

八、礼洛伽山 沈明臣

三神山远不能寻,
惟有洛迦名古今。
万里扶桑开四照,
九天灵鹫⁽²⁰⁾削孤岑。
一支鸚鵡多饶舌,
遍海莲花不染心。
谒罢潮音灵洞口,
皈依愿发晚涛深。

(20)灵鹫,释家以灵鹫山为神山。《传灯录》:“释迦在灵山会上,手拈一花示众,迦叶见之,破颜微笑,世尊遂付于正法眼藏。”

沈明臣(1518—1595)字嘉则。鄞县人。诸生。明嘉靖间,胡宗宪来浙督师平倭,辟为幕僚。才思敏捷,宗宪宴将吏于烂柯山,明臣席间作《饶歌》十章,援笔立就,甚得赞赏。一生著作丰富,有《越草》、《丰对楼诗选》、《荆溪唱和诗》、《吴越游稿》等。

九、题补陀 万表

挂席凌瀚海, 长风两鬓骚。
俄然见宫殿, 出没在波涛。
龙女呈珠贝, 如来现玉毫。
直将超世界, 诂独解天弢⁽²¹⁾。

(21)天弢,弢与韬通,《六弢》周兵书名。天弢,天书。

万表(1498—1556)字民望,号鹿园。鄞县人。世袭宁波卫指挥僉事。明正德十五年(1520)武试第一。仕至漕运总兵,僉书南

京军都督府。督漕日久,于国计赢绌,河流通塞,靡不洞悉。嘉靖三十三年(1554)海上倭乱,散家财募壮士,欲与倭决一死战。次年赴任南京,经姑苏,猝遇倭寇,中流矢。越年卒。通经术,研理学。嘉靖中与王汝中、罗达夫、唐应德俱名于时。居官四十年,家无余财,瓶钵萧疏。著有《海寇议》、《玩鹿亭稿》。辑有《万氏家抄济世良方》。

十、游宝陀寺 黄猷吉

直为探奇过上方,
居然台殿水中央。
到知海岸真孤绝,
遥望瀛洲亦渺茫。
石洞寒潮鸣梵呗,⁽²²⁾
竹林明月放圆光。
鲸波⁽²³⁾一洗烽烟息,
仰见慈灵遍八荒。

(22)《合璧》:“曹子建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音清响哀惋,独听良久乃摹其节写为梵呗。”呗,赞咏之声。梵呗,即佛教诵佛经之声。

(23)鲸波,谓海浪。

黄猷吉,字仕贞,山阴(今属绍兴)人。明隆庆二庆(1568)进士。官至僉事。善书大字。

十一、寄题补陀 宋应昌

洛伽山浸海波中,
大士西来彼岸通。
不是世人迷苦海,
肯教说法到天东。

宋应昌(1536—1606)字时祥,号桐冈。仁和(今属杭州)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知

绛州,进副业都御司,巡抚山东。疏海防事宜,预策倭患,进选将、练兵、储粟三策。万历二十年(1592)倭突入朝鲜,拜兵部右侍郎,与提督李如松渡江援朝。破平壤,进收开城、黄梅、平畿、江源,四道悉下。不久,引疾乞休。二十七年(1599)再起东征,叙平壤功,加右都御史。

十二、宝陀寺礼大士 屠隆

巍巍法王子, 无人所师尚。
远从身毒国⁽²⁴⁾, 大法来龙象。
孤高托庵宇, 浩劫乘溟涨。
诂应爰空阔, 无乃悠流浪。
人生坠苦海, 神识昏滢漾。
哀哉万劫中, 业趣日酝酿。
慈氏兴大悲, 弘誓度群妄。
微言深奥衍, 妙义蔚遐畅。
不废耳目用, 而忘耳目相。
世音乃以观, 观彻理无障。
三千及大千,⁽²⁵⁾桴鼓⁽²⁶⁾答灵贶。⁽²⁷⁾
周遍法界中, 咸令满所望。

(24)身毒国,国名,天竺旧名身毒,即今印度国。

(25)三千及大千,佛教用语,《华严经》:“四天下共一日月为一世界,有千世界有一小铁围山绕之名曰小千世界,有小千世界有中铁围山绕之名曰中千世界,有中千世界有大铁围山绕之名曰大千世界,此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有百亿须弥山。”

(26)桴鼓,桴,《乐雅》栋谓之桴,又《礼》“蕢桴而土鼓”,桴,击鼓杖。桴鼓,击鼓之意。

(27)灵贶,灵,神灵;贶,赠,赐。灵贶,神灵赏赐。

屠隆(1542—1605)字纬真,长卿,号赤水、鸿苞居士。鄞县

人。有异才，下笔数千言立就。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知颖上、青浦县，与名士泛舟置酒，纵游九峰三泖产而不废吏事。迁礼部主事，遭风言被劾，置归。著有《鸿苞集》、《考余事》、《游具杂编》，及《由拳》、《白榆》、《采真》、《南游》诸集。工词曲，有传奇《昙花记》、《彩毫记》、《修文记》三种。

十三、题洛伽 李樵

远避灵壤镇海东，
参差台殿出寒空。
窗临翠碣晴含雨，
岁憾银涛夜吼风。
羈继自怜归钝质，
皈依尚许悟圆通。⁽²⁸⁾
霜钟午夜声初彻，
坐看扶桑日拥红。

(28)圆通，佛教语，《楞严正脉疏》云：“六根互用，周编圆融，成兹妙果。其人方法，最为方便者，即从耳根修入，耳根闻性，人人本自圆通。”

李樵，字孺，明鄞县人。万历进士，历广东盐法僉事，巡抚贵州。进兵部侍郎。卒谥忠毅。著有《东粤盐政考》。

十四、题补陀 黄之璧

名山梵刹海东开，
金作禅宫玉作台。
万点慈云青雀下，
半空法雨白龙来。
依微石室窥无相，
彷彿珠幢见辨才。
谁似神僧杯可渡，⁽²⁹⁾
摩尼⁽³⁰⁾自取照蓬莱。

(29)《传灯录》：“杯渡和尚，不知其姓名，常乘木杯渡河，故以为名。”

(30)摩尼(216—217)波斯人，创摩尼教，融合拜火教、佛教、基督教之教义。时波斯王萨颇在位，不信其说，仍传教于东北诸国，从者曰众，波斯王亦皈依。然波斯教徒皆恶之，捕摩尼，钉死十字架，剥其皮，实之于草。惟崇信者益广，回纥人争奉其教，遂传入东方。

黄之璧，明人，字白仲，上虞人。工辞章，书画亦名重一时。

十五、礼补陀山 董光宏

东南泽国中， 往往饶异迹。
巨海峙补陀， 大士下所适。
俯瞰天溟池， 悬崖九千尺。
当时现法身， 青莲大如席。
龙神日来朝， 洪涛恣喷射。
灭没数点烟， 天尽地无坼。
波涌山势摇， 日蒸海气赤。
境内万里舟， 域外三韩舶。
乘潮破巨浪， 乱飘互相踈。
去年诏使至， 旛幢映岩石。
遂令泮泮中， 今古长赫奕。
西方有圣人， 东海乃其宅。
我今飞渡来， 膜拜恍今昔。
摩娑薝蔔花， 四望晓天白。
忽忆生前事， 廿年此面壁。

董光宏(1556—1628)字君谟。鄞县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巡查八闽，平反最多。擢河南按察僉事，迁参议，晋副使，镇汝州。后又升河南布政使参政，陕西按察使、顺天府尹、南京大理寺卿。不畏权贵，因不贺魏忠贤生祠落成，而招陷害。

十六、海门望补陀 薛三才

大界名山尽道场，
独看祇树⁽³¹⁾接扶桑。
辘轳⁽³²⁾万劫留香火，
龙象双驯护法藏。
钵水迸添潮汐上，
炉烟散入海云苍。
蛟门直望天门廻，
几度迷津问去航。

(31)祇，地之神曰祇。祇树，即神树。

(32)辘轳，汲水之器。

薛三才(1555—1619)字仲儒，号青雷。定海人。明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庶吉士。历任礼、户、兵科给事中，湖广右参政、分守荆西道，右副都御史、巡持宣府。在台谏勇于建言，维护正人。在边防整饰军纪、修筑城堡，厘剔弊端，制御有方。官至兵部右侍郎、尚书。积劳成疾，卒于官，赠太子太保，谥恭敏。遗有疏稿十四卷。

十七、和家兄寄题补陀 薛三省

磐陀咫尺几时攀，
恍恍天临闾阖间。
日濯琉璃明十界⁽³³⁾，
水含宫殿动三山。
莲花隐见摇波白，
竹叶参差着石斑。
莫道庄严⁽³⁴⁾消息达，
月明沧海听潺湲⁽³⁵⁾。

(33)十界，佛教语，指六凡(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

(34)庄严，佛教语，谓装饰。

《法苑珠林》：“当速庄严，致力远处。”佛经于国土宫殿衣饰等壮美威严者，皆曰庄严，言其装饰之美。

(35)潺湲，水流貌。《楚辞》：“观流水兮潺湲”。

薛三省，字鲁叔，号天谷，定海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为庶吉士，授检讨。历右谕德、东宫讲读官。无启间官至吏部尚书。时魏忠贤权倾朝野，遂称病乞休。崇祯改元，授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命下，卒已逾月，赠太子太保，谥文介。著有《薛文介文集》、《易蠡》、《春秋辨疑》等。

十八、游补陀

邵辅忠

洛伽岩海水悠悠，
大士莲台自一洲。
佛山三摩传不夜，
钟声万里彻清秋。
天澄虚白遥连壑，
山净空青下满楼。
剩得禅心同莽荡，
那知消息问泥牛。

邵辅忠，定海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工部郎中。天启五年（1625）以附魏忠贤，骤迁至兵部尚书。七年（1627）官至太子太保。诸奸党攻击正人，多其主使。忠贤败移疾归。寻入逆案赎徙为民。



宋元时另有一个沈家门

沈家门历史地理位置及其变迁谈

沈品权

（1225~1227），是南宋皇帝理宗的年号。

《宝庆图》上标明的沈家门，东面是大海；西面叫东村，再过去是芦花场、小蒲岙、大蒲岙；北面是东龙堂。南面，那是我们所熟知的今沈家门城区，地图上是一片空白。

今沈家门城区大部，那时还是一片浅海海域。它要到清朝时期建多条海塘才围成适宜居住的陆地。《普陀县志》“沈家门港岸线变迁及港区形势图”标明，直到1736年，今大蒲岙、教场靠山一带还有海水侵入。因此，南宋的沈家门只能是在今城区北面的山峰后面。

进一步探讨古代沈家门的四至。《宝庆图》上述几个地名，东龙堂、东村已不再存在。但今芦东水库大坝处，古有龙堂庵，东龙堂应指今孟家庙至里山一带，现在的陆家水库和芦东水库周围。

南宋东村的位置，我们可以从今天仍在的芦花、小蒲岙、大蒲岙来对应确定。古芦花场是宋代大盐场，它在当时应是一片海涂，大约在今施家岙周围。《南岙村志》称，南岙过去是古芦花场的一部分，现在的勾山街道南岙水库曾有古船板出土。这提示我们，南宋时舟山本岛东南部大块陆地，还被淹没在蓝色海洋里面，海岸线与今天相比有很大不同。

笔者以为，南宋时的沈家门，是指今沈家门城区以北、东龙堂以南、芦花场以东的这么一个居民点，大致在今天的邵岙、南岙至沈家坑一带。此沈家门不

本文提要：沈家门最早是指今芦花孟家庙至沈家坑一带航道的航门。后来被移用到今邵岙、南岙至沈家坑一带居民点作为地名。直到明朝中后期开始，才被确定为今天的沈家门城区区域地名。

南宋沈家门的四至

目前已发现关于古代沈家门地理位置最早的地图，是浙江图书馆补刊的《宝庆图》。宝庆

是今沈家门。

徐竟所见的不是今沈家门港

关于沈家门地名至今所见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北宋徐竟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书中说,“而后至沈家门抛泊。其门,山与蛟门相类,而四山环绕,对开两门,其势连亘,属昌国县。其上渔人樵客从居十数家,就其中大姓名之。”

许多研究者引用这段文字后认为,第一,沈家门地名的由来由姓氏所生。第二,徐竟所指的港口是今沈家门与鲁家峙港域。由此得出结论,此沈家门即今沈家门。笔者对第二个观点有不同看法。

理由之一是:前面提到,今沈家门城区当时还是一片浅海海域,古沈家门应是另有地方。

理由之二是:今沈家门港域地理形势与徐竟所说的对不上号。

徐竟说,他所见的沈家门与蛟门形势十分相似。蛟门在今镇海出海口附近。镇海招宝山下是府港,府港下为浹港。浹港两岸是陡峭的山,浹港外有一悬海岛称蛟门。粗看起来,这与沈家门与鲁家峙情况有点类似。但再看下文更详细的描述:“四山环绕,对开两门,其势连亘”,似乎就有点不对头了。

今沈家门与鲁家峙港域没有“四山环绕”之形。港域另有墩头至马峙、马峙至鲁家峙等多处水道海门,并非“对开两门”。至于称“其势连亘”,看沈家门山势由岭陀山起,东至半深洞、西尽

板桥头,似也难以得出这一结论。

徐竟所见的沈家门港口又在何处呢?笔者以为,应从复原南宋时舟山本岛海岸线着手,结合《宝庆图》提供的古代沈家门的四至信息加以考证。笔者的做法是按地图标志的这一带山脚线勾画,结果发现今芦花孟家庙至沈家坑一带其时具有徐竟所描述的地理形势特征。

注意图中今孟家庙至沈家坑一带地理形势:岂非更似“四山环绕,对开两门,其势连亘”?当时的芦花和应家湾还是一片汪洋。芦花河道与应家湾河道汇于今勾山海面。黄雉山当时应是一个小岛,似蛟门山孤悬海中,芦花和应家湾外口两海门对开并列,船舶进港见到的便是“四山环绕”感觉,且能见港中山势由东而西“其势连亘”。

可见,徐竟所见的是另一个沈家门。

昌国州古地名暗藏的信息

古代沈家门并非即今沈家门城区,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中找到一些线索。

《昌国州图志》记八十三岙(居民点)有:“翁浦、洞岙、严家岙、泽浦、郑岙、刘岭东、寺岙、姚家岙、祝家岙、小莆岙、大莆岙、马岙、芦花、苔浦、孟家岙、沈家门、田公岙、大翦、黄大岙、邱家岙、南岙、东村、施家岙、小芦、钓屿、沈家岙”。

古地名往往能告诉我们许多信息。上述地名及其排列,暗

示出些什么呢?笔者以为,首先,这在告诉我们当时的沈家门仅仅是不大的一个居民点;其二,它的大致地理方位是在孟家岙与田公岙之间。

田公岙地名至今还在,而孟家岙这一地名后来改成为孟家庙。笔者查到的信息是,其起因是后来因卖缸船只在此地定泊,庙前卖缸,俗称为卖缸庙。这两个地方都不是在今沈家门城区范围内。

《昌国州图志》中又有记载,元至元十四年(1277),普陀山住持如智“于沈家门侧建接待寺,以便往来者之宿顿”。现在许多人认为,此接待寺是在今沈家门城区内。其实,如智所建接待寺遗址仍在,位于原东龙堂之里山。当时去普陀山的渡口在今陈家后。这一带都是在今沈家门城区北面的山峰后面。

我们把《昌国州图志》与《宝庆图》连起来分析,得出的结论应该还是:宋元时期,沈家门在今芦花孟家庙周边,大致在今天的邵岙、南岙至沈家坑一带。

从沈岙到沈家门

明末清初高僧木陈道忞说,自晋之太康,就有许多信徒到今普陀山参拜观音。笔者近年来也在孟家庙一带收集到出土的汉代衣带钩和晋代五铢钱。这虽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也足以说明古沈家门地域在北宋前已有居民定居及商品交易。

笔者推测,沈家门的地名有可能形成于三国东吴时期至西晋年间。沈家应是最早定居在今

古沈家门啊！

您究竟在何方？

续《宋元时另有一个沈家门》之浅见

■黄云隆

著名渔都沈家门，其人文历史和风貌多有记述，近年来更有地方史行家和爱好者不厌其烦进行深挖和研究，仅其位置和名称来历见之于志书报刊的前后已有十种左右之说，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2004年12月21日《舟山晚

报·千岛文史》载沈品权先生撰《宋元时另有一个沈家门》一文（以下简称《另》文），资料详尽，创见高深，文笔流畅，读后得益匪浅。《另》文异军突起，对古沈家门究竟在哪里？从而又激起一阵探讨和争论的波澜。但《另》文题为“另有一个”，而在文中实际

共列了5个。我知识浅薄，资料短少，却与《另》文高见相悖。自1996年版《沈家门镇志》发表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有关沈家门的记载，认为自古以来只有一个沈家门，它的名称由姓氏与自然实体所组成，地点一直就在今沈家门区域之中。沧海变桑

孟家庙至沈家坑一带的居民，其后，这个地方的航门被海商称为沈家门。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北宋宣和年间。

到南宋宝庆年间以前，由于商船常到沈家前海停泊补给，人们才把原称航门的沈家门特定为沈家地方的地名。最终被官方标入地图。

那么，此时的今沈家门又叫什么呢？笔者认为，它叫沈岙。这可能是今沈家门的 earliest 地名。

清初康熙《定海县志》载，明成化元年（1465），僧德慧在沈家门深岙又建了一处接待寺。这处接待寺便在今沈家门天打岩附

近。这则史料很值得思考。深岙是否乃沈岙之古称，或康熙此志之笔误？但直到清雍正八年（1730），普陀山的宝陀巡检司移驻今沈家门，还称沈岙巡检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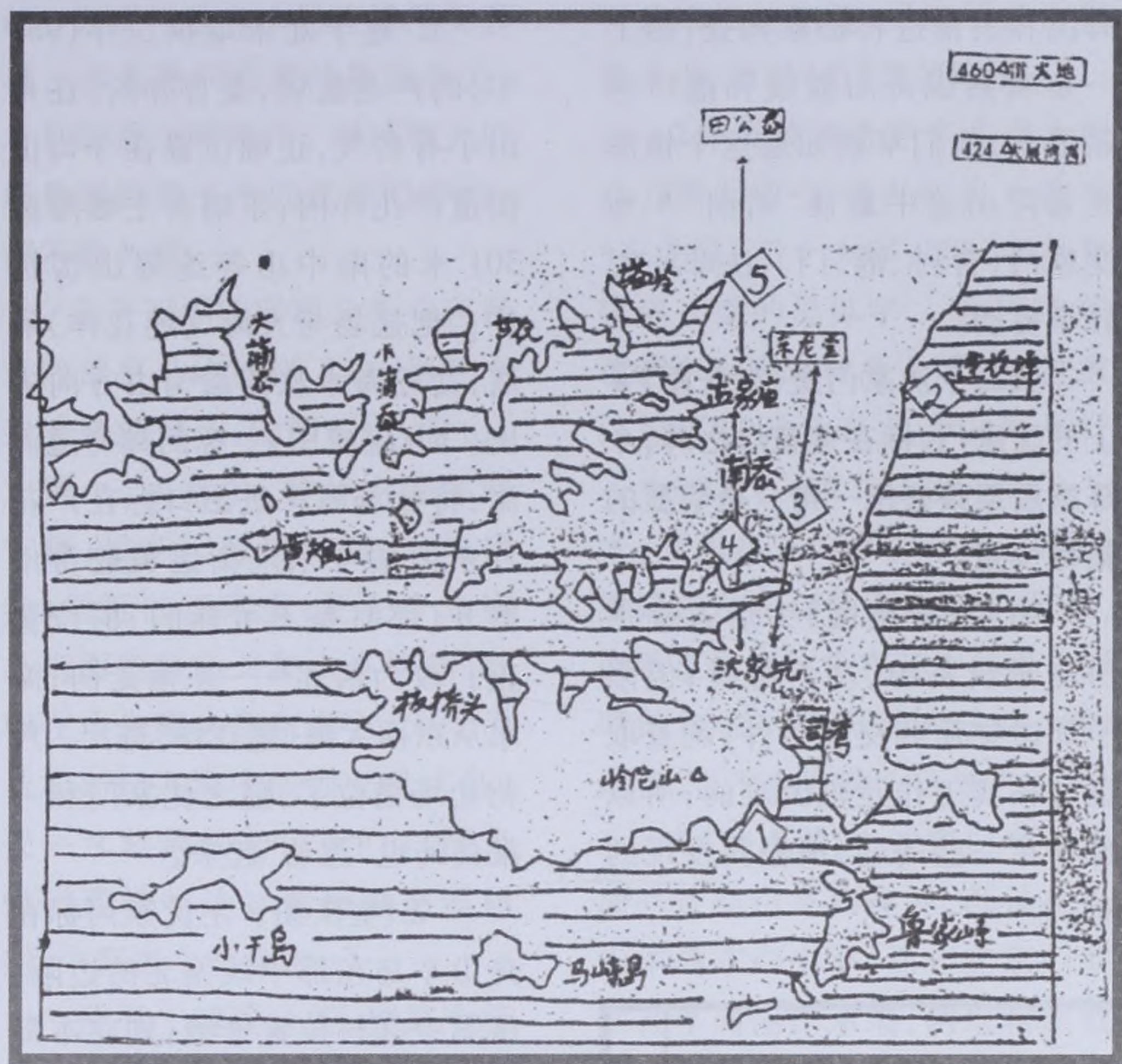
明朝初年，由于长时间的海禁徙民，孟家庙至沈家坑一带的地域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原来的居民点消失了，新的居民点产生了，沈家门的地名也是从这以后发生了变迁。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明朝300年里，尽管政府一直没松口，但海禁事实上也是有松有紧。洪武年间强制徙民，以后就不断有百姓回来。到嘉靖年间（1522~

1566）因倭乱管得很严，其后又松了许多。笔者认为，沈岙这一新居民点的形成，就与这段历史有关。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今沈家门一带更适宜新移民定居。

明朝中期隆庆年间（1567~1571），福建渔民到舟山捕鱼，在沈岙南岭上建天妃宫，在海涂上建大道头，将当时沈岙地方叫成沈家门，这是沈家门地名发生变迁的第一步。

其后，沈岙与沈家门互用，同指一个地方，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到了晚清光绪年间，今沈家门城区才不叫沈岙。



宋元时五个沈家门位置示意图

田,区域范围不断扩大和隶属关系的变更,未曾有名称和整体位置的转移。自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建昌国县以来,一直隶属昌国县富都乡;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废富都乡后,沈家门依次改属定海县洞岙区、第二区、洛舵自治区、洛舵乡;民国21年(1932年)才建立沈家门镇;民国23年划分沈家门镇和荷外乡、鲁家峙乡……至于区域范围的发展,乃有目共睹,毋庸赘述。

《另》文所列的另外4个沈家门,乃是史籍差错和今人误解。现将管见按时代先后分别陈述于下,既是“班门弄斧”之举,又盼获“抛砖引玉”之效;恳求关心沈家门文史的先生们赐教斧正并发表高论,使人们对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的“出身”有个比

较准确的定论和统一的认识。

第一个沈家门是《图经》^①记载的沈家门,即在今沈家门区域之中。

北宋宣和年间,朝廷命徐竞出使高丽。徐竞在明州(宁波)进行造船等筹备工作,组成一支拥有8艘大船的越洋船队,于宣和四年(一说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自明州招宝山(镇海)港启航,因雾碍行;二十五日进沈家门港暂泊,二十六日离沈去普陀山进行佛事活动和候风放洋。《图经》对沈家门的自然地理形势和名称来历作了较详的记载:“其门、山与蛟门(镇海口)相类。而四山环拥,对开两门,其势连亘。”“其上渔人樵客丛居十数家,就其中以大姓名之”(《沈家门镇志》、《另》文均有记载)。根据以上记述与

今实地对照分析,我认为《图经》说的这个沈家门(含门、港、岙)就在今沈家门区域之内,即在北安路至滨港路一带。

“其门、山与蛟门相类”:《另》文既承认:“镇海招宝山下是浹港,浹港外有一悬海岛称蛟门。粗看起来,这与沈家门与鲁家峙情况有点类似。”但又否定说:“四山环拥,对开两门,其势连亘,似乎就有点不对头了。”

“四山环拥”:南面隔江鲁家峙岛;东、北、西三面有青龙山、泗湾山、茅草岗、庙山、戚家湾山、宫墩山等;其外围还有刺棚山、黄舵岙山、大平岗、邻舵山、伏虎山和马峙山等;双层弧形山峦作为屏障,使沈家门成为优良避风港;尤其是能避西北大风。

“对开两门”:东边是青龙山咀与鲁家峙后泥山咀为一门;西边是宫墩山咀与鲁家峙馒头山咀为一门。(山咀学名岬角,那时比现在伸长很多)两门之间是一条约长、宽各四五百米的航道;这条航道以北至今北安路全线约一平方公里的半圆形面积是沈家门港区,因长年累月每天四次从大海涌入涨落潮冲击,泥砂不淤积,水位比较深,所以可抛泊越洋大船。

“其势连亘”:陆上山峰起伏逶迤屹立,与舟山本岛山脉相连。海上潮水奔腾澎湃从大海滚滚而来又浩浩荡荡回归大海,雄伟壮观。

“其上渔人樵客丛居十数家,就其中以大姓名之。”:这个海边小村落是在今沈家门街道泗湾村(也属新街社区)的戚家

湾西边丁家山山麓。此地冬暖夏凉光照好,下海捕鱼,上山砍柴,地间劳作,都很近便。村民是农樵渔兼营,收获产品除自食自用外,多余部分卖给过境船只和邻村盐民。由于只“丛居十数家”,推测建村时间不下数十年,兴许一二十年。说沈姓为大姓那就不会超过十户,可能只有五六户。就是这几户“沈”姓人家和“两门”组成“沈家门”地名。《图经》是至今发现最早记载沈家门和沈家门名称来历的古籍。

徐竟出使高丽,肩负朝廷重托,又关系8艘大船的人命和财产安全。在出航前必对沿途岛、

海况和民情进行勘察调查,船上一定有熟识舟山航线和港口的领港人,他们早就知道这个镇海至普陀山途中最佳“站潮”^⑥地沈家门(含村、港、门),决非一时轻举妄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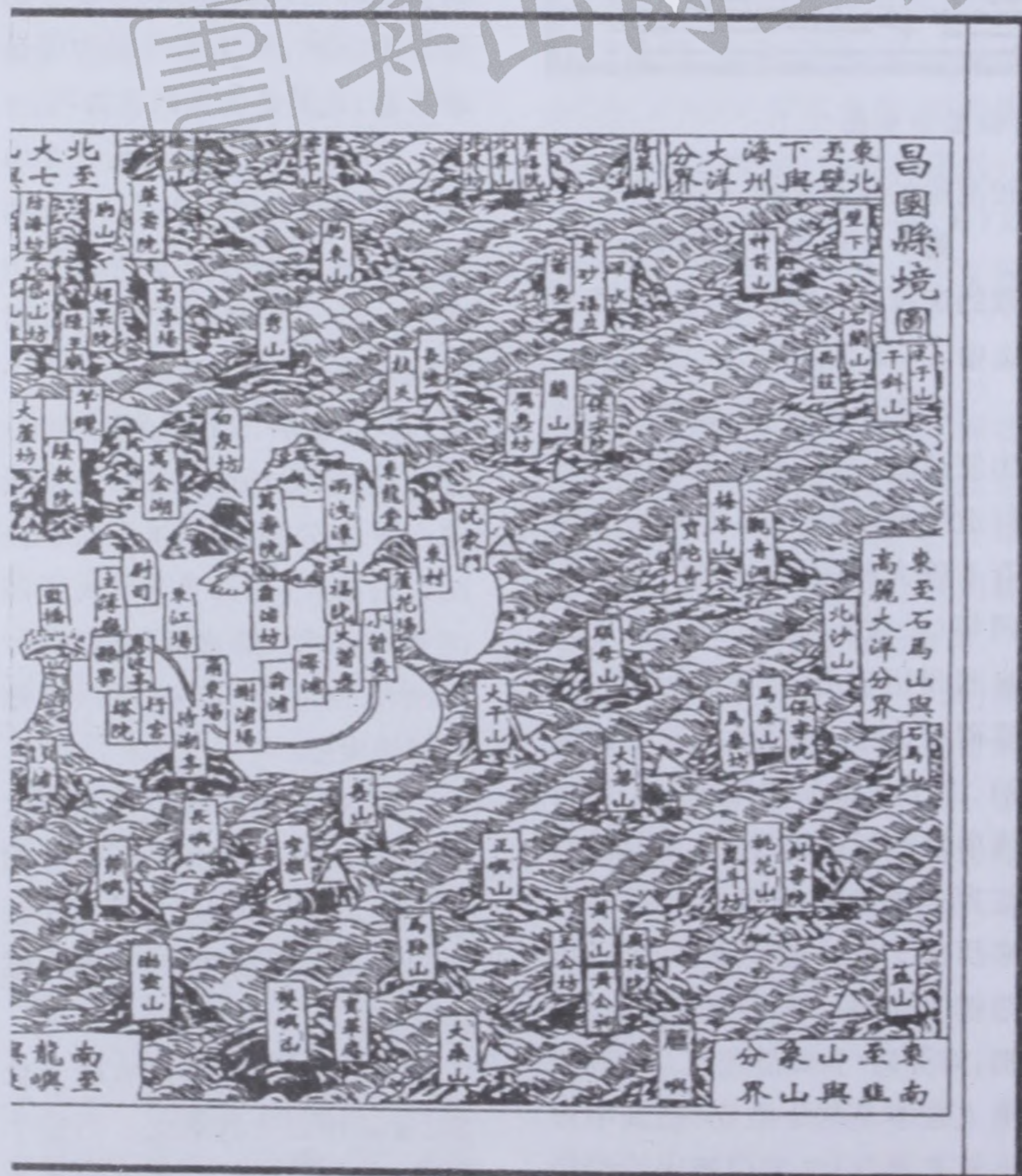
第二个沈家门是《宝庆图》^②上的沈家门,标在莲花洋之畔,今陈家后至茶壶甩一带,是明显的错标位置。

南宋《宝庆图》为后人提供历史宝贵资源,功不可没;但限于那时物质和交通条件,调查取证和核实工作是很困难的;所以也存在一些问题,根据我发现的有:

1. 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年)的芦花盐场,是官办的,在舟山小有名气,正确位置在今勾山街道芦花片内;东端有主峰海拔301米的南中山等连绵山峦挡住,把盐场与大海(莲花洋)隔离,盐场海水从西端勾山方向进出。而《宝庆图》上标的却背道而流,将盐场海水进出口标在芦花片东南端今东港街道黄舵岙山劈开(那时是不可能的)的位置止;改为西北——东南走向;海水从东西大海(莲花洋)进出。芦花盐场错位了,随之沈家门和一批岛屿也“漂动”起来。

2.《宝庆图》上沈家门标在舟山本岛东部中线偏北的边陲,从图中邻村位置推测,则在本岛东端中线偏南,即今陈家后与茶壶甩之间,莲花洋之畔,本岛距普陀山最近(约2千米)处。但这里历来是悬崖峭壁,怪石嶙峋,滩头暗礁林立,洋中风大浪高,过往船只望而生畏。比《宝庆图》早一百年《图经》记载的沈家门不是在这里:(1)与《图经》记述情况大不相同;(2)船队经过刺棚山拐弯到这里暂泊,何不加把劲直驶目的地——普陀山;若天气仍是出发时的西风,则驶向普陀山是顺风,驶到这里要用“单戗”^⑦风,既费力有减速。(3)领航人员不会把庞大船队带到这里,使之受触礁之险和颠簸之苦。

是的,这里古代曾有至普陀山航船,附近有接待去普陀山香客的寺庵,这是借距离近,当地小船在风平浪静时把香客送过去,回来就把船在安全处高高搁



《昌国县境图》东半部分

起。近现代也有小船运销滩头砂石,多是熟门熟路的船民所为。一旦装重立即离开。当地稍大的船是至距数千米的沈家门停泊,都不敢久留。

3.千万年前形成的至今还存在的许多岛屿标错了位,举几个我看得懂的例子:如窄额山、岙山、大箬山、大桑山、黄公山等都向东移;桃花山标在马秦山(朱家尖)很近的正南面;遥在今六横岛南面的韭山(象山县辖地)被标在今朱家尖岛东南方;大干山从本岛迁入海中成独立悬水岛;仅一水相隔的秀山、兰山(清光绪间建塘相连)被掰得遥遥相望,中间嵌个长涂山……

从以上情况分析,这是个标错位的沈家门。

第三个沈家门,今沈家门城区以北,东龙堂以南,芦花场以东,即南岙至沈家坑一带。

《另》文在“南宋沈家门的四址”一节中说:“《宝庆图》上标明的沈家门,东面是大海,西面叫东村,再过去是芦花场……北面是东龙堂,南面那是我们所熟知的今沈家门城区,地图上是一片空白。”《另》文在解释了“四址”的原由后说:“南宋时的沈家门,是指今沈家门城区以北,东龙堂以南,芦花场以东的这么一个居民点,大致在今天的邵岙、南岙至沈家坑一带”。我认为此说似有以讹传讹,又雪上加霜之嫌。东面是大海这是对的。但是:

1. 西面是连绵不绝的大山。要翻过大山,方能见到东村、东龙堂和芦花场,图上沈家门与这些地方都不搭界,它与东村之间

有条细细的空缝,可能示意这里是大山,而被《另》文忽略了。

2. 东龙堂在今芦东水库大坝处,昔日在龙咀大石头上镌有“东龙堂”三个大字,“東”字是繁体多一横的异体字,至1956年建芦东水库时被湮灭了。今沈家门城区以北至东龙堂以南步行一小时左右;芦花场以东约一千米;面积达五六平方千米。中间要跨越芦花山的西岙岭。邵岙、南岙至沈家坑是在其中的事。那时的沈家门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地盘,也不会在这个区域内。

3.《宝庆图》上沈家门与其南面一片空白是相连的,都是在舟山本岛东岸中部,而今沈家门城区在本岛南岸东端,两地相距数千米,是不能划等号的。

因此说既沿用了《宝庆图》错标了的沈家门,又把它四址搞错了,这个沈家门是不存在的。

第四个沈家门,是《另》文根据海岸线和《宝庆图》提供的四址,发现今孟家庙至沈家坑一带,具有《图经》所述的沈家门地理特征。

《另》文作者在“徐竞所见的不是今沈家门港”一节里说:“从复原南宋时舟山本岛海岸线着手,结合《宝庆图》提供的古代沈家门的四址信息加以考证……结果发现今芦花孟家庙至沈家坑一带……更似‘四山环拥,对开两门,其势连亘’?”不言而喻是徐竞所描述的沈家门就在这里。并精心绘制了《古代舟山本岛南东部海岸线示意图》(以下简称《示意图》)。其用心良苦,

令人钦佩。

是的,舟山群岛处处是丘陵地带,象徐竞记载的沈家门那样的地形地貌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个沈家门问题在于:

1. 有与第三个沈家门一样通病,忽略了拦住东面大海(莲花洋)的山脉,《示意图》只能划到大山西麓,不能翻山越岭划至大山东麓濒临大海(莲花洋)的沈家门。从而没有实现《示意图》的初衷。

2. 这里的“对开两门”,是以芦花山西端今观碇头为中线,观碇头以北芦花片口为一门,观碇头以南的舵岙片口又为一门。船只驶入这两门的任何一门,终点都是大山山麓,不能通至大海。这种海湾一般不叫“门”。《图经》在记叙沈家门形势后对“门”作这样解释:“大抵海中有山对峙,其间有水道可以通舟者,皆谓之门”。舟山民间习惯也是两山之间航道称之门的,比较熟识的如马峙门、乌沙门、螺门、钓门、鸛门、虾峙门、双屿门、黄兴门、小板门、青浜门等;今舟山连岛工程中,有里钓门、富翅门、桃夭门、西堠门等。当然也有一些航道不称门的。古时这里许多事物都冠“芦花”为名,如芦花盐场、芦花浦、芦花山、芦花庙、芦花岭等;如果要称“门”,把这两门称之“芦花门”是循理成章的事,何必把远远的、不起眼的“十数家”中沈姓定名呢。

3. 今芦花片平原宋时大部分是盐地,特点是涨潮一片浅海,落潮一片滩涂;船只航行靠一条挖深的芦花浦,这条浦起点孟家

岙(泊船埠头),终点靠近观礁头衔接大海;虽浦中海水滔滔不绝,也只能通行不大的船只,何况出使高丽这样大船,时间又正值农历二十五、二十六日的小潮汛,根本无法驶入。

北宋末期流寇四起,徐竞船队如果在涨潮时勉强驶入,落潮时也必遭搁浅,无异作茧自缚,成为熟路盗贼瓮中猎物。

4.从镇海出发去普陀山的大木船,如进入这所谓“两门”的任何一门,向东至锚泊地估算航程3公里,又调头向西倒回原路驶出,再从平阳浦拐弯,经过今沈家门去普陀山。这个徒劳的“N”形辗转折腾还是小事,其间必遭到逆风和搁浅的阻挠,后果令人莫测,有谁会承担这样的风险?

可以说,徐竞和领航人对航行方案是经过深思熟虑而胸有成竹的,决不会把船队驶到这里来“站潮”。这个沈家门也是子虚乌有的。

第五个沈家门,根据《大德志》^③记载的岙名排列中,认为沈家门大致方位在田公岙与孟

家岙之间。

《另》文在“昌国州古地名暗藏的信息”一节中说:“古代沈家门并非即今沈家门城区”。他从《大德志》记载的富都乡辖区83岙名单排列中,发现“沈家门”排在孟家岙之后,田公岙之前;认为当时的“沈家门仅仅是不大的一个居民点”,“它的大致地理方位是在孟家岙与田公岙之间。”

《另》文前一句是对的,后一句似有牵强附会之处,因为《大德志》对富都乡所辖各里、村区域分不清,只得笼统地把83个岙混在一起,其中既有按照岙所处位置顺序排列,也有因不了解情况而排列不妥的,现仅从《另》文所列26个岙名中,就发现除沈家门有误以外,还有在本岛西北部的“马岙”和东北部的“钓屿”,分别被列在本岛东南部的大蒲岙与芦花之间和小芦与沈家坑之间……

孟家岙和田公岙分别位于海拔两百多米的风水岭的南北坡山麓,北坡为今展茅镇辖区,南坡为今勾山街道(芦花片)辖

区,按《另》文所说沈家门位于其中,这不论在南坡或是北坡或是山颠,都是在塔岭东的崇山峻岭之中,周围有许多大小山头,尤其是在东面矗立着海拔400多米的雷火地和大展湾岗两座大山拦住大海(莲花洋)。如果沈家门南坡,要经过武岭下坡至冷水潭再至陈家后一带大海边。如果在北坡,其山麓有大展湾浅海滩,往东要翻过两座大山经过下塘头(《大德志》岙名,今犹存)才到达海边(莲花洋),沈家门居民点与港口会有如此距离吗?这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根据史籍记载和耳闻目见的实况研究分析,简而言之,宋元时的沈家门必须具备三个自然条件:

1. 有一个依山傍海的小村庄;
2. 有四山环绕,水域优良,能供巨舟锚泊和避风的海港;
3. 有两山对峙,两门对开,供各种船只通行的航道。

没有这些基本条件的地方都是误解的沈家门。

注 释:

①《图经》:《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宋宣和五年(1123)徐竞撰

②《宝庆图》:《昌国县境图》南宋宝庆年间(1125—1127)绘制

③《大德志》:《昌国州图志》元大德二年(1298)郭荐、冯福京编

④本文地名很多,其中有的没有注明时代

⑤附图:宋宝庆《昌国县境图》东半部分

宋元时五个沈家门示意图

⑥站潮:航海方言,船舶航行中遇逆风逆潮时暂泊之意

⑦单戗:航海方言,航行中风从侧面来,航速慢

沈家门地名与姓无关

■陈鸣雁

沈家门地名来历,多认为与古代沈姓居民有关。但对本地历史颇有研究的马绪棠先生早就另有一说:沈家门是根据地理成名的,与姓无关。对此,笔者进行了考证。

据马先生指述:沈家门地名传说始于秦汉,本是水道之名,叫“沉岬”意为沉有岬角之海门。最早是指沈家门的小水埠头至对岸鲁家峙的后泥山嘴之间,两边皆沉有岬角的水道。在古汉语中,由于“沉”“沈”同义同音,“岬”“家”与“”“门”又是同音,以后成了沈家门。

何为沉岬?礁石嶙峋由陆延伸入海,沈家门的原小水埠头最为典型。现在的滨港路区渔业局一带的海岸,过去叫小水埠头。民国初期,那里还是一片礁石丛生的岬角,大潮时沉于水下,为多事地段,小水头潮露出海面,可作埠头泊船,故有此名。从前沈家门到荷外,小水埠头无坦途,要从山上通行,那条青龙山的龙眼路古道,至今还在。沈家门的小水埠头地形是这样,对岸鲁家峙的后泥山嘴地形也是这样,如此两岸,水沉岬角,潮涌海门,叫“沉岬”名副其实。明将

曹时中在《又临沈家门水寨》诗中,有句“山势极临昌国迥,潮声犹带石门雄。”说明沈家门就是个礁石嶙峋的海门,只是后人填平沿港险要和造路建房,沈家门的两边地貌改变了。

现经考证,历代史志及舆图,都是把浓家门归为水道海门的。《定海厅志》对海门之称的“门”,有这样诠释:“门,大水中流,两山对峙如门”。在这个“门”下,载录了《康熙志》:“沈家门,县东过此即莲花洋,明季备倭,此处为第一险要”。再查《辞海》:“亶,音门,水流峡中,两岸对出若门者”。鉴此,可证马先生一说。

古籍中也确有把沈门写成沈家亶的,清《东南纪事》一书就说,抗清名将张名振葬于“舟山之沈家亶”。其实张名振葬在沈家门境北的现南岙村,此书作者邵廷采,浙江余姚人,清历史学家,他把沈家门的“门”确切地写成“亶”,当有其来历和出处。

事实上,按照地理形状成名的并非沈家门一地。定海的十六门,古称“石落亶”(《舟山岛礁图集》又称“石弄门”),意即石出潮落海成门,为了好叫好写,成了

十六门。沈家门地名的最终定型,应主要出于这个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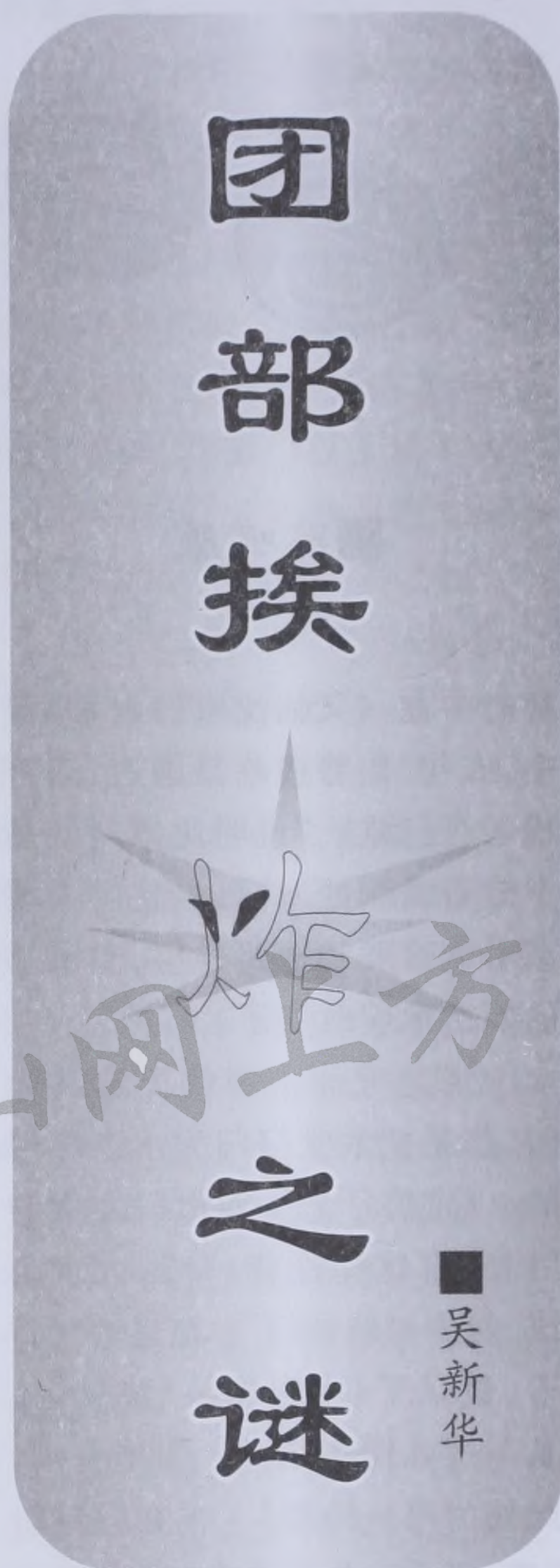
笔者认为,沈家门古名是否始于秦汉,目前还找不到证据。然而从水道(地理)之名演变为地方(姓氏)之名,是因为后来有了居民,有其一定道理。再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沈家门到了北宋晚期(公元1123年),才出现人文记载,说当时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渔农村落,如徐竞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沈家门”》:“其上,渔人樵客丛居十数家,就其中大姓名之”就是一证。由此证实,沈家门成名早开发晚,而其起始之名,实与沈姓没有关系。马氏之说,对进一步考证沈家门的历史,是有帮助的。



1949年11月初,登步岛战斗刚刚结束,我从二十一军青训班结业,来到桃花岛,在61师师部帮助工作,主要是去183团,帮助各营开好登步岛战斗中牺牲烈士的追悼会。时间虽短,但烈士们的英雄业绩,给了我极大的教育。此期间,敌机常来袭扰,作为新兵,开始难免有些紧张。但看到老同志若无其事、照样谈笑风生的样子,也就习惯了,并且还学会了听声音辨别敌机型号的能力:吭吭移动很快的是“小流氓”(美制P-51野马式战斗机),嗡嗡似蚊子叫的是“破稻箩”(日制零式战斗机),轰轰沉重的声音则是“老不慌”(一般是美制B-47轰炸机)。大约当时舟山敌人就只有这么几种机型,所以很快就掌握了他们的特点及规避的方法。

十天以后,我被正式分配到181团宣教股工作。股长滕耀华把我领回团里,背包还没打开,晚上就移防。运输员老孙头,挑着股里宝贝——油印机和文件箱,一面用他那纯正的胶东话嘟哝着:“日他奶奶,一定有特务,我们走到那儿,狗日的就跟着炸到那儿,哪一天逮住了,非拧断狗日的脖子!”

这次移防走得不远,就到了新驻地。天亮一看,小村子紧挨大海,出门是一弯至少有2000米的大沙滩,名叫千步沙。沙特别的细,潮水退下以后,平展展的像面镜子。沙滩对面就是无边无际深蓝色的大海,一个接一个雪白的浪头,不断轰鸣着扑上沙滩,碎成一片泡沫又退下去,壮观极了。我想:苏东坡所说的“惊



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说的是长江,与这儿相比,可能是小巫见大巫了。我过去在电影上见过外国的海滨浴场,心想:战争结束后,这儿可以开辟成多么漂亮的浴场啊!(现在这儿已经被开发成“碧海金沙”的旅游胜地)我们住地的村子也很特别,十几户人家多是互不连贯的独立家院,不管草屋还是瓦房,周围都是高大茂密的苦竹丛,我想从空中看下来,不一定能看到房子,应该会比较安全的。每天蒙蒙亮,团直机关和连队都到海滩上出操,常常能拾到被浪头打上来的乌贼

什么的,拿回来改善生活。这个驻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美丽的场景,多少年后,仍时常在脑海里重现。其实,不仅是我,凡是来过这里的人,都会对此留下美好的记忆。

我们在这个美丽的小村里送走了1949年,迎来了1950年的春天。可是好景不长,这个目标肯定又被敌人发现了。“小流氓”、“破稻箩”经常来光顾。但我们并不太理它们。一天,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听见轰轰的声音,我说:“一定是‘老不慌’来了,要注意!”一边到院子里。抬头一看,果然是一架B-47从北面正对着我们飞来,突然机仓下撒下一大把黑点,仰角正好是45度,我们所处的位置将是弹着点!我连忙大叫:“不好了,炸弹对着我们来了!”屋里的人闻声迅速跑出来,一个个蹿到院边田坎下卧倒。几乎与此同时,周围到处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泥土纷纷落在我们身上。几秒钟后,我们慢慢站起来,掸掉身上的泥土。还好,我们股的几个人都没事。回到屋里一看,玻璃窗和木板墙上,被弹片打了许多窟窿,吃了一半的饭碗里全是土,正在印刷《挺进报》的蜡纸上,也落满了灰尘不能再印了。大家都说:好险哪,幸亏你的一声咋呼,都跑出去了,不然肯定会有伤亡。经验较为丰富的李贵全干事说:“这一大把撒下来的,可能是迫击炮弹,一炸一大片,是专门用来杀伤人员的。淮海战役时,他们就常这么干。这一大片炸弹下来,不知别的股有没有伤亡?”

正在谈论,老孙头从外面跑

回来,先问:“咱们股没事吧?”接着沉着脸说:“团部的陈指导员牺牲了!”

怎么,陈冲牺牲了?大家似乎还不太相信。几分钟前他还在咱们股里。这天早上,我们在大沙滩上找到一些半埋在沙中的破船板,就抬回来当柴烧。团部的陈冲指导员闻讯专门到宣教股来检查,看有没有侵犯群众利益。之后,就坐在咱们股聊天。看到我们正在印《挺进报》,走时还拿了一张去看。在老孙头的带领下,我们绕过竹丛,其实就是屋后的菜园,距我们住的屋子也就十多米。陈指导员仰面躺在地上,棉衣棉帽都被弹片打了些窟窿,露出了棉絮,手里还攥着那张油墨未干的《挺进报》。我来团不久,与陈指导员并不太熟,他曾要我给团部的勤杂人员上课和教歌,所以认识。他年纪比我们大一节,看样子有四十了,是个和蔼可亲可敬的长者,没想到仅仅几分钟就永别了,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接着又听说,紧挨着团部的卫生队也有几个卫生员牺牲了。陈指导员和同时在前沿被敌炮弹击中牺牲的三营营长李家祥的遗体,装殓在从老乡处动员来的寿材里,葬在离团部不远的山坡上;几个小卫生员也葬在那里,不过他们没有棺材了,只按照战争时的一般“待遇”,用白布包裹后安葬了。1986年,到桃花岛故地重游时,陪同的乡干部说,不久前在千步沙附近的山坡上,发现了数具烈士遗骸,其中两个像是干部,装在棺木里,其余的可以看出布裹的痕迹。乡政府想把烈士遗骸集中到烈士

陵园中,可惜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了。我连忙跑到他们挖出遗骸地点去勘察,肯定了这就是当年埋葬的地点。因为,当年我亲自参加了追悼会的操办。于是我郑重地写下了烈士的名字:181团3营营长李家祥、181团团部政治指导员陈冲。可惜那些小卫生员只能是无名烈士了(但后来,我到桃花岛烈士陵园,只见到李家祥的墓,却未见陈冲的墓,而他的名字却出现在沈家门青龙山登步岛烈士纪念碑上,不知是哪个环节弄错了)。

团部又一次挨炸且遭受较大损失,引起团首长的重视。政治处主任胡铁鹏令保卫股长张润强组织人员,在村子里明查暗访,但没有结果。于是,团部再次转移,并且要求大家注意保密、隐蔽,移防也是在夜间进行的。

这次进驻的村子叫邹家堂,位于三面环山的深岙里,别说在空中,就是在地面,不注意也不易发现它,以前是二营机炮连的驻地,从来没有被敌机袭扰过。

这时,战前的训练准备工作日益紧张,迹象表明,再次攻击登步岛的时间已经临近。团首长和司政机关的人员,紧张地到部队检查工作。大战前的紧张气氛,日益浓厚。

五月五日,是我参军一周年,又是一个星期天,我去六连帮助工作刚回到团部,正准备好好休息一下。午饭后,睡了个午觉,起来后想到晚上还要去六连为他们排戏伴奏,就取出二胡拉起来。正在这时,忽然一阵不熟悉的飞机轰鸣,伴随着潮水般的啸声刺耳地响起来。“这是什么

飞机呀?”出于好奇,想去看个究竟。也算我命大,就在我前脚刚跨出门槛时,只觉得天翻地覆山崩地裂,我被气浪掀倒在地,整个屋子倒塌,屋檐砸到我背上,幸亏身旁有一只大水缸,水缸被砸成两半压在我身上,挡住了屋檐塌下来的冲击。但感觉头部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我晕了片刻,猛睁开眼,只见热血呼呼地顺着面颊淌下来,一下子把夹衣全染红了。我想挣扎着爬起来,但动不了。这时飞机还在头上盘旋,不知会不会进行第二次袭击。幸亏咱们股的徐英才跑过,听到我的呼救,用力把压在我身上的半只缸掀起,把我拖出来。这时我虽然还血流如注,但神志却还清楚,我环视了一下,只见整个村子基本上被夷成了平地,估计损失不小。咱们住的房子成了一个直径十多米的大坑,房东家的大嫂,一身的旧衣服被气浪全剥光,捂着脸赤身裸体地坐在地下哭。当时我心中闪过的念头是:“糟了,发起总攻前,团部遭到这样的打击,会不会影响战斗呀!”因为在登步岛战斗中,一八二团和一八三团均遭受了较大损失,再战登步岛,一八一团肯定要担任重任。因此上上下下都憋着一股劲,我自己也渴望到战火中去锻炼。这下可糟了!心里一着急,一阵眩晕,我又倒在地上。

我被简单的包扎后,想自己挣扎着去卫生队,刚走到大路边,就感到头晕目眩,瘫倒在路边。正巧六连有几个战士送病号到团卫生队扛着空担架回来,看到我后说:“这不是在咱连帮助工作的吴同志吗?咱们把他送到卫生队

去!”他们把我扶上担架,飞快地把我抬到团卫生队,经过包扎后,随即转到师卫生营,当晚在那儿动了手术。次日我从麻醉中醒来,医生告诉我:“小伙子,算你运气,头骨上刻了一道槽,再深半公分就完了!幸亏你刚剃了个光头,伤口里面也干净。”当晚把我抬上船,送回大陆到奉化方门军野战医院。我在那里住了二十天,伤还没有全好,就再三要求出院,单身一人步行赶回前方,希望能赶上总攻。但我赶到桃花岛时,知道敌人已经全线撤逃了。一八一团已进驻登步岛。我搭便船上岛归队,见到了分别了一段时间的战友,彼此都很高兴。由于敌人跑了,渔民可以下海,黄鱼只卖三分钱一斤。老徐特意为我烧了一大锅,说给我补补。这时我才知道,这次轰炸的敌机是从台湾起飞的B-24四引擎的重型轰炸机编队,既未盘旋,也未俯冲,一阵弹雨就把邹家堂村从地图上抹掉了。幸亏这天团的主要领导和机关人员都下部队检查工作去了,伤亡了几个看家的通讯员和警卫员。有一点可以肯定:敌人准确地掌握了我们团部的行踪,是一次有计划的袭击。才来到邹家堂几天,敌人就获得了精确的情报,必定是有特务在侦察并提供情报。但遗憾的是始终未能抓住这个特务。

1974年,曾在我军担任过政委的吴融峰在北京病危,领导上让我代表二十一军去探视。在北京期间,遇到了戈基和田苏两位作家,他们正在为北影修改反映我军打舟山的电影《陆军海战队》。他们谈到了去舟山采访和体验生活的情况。他们在那儿采

访很深入,不仅调查了许多当年支援和亲历战争的群众,连当时为敌机指示目标后被我抓获正在服刑的特务那儿也去了解过了。我听到这里,很感兴趣,边追问其中的细节,想知道他是否就是让我们团部吃了大亏的坏家伙。但由于两位作家并未刻意从这方面深挖,所以难以确定这个在押的特务,是不是我想了解的那一个。

1976年,我脱下军装转业到浙江工作。1986年,我们几位在杭州的战友,忽然发兴到桃花岛去故地重游。我们来到岛上,踏访当年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老乡长,桃花岛解放时的农会会长王国富,特意陪同我们到与当年解放桃花岛有关的地方去看看。当我问老乡长是否记得那次大轰炸?老乡长说:怎么会不记得!那时来了一队五个头(四引擎)的大飞机,一眨眼就把个村炸平了。他领着我们从千步沙向北走,在一道土坎上,他指着山岙里一片漂亮的新房子说,这就是邹家堂!正谈着,路上走过来一位老人,听说我们曾在这儿住过,老人也立即谈起了那次大轰炸。村里炸死了不少人,房屋几乎全部被毁,敌人的罪行激起了群众对反动派无比的仇恨。这位老人名叫邹庆球,当年村农会的治保委员。那时,群众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团部刚进驻几天就被炸了,一定有坏货给他们送消息。他带领农友,经过认真的调查和积极的斗争,终于揪出了那个坏货。那家伙,原是岛上的一个二流子,是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坏蛋,这家伙吸毒(吃白粉)

成瘾。桃花岛解放后,他所需的毒品断了来源,毒瘾实在难熬,就千方百计地找门路。当时与桃花岛一水之隔的悬鹑岛上潜伏的特务电台,敌特以提供毒品为条件,令他收集我军的情报,并教他如何利用电台天线等迹象,判断我军指挥机关的位置。于是这家伙就利用他对海情熟悉的特点,一次次偷渡到悬鹑岛,向敌人提供了情报。这家伙被揪出,送到定海关起来,但不久,又因证据不足,被“宽大”回来。他回来后,气焰很嚣张,并扬言要对邹庆球等农会积极分子报复。农会总结了经验教训,更周密进行调查,对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把对解放军造成的损失的情况上报。这家伙终于被我公安部门逮捕,经过审判予以镇压。

哦,原来还有这样一段故事。我紧紧握着邹庆球老人的手,对他说:“谢谢你,老房东,你帮我们解开了这个谜,也为我报了一箭之仇啊!”

随着改革开放,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传播,当地大力开发旅游资源,掀起了一股桃花岛旅游热。游客们知道了秦时安期生泼墨洒石为桃花的故事,下榻于模拟《射雕英雄传》构筑的桃花山寨,踏攀了那些形象各异的海滩和山岩,了解依附在这些景点上的神话。但是他们知道吗?五十多年前扭转这个穷困荒僻小岛历史的那一场实实在在血与火的斗争吗?这样的故事难道不应该成为桃花岛传奇的一段内容吗?我想这就是我今天要解开这个谜并把他写下来的原因。

舟山解放前后

党政机构制发之证章考略

——兼谈证章的功绩

■陈雨信 张信宝

在收藏品大家族中,徽章中可称得上其中重要的部落,而证章又是该部落的重要成员。它涉及的面十分广泛,在民国时期,既有民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机关、国民党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国民大会、三青团、军队、司法、警察、特务机构的证章,又有各种同业工会、学校、文化体育、宗教、洋教和各种社会团体的证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证章的门类相对减少,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机构的发达,证章的制发数量毫无疑问会大大超过民国时期。

据实物断定,舟山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定海县政府于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制发过一枚证章,该证章直径32.5毫米,正面上方有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从右至左边为“定海”二字,中间上下两条横线内从右至左有“县政府”三个稍大白色的字,均为等线体字,下方为“廿八年佩用”字样,为楷体字。背面有编号,现收集到的一枚为“9”号(图1)。另据史料记载,1939年6月定海县境沦入日军之手,新上任不久的湖南籍定海县长苏本善携县政府人员迁至镇海柴桥,成

为流亡政府。中共定海县工委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说服愿意抗日的苏本善为首的定海县政府,重组了定海县战时政治工作队,一批抗日爱国青年和中共党员加入政工队,成为“政工队”的“中流砥柱”。据有关人士回忆,当时在政工队员中也佩戴过县政府制发的定海政工队证章,至今在市文保部门仍保存有数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展舟山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以后所征集到的政工队员证章(图2)。

1949年5月25日傍晚,准

2004年清明节,我们十一位老战友,组成了一个老战士扫墓团,到登步岛和桃花岛为烈士扫墓。镇政府特派邢学火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小邢还专程陪我们来到邹家堂村,探访老房东邹庆球。在邹家堂村口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她指着不远处正向我们走

来的一位大娘说:“她就是邹庆球的老伴。”原来,邹庆球老人,在我们上次来过不久就去世了。大娘叫王仁梅,现在单独住在村边的一幢旧房子里,她说这是那次大轰炸中唯一留下的房子。村里的群众听说当年的老解放来了,纷纷出来迎接我们,并把树上黄橙

橙的泡橘摘下来送给我们。我们到另一户村民家转了转,回到了村口,见王仁梅大娘也摘了一篮泡橘和香泡等着我们。

走了一段路,我们回头看看,王仁梅大娘还站在村口望着我们。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备接管定海的鲁中南南下干部第一大队第六中队（英宜之任中队指导员，王裕民为中队长）随军抵达刚刚解放的宁波。为配合解放军解放舟山，全中队于7月份集中到达镇海县庄桥镇，由上级正式宣布成立中共定海县委和定海县人民政府，英宜之任县委书记，王裕民任县长，王家恒任副县长（据王家恒同志回忆，在此之前，中共台东工委曾于1949年1月，任命王家恒为定海县人民政府县长，定海县人民自卫总队总队长，以迎接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定海）。同时还宣布了经浙江二地委（后改称宁波地委）批准任命的城关、金榭、岱衢、沈家门、小沙、六横6个区的中共分区委、区公所领导成员名单。

据老同志回忆，县政府成立

不久，县委县政府制发了中共浙江省宁波地区定海县委（图3）和定海县人民政府证章（图4），均为圆形，县委证章直径29毫米，铜质，背面有编号。县政府证章直径28毫米，铜质，背面也有编号。

1950年5月17日，人民解放军浙东前线部队飞舟跨海，进军定海，舟山群岛之首舟山岛宣告解放，标志着舟山群岛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5月18日，定海县委县政府进驻定海，办公地点设在东门外护城河畔的许家红房子内（现为陆军113医院门诊部），不久，县委迁至城内东管庙弄王家大院办公（现为市退管委所在地，习称“72家房客”），县政府迁至现在的市委大院内办公。至当年10月份，由于县政府

系统人员增加，原制证章不敷发放，县府又新制发了证章，新证章设计为长方形，长36毫米，宽18.5毫米，铜质，背面有编号（见图5）。据市文化局离休干部车戈回忆，当时是以旧证章换新证章，他的旧证章编号为66号。另据市水务局离休干部周美强回忆，当时机关制发证章主要是为了确保机关安全，便利进出，站岗人员认章不认人。现市档案馆保存的定海县人民政府案卷中，尚有1950年10月5日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登记发放证章的记录表，县长王裕民的证章编号为001号，副县长王家恒为002号，秘书祝云诚为003号，……定海县人民法院请领证章花名册中，记载着审判员、检验员、书记员、法警等共有8人领了119

至 126 号的证章,领用日期为 10 月 10 日,每个领章人均盖了私章,可见手续之严密。另据档案记载,当时的县文化馆、招待所、浙江省定海县中央公粮分库、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均作为县政府系统机关工作人员而领了县政府的证章。

1953 年舟山专区成立之后,定海和普陀、岱山各县县委、县政府均新制发了证章,现尚有定海、岱山两县县委、县政府和普陀县政府保存的证章(图 6)可鉴。另据曾在舟山地委专署工作

过的老同志张玉麟、曹孟陔回忆,1953 年专区成立后,地委、专署均制发过证章(图 7)。

制发证章,不但起到一种标记作用,而且还对佩戴者起到激励、荣誉感及自我警示和社会监督等作用。曾有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为全军“优秀学员”证章题名,必将进一步激励广大院校学员争先创优的积极性、创造性,把院校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打得赢”、“不变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军事人

材。近年不少企业、机关流行的上岗牌(悬挂或佩戴胸前或置放在办公桌前方),其目的应是便于社会公众对自己的服务水准进行监督,实际上也是证章功能的一种延伸。

证章如同奖章、纪念章、勋章等,都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因而它对印证历史、考查史实具有可靠的凭证作用。不仅如此,一些证章设计精巧,取材考究,不失为一种历史艺术品,在收藏界越来越受到青睐,对它的研究宣扬工作也正方兴未艾。

附:《辞海》有关徽、徽章的注释

(一)徽:标志,符号。如国徽、校徽、帽徽。

(二)徽识(-zhi)古代军士所佩的符号。《右传·昭公二十一年》:“杨(扬)徽者,公徒也。”孔颖达疏:“徽识,制如旌旗,书其所任之官与姓名于上,被子于背,以备其死知是谁之尸也。”后通用为标志之义。

(三)徽章:(1)古时军队所用的旗帜。《国策·齐策一》:“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高诱注:“徽,帜名也……变易之,使与秦旗章内。”“帜”通“帜”;章,旌旗。(2)佩戴的证章。

(见辞海 813 页)



登步岛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树立记

王兰生



解放战争后期,大陆国民党守敌除西南少数地区外,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岛屿。我华东人民解放军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解放全中国”的指示精神,1949年11月3日,过军舟山的21军61师,奉命发起歼灭盘据在登步岛的国民党军队守敌的战斗。我军战胜潮急浪大、地形陡峭的困难,冒着敌人负隅顽抗的炮火,强渡海峡,突破天堑,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经过二天二夜激战,歼敌3200余人,控制该岛大部地区,登步岛解放就在眼前。正在这时,敌人突然紧急调集舟山本岛的残余部队的四个团兵力乘舰艇急援登步守敌,造成敌众我寡,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而我军既无援兵,又无补给。我前指首长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在给了反扑敌人以重大杀伤并请示上级批准后,组织部队撤出战斗,避免了更大伤亡,但仍有

数百名指战员长眠与此。21军61师登步岛和22军大榭、金塘之战,打破了敌人鼓吹的“共军没有飞机和军舰,不能胜任海岛作战”的神话,为解放舟山之战总结了经验,奠定了基础。登步战斗不久,在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舟山守敌为了摆脱全部被歼的命运,遂仓惶逃台,舟山本岛于1950年5月17日宣告解放。

从那以后,舟山军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为登步岛战斗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1975年的一天,当时在舟山部队担任团参谋长(后为副师长)的华东一级战斗英雄韩延智,对新四军老同志杜梅(后在普陀县内务局担任领导工作、舟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普陀工委主任)和新四军老同志(后为普陀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舟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普陀工委副主任)司永明同志说:“桃花岛东沙一带,

部队训练和群众耕作时,仍有发现当年进军登步战斗的遗物,如钢笔、牙刷、钢盔等,更激起舟山军民(特别是桃花、登步群众)对他们的无限怀念(当时61师师部驻桃花岛)。我们作为他们的亲密战友和幸存后人,一定要尽快呼吁树立一座登步岛战斗纪念碑,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的功绩。”

自此,舟山市普陀区有关部门和杜梅、司永明等同志,即投入到为筹建登步岛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的长期奔走呼吁之中。先后向中央军委办公厅、浙江省军区政治部、21军政治部、浙江省民政厅等军地领导机关打报告、写信联系,并亲自上门反映和要求此事,得到了军地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关注与支持,后普陀县民政局赵守财等同志也相继参加了这项工作。但因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各项经费特别困难,给解决这一问题造成了很大难度。经多方努力,最后终于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下拨专项经费9万元。以此为基础,又经几年努力,在军地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援下,普陀县人民政府终于在1984年5月17日舟山解放34周年之际,在沈家门青龙山建成“登步岛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21军军长滕海清题写了碑名和志铭。纪念碑像乘风破浪的风帆,耸入云天。两侧为在登步岛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名录,在北面碑文介绍了登步岛战斗的经过、意义和战果。

建碑20多年来,几经修缮,更加雄伟壮观。现为舟山市和普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逢清明、春节等重大节日,来此祭奠和缅怀革命先烈的人民群众、军地领导与干部战士络绎不绝。今年是舟山解放55周年,特写此文侧记此事,以示对这段历史的缅怀和纪念。

普陀城镇建设一瞥



东港新城一角



北安广场新貌



沈家门渔港新姿



浦西公园



新建沈家门鹤龄泉公园



329国道浦西段



舟山网上方志馆